

主 办：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

临沂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主 任：姜仕礼

委 员：李洪彦 段 洪 唐少清

卢少林 王文博 王卫东

陈宏图 李树峰 夏洪雷

黄夫群 刘如彬 程丽丽

邵 勇 杨 岩 侯宗良

刘焕英 周宗青 石洪欣

主 编：李洪彦

副 主 编：段 洪 呼国英 高 雷

特邀编审：曲文军 王纪明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美术编辑：胡拙安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1310012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粟裕与鲁南战役 汪 洋 04

【峥嵘岁月】

鏖战齐鲁（七） 吴瑞林 08

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抗日政权的创建和发展（上）

赵 炯 14

泰山肃托案

赵学法 19

当年发生在临费沂边联县的一起“肃托”案件

郑玉强 26

【名人素描】

曾国华传（六） 王连城 曾林辉 29

疾风劲草阎尔梅（三） 阎 强 35

【文化掇英】

沂蒙大地一支笔（三）

——惠玉昆先生的书法历程和业绩 刘瑞轩 39

白学光：战争中，我们以笔作战 于岸青 42

《打得好》一曲创作始末 吕 光 45

【史海撷萃】

费县阎老府轶事 张振伦 47

【影像沂蒙】

《沂蒙抗日根据地图志·人物》——徐向前

本 编 49

【探索发现】

- “益化”还是赢化? 高 雷 51
公鼐墓考证 孙昌盛 55

【蒙山沂水】

- “沂蒙山上好风光”之一——锥子崮 本 编 57

【诗画赏析】

- 钱谦益《费县道中》赏析(一) 平 凡 59

【百家渊流】

- 鲁东南枣强袁 袁兆勇 63

【史料辑存】

- 华东局组织部、军政治部关于抽调南下干部的通知
68

【沂蒙乡亲】

- 南下云南边陲(二)
——记李勤奉 郑潇洒 70
房建成：空天报国敢为人先 荣庆春 74

【工作动态】

- 本 编 80

封面：锥子崮

(详见本期《“沂蒙山上好风光”之一——锥子崮》)

封底：雕虫丧道率真本原等闲一字不可放过。——龙溪说画
胡石/书



地 址：临沂市北京路17号
行政服务中心655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2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印 数：2000册

发送对象：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系统内部

粟裕与鲁南战役

汪 洋

宿北战役尚未结束，1946年12月18日，毛泽东就致电陈毅、粟裕指出：
 “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
 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峰台，使鲁南获
 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究应如
 何，望按实情处理。”（《毛泽东军事文选》）第二天我军得到情报，敌
 整编七十四师将配合七军攻击沐阳，陈毅、粟裕商讨后决定，主力回师歼
 灭进犯沐阳之敌，然后再视情况北上或西进淮北。12月20日，毛泽东复电：
 “七十四师向沐阳前进，先打该师，甚为必要。只要有仗打，在内线多歼

1947年1月2日，毛泽东为鲁南战役拟定的电文手稿。

宿北战役尚未结束，1946年12月18日，毛泽东就致电陈毅、粟裕指出：
 “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
 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峰台，使鲁南获
 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究应如
 何，望按实情处理。”（《毛泽东军事文选》）第二天我军得到情报，敌
 整编七十四师将配合七军攻击沐阳，陈毅、粟裕商讨后决定，主力回师歼
 灭进犯沐阳之敌，然后再视情况北上或西进淮北。12月20日，毛泽东复电：
 “七十四师向沐阳前进，先打该师，甚为必要。只要有仗打，在内线多歼

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毛泽东军事文选》）不难看出毛泽东被宿北战役的胜利所感染，对华东两军会合的欣慰和对将来战局的乐观情绪。

12月20日，山东军区张云逸（副司令）、黎玉（副政委）建议宿北战役后歼灭鲁南之敌。21日，粟裕与陈毅、邓子恢、谭震林、陈士榘、唐亮联名致电张云逸、黎玉、舒同并报中央军委：“经我们一夜商定，先求全力歼击七十四师于沭阳以南”，“再回援鲁南”，决定调四、九师保卫临沂。

22日，没想到陈士榘、唐亮却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山野主力一纵、八师回援鲁南，然后再与华野合歼苏北之敌。此电与前日联名电文意见竟反，既然“一夜商定”，为何次日又推翻前议？既然有不同意见，为何“一夜商定”时缄口不提？如此出尔反尔，是何道理？陈毅得知后，严肃批评了陈士榘。（陈士榘回忆录《天翻地覆三年间》）

这时敌整七十四师由于涟水两次遭我痛击，损失过万，担心过早出击形成孤军冒进之态势，直到23日仍在原地未动，并与七军、整二十八师衔接，企图等待欧震兵团到来之后再继续北犯。根据这一情况，陈毅、张云逸、邓子恢、粟裕、谭震林聚集在华中军区驻地（张集以北之李庄）商讨行动计划，决定放弃歼击整七十四师的计划，主力回援鲁南，并相机收复淮北。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连夜北返临沂，次日粟裕将行动方案电告张云逸、黎玉、陈士榘、唐亮并报中央。24日毛泽东复电：“如放弃七十四师不打，似宜集中25个团（包括四师、九师、十纵、警旅在内）左右兵力于鲁南地区歼灭二十六师，迫退冯治安部，然后相机出淮北较为有利。如何，请按实情处理。”（《毛泽东军事文选》）

12月24日，粟裕与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央并华东局，建议“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合并，山野与华野合并，成立统一的华东司令部”。次日中央复电同意，并指出华中必须留置必要的部队坚持游击战，华中分局必须有一二负责人率轻便领导机关留在华中。（《粟裕年谱》）

12月2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你们必须集中第一、第六、第八、第四、第九、第十各师及一纵、警旅等部，并有必要之部署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似以打二十六师三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冯部，则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究应如何，望根据具体情况处理。”（《毛泽东军事文选》）至此，鲁南战役的作战方针基本确定。

12月27日，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一师、一纵等部北上鲁南，于29日与从临沂南下的陈毅在陇海路以北的桃林会师。30日，陈毅、粟裕主持制定并签发《华东野战军峰东作战计划》，决定集中7个主力团，首先歼灭敌整二十六师，而后相机歼灭冯治安部三十三军，收复峰县、台儿庄，进逼徐州。

宿北战役的胜利，山野、华野的合并和即将开始的鲁南战役，让毛泽东兴奋不已，1947年1月2日在给陈毅电告宿北战役总结的复电中鼓励有加：“以战养战，打一仗进一步口号甚好。你们应以宿东战役为例，力争打大歼灭战，即每战全部彻底歼敌三至四个旅，如此再打二三仗即可停止敌之进攻，并收复一部失地。”并关切询问：“粟及一师是否已至鲁南与你们在一起？我们希望此次作战能获宿东同样战果”。（《毛泽东军事文选》）

同日，我军发起鲁南战役，对集结在峰县、枣庄以东企图进犯临沂之整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发起攻击。

1947年1月3日，陈毅、粟裕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他们已于上月29日会合，一师已参战，已完成对敌整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的包围，拟于今晚解决大部或全



1947年1月，粟裕（右二）和谭震林（右一）在鲁南战役中研究阻击方案

部，此战于1月5日前后结束，而后相机收复台儿庄、枣庄。

1月4日下午3时，鲁南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全歼敌整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3万余人，缴获坦克20余辆、汽车400余辆，并击溃敌五十一师两次增援。（《粟裕年谱》）

1月6日，华东野战军根据敌冯治安部退缩到运河以南的新情况，决定调整作战部署，乘胜攻取峄县、枣庄。8日，粟裕率参谋人员出发前往峄、枣前线指挥作战。11日，指挥八师攻克峄县；16日，指挥一纵攻克齐村，同时指挥一师攻击枣庄。枣庄攻坚遇到困难，粟裕召集叶飞、陶勇会商，决定由一师统一指挥，以一纵二、四团和八师二十三团配属一师，于19日晚对枣庄发起总攻。（《百旅之杰》）

至于陈士榘回忆录中说到粟裕18日因病退出攻击枣庄指挥一事，姚旭早有驳论，现引用如下：有人写书说：“十七日深夜，我已休息了，陈毅司令员把我叫了起来，说有急事。我问：“‘什么事’？陈毅司令员说：‘粟裕病了。’他叫我率第八师配合一师解决枣庄敌人，把粟裕替下来。”“天亮之后，我赶到枣庄，看望了粟裕。他躺在床上，发高烧，病得很重。我命令部队组织人员护送粟裕回指挥部治病休息。”“经研究后，重新确定了攻击方向和作战任务。”“我们决定改变主攻方向。原来主攻方向在南面，现在改在北面，仍由一师担任。”“陶勇同志开始有些想不通，但经我说明道理，还是同意了这个方案，服从我的指挥。”粟裕戎马一生，从未因病离开过指挥岗位，即使是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三个兵团期间，他病已很重，但一直坚持指挥到胜利结束，才去济南治病。于是我们询问了《粟裕传记》组的同志，承他们出示了证明材料。一份是当年山野作战处副处长王德在1989年3月8日谈话的录音记录，王德说：“打枣庄时我跟粟司令去的。我们在前面，我记得最后打到五十一军军部，缴了周毓英的一辆吉普车，比较新一点。我和粟司令坐吉普车出来的，陶勇送粟司令的。”另一份是当年跟随粟裕在一起的秘书徐玉田写的书面证明材料：“陈士榘回忆录中说宿北、鲁南战役都是他和粟司令各指挥一路，是不符合史实的。粟司令在指挥打枣庄时，身体很好，精力充沛，情绪很高，战斗胜利结束后，他叫警卫员喊我同去村外田野散步，何病之有？”同粟裕在一起的另一位参谋徐充也在信中说：“我所知道的与徐玉田所说相同。”我们还询问过和粟裕一起在枣庄指挥所的同志，

都如此说。在那本书开头语中说：写回忆录“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谎报军情、夸大困难、歪曲真相逃避责任、窃他人的功劳为己有，抬高自己在胜利者行列中的地位。”此书写的三年历史，真实性如何？好在有关这段历史过去保密的大量档案已在《毛泽东军事文集》和《毛泽东年谱》中公布于世，让读者去查对判断吧！（可参见《粟裕研究文萃》第3辑《天翻地覆三年间》）

1月20日，我军攻克枣庄，全歼敌整五十一师，鲁南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整个战役共歼敌5.3万余人。毛泽东得知大捷，高兴之余又意犹未尽，21日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一）枣庄攻克，五十一师全歼，甚好甚慰。望对有功将士予以嘉奖。（二）从攻克枣庄翌日起，全军整训两星期，集中一切力量歼灭欧震。（三）35天内你们歼灭第六十九、第二十六、第五十一等3个整师，取得空前大捷。主要缺点是未能于宿北、鲁南两役中集中山野、华野全力于一个战役，而被欧震、李延年牵制了我军20团以上，否则，胡璉、冯治安两部已被歼灭。今后打欧震务必集中50个团于一个战场上作战。对台、徐、临方面仅用地方游击队监视之即可。”（《毛泽东军事文选》）

1月23日，粟裕由枣庄前线返回郯城以北的前海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当日制订《华东野战军整军计划方案》上报中央，中央军委很快批准，组建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张元寿任副参谋长。新四军、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等番号同时撤销，华东野战军统编为12个纵队（无五纵，11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真正实现了山野和华野的合编。此时的“华野”就不是以前的华中野战军了，而是华东野战军。

1月25日，以华中野战军指挥部为基础，加上山东野战军指挥部一部，组建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原华中野战军参谋处处长夏光任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参谋处处长，王德（原山野参谋处副主任）任副处长，孙公飞任作战科长，严振衡任侦察科长，李景瑞任通信科长，陈之因任管理科长。（《战地日记》，参见《粟裕文选》第二卷）

时任作战参谋的秦叔瑾说，组建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时，关于参谋处长的人选，粟裕提出的是夏光，陈士榘提出的是王德，结果陈毅采纳了粟裕的意见。其他各科的科长都是原来华中野战军指挥部的。秦说，山东野战军指挥部的机构不够健全，人员和华东军区有交叉，分工也不明确，有些科室的科长也没有配备。华中野战军指挥部的成员长期在粟裕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感同身受，耳濡目染，长期受到粟裕将军指挥艺术的熏陶，工作认真仔细，各业务部门机构也比较健全，各类参谋人员的素质较高，业务能力也比较强，因此，华东野指的机构就是在原华中野指的基础上成立的。

鏖战齐鲁 (七)

吴瑞林

九、北上泰山区

1938年12月，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以郭洪涛同志为书记的由苏鲁豫皖边省委改组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以张经武同志为指挥、黎玉同志为政委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宣布成立。第二支队编为山东纵队第二支队。这时，我奉命北上泰山区，接替我任二支队政委的是景晓村同志。同时，由刘涌同志接替罗绩伟同志任二支队司令员。早在泊里战斗以前，省委就派刘涌、景晓村同志来准备改组二支队，并由景晓村同志主持召集鲁东南县区委书记和各工作团的联席会议，成立以他为书记的中共鲁东南特委。当时战斗比较紧张，他们初来乍到，要有一个了解、熟悉和准备的过程，因此没有立即接替我们的工作，刘涌同志就和我们共同率部打泊里、贡口和诸城东西关，并肩作战；景晓村同志就在桑园召开会议。我们留下一个特务连给他，专门担负保卫工作。12月初部队胜利返回时，会议刚刚结束。随着山东敌后抗战局面的展开和变化，我们的党组织和军队作些调整，干部作些调动都是自然的，也是革命事业兴旺发展的一种表现。自己亲手开创的事业固然值得留恋，有待我们去开创的事业更值得向往。山东分局决定建立中共泰山特委，泰山区原直属分局的各县委划归特委领导，泰安、莱芜、新泰、泗水、宁阳、章丘、淄川、博山等均受其管辖。分局认为我可以由做政治工作改做军事工作，而泰山特委缺少可以做军事工作的红军干部，故分局就选上了我，那里的军事部长的任务正在等待着我去担负。有一件事在这里要顺便交代一下。在准备改组二支队之前，曾发生过工作上的某些意见分歧，就是我们当时鲁东南临时特委和第二支队的几个领导干部同省委统战部长刘居英同志之间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九、十月间，刘居英同志受省委委托到莒县检查我们的工作，对我们有许多帮助，不过他认为我们按党的政策收编地主武装朱信斋部是犯了右倾错误；又认为我们与高树勋部合作，在高部离开以后我们北占桑园，因而支持了高树勋对张里元手下的许、穆两县长的排斥行动，是犯了“左”倾错误。对这两个意见，我们都是不同意的，并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但并未能说服刘居英同志。当刘居英同志返回省委后不



1939年6月，吴瑞林在鲁中泰山区莲花山庙子战斗中负重伤。

久，省委关于改组二支队的指示就下达了。有同志说，这是刘居英同志反映意见的结果。然而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巧合，因为刘居英同志批评我们的两件事，都是我们向郭洪涛同志当面请示后才办的，而且是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的，因而是正确的，郭洪涛同志决不会同意他的批评。但我当时还是到山东分局驻地沂水大王庄，当面向郭洪涛同志反映了我们的意见，申述了我们的理由。郭洪涛同志明确表示：“你们在鲁东南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不存在什么‘左’与右的问题。这些事我了解，你们都请示过我，你们也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因而才干出了成绩。这次调整二支队的干部，准备调你到泰山区，组织上是另有考虑的。”当时因临时有事，话没有谈完。现在要正式接受新任务，必须到大王庄汇报工作情况并领取组织介绍信，我想分局领导同志这次一定会讲明调动原因的。

我走的前几天，鲁东南的老战友、社会贤达、知名人士都来热情欢送，依依告别。邵德孚等同志一定要给我配一马、一枪和一位通讯员，他们才放心让我启程。

从桑园镇出发，整整走了三天才赶到大王庄。先向分局秘书长杨刚毅同志报到。杨刚毅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大王庄的住房已由分局和纵队机关住满了，要我同他住在一起，等候领导同志的指示。第二天，是郭洪涛、张经武同志谈话；第三天，是黎玉同志谈话。

郭洪涛同志接见我，首先称赞了二支队北上开辟桑园，东进智取泊里、炮击贡口、夜袭诸城的胜利，说分局已向党中央、新华社报送了这些胜利的消息，并由此说到原省委和现在的分局决定建立中共泰山特委，但泰山区缺一做军事工作的红军干部，根据二支队开辟鲁东南的情况，省委和分局认为我改作军事工作是合适的，故决定调我去泰山区。接着，他指出泰山区西贯津浦铁路，北靠胶济铁路，位于泰山山脉

的东南麓，其中心区泰（安）东莱（芜）西是泰山山脉环抱中的一个盆地，比较富庶，要坚持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必须以泰山区作为依托和屏障。这里又是分局和纵队联系路西河北八路军主力乃至党中央的交通要道，敌人也将会拼命地与我们争夺。因此，泰山特委肩负的创建、巩固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作好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他还具体介绍了泰山特委书记夏辅仁（泰安人）、组织部长刘莱夫（莱芜人）、宣传部长董琰（新泰人）等同志，确定我去任军事部长，并说特委军事部对外暂称纵队第四支队一大队，对内为军分区，由我兼大队长，夏辅仁同志任政委，调新泰独立营教导员李枚青同志任政治处主任，该营营长李耐夫同志任参谋长。该地区的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为野战军，我们军分区部队为地方军，两者系平行关系，联合作战时由四支队统一指挥，分开作战时由我们自己独立指挥，组织上归郭洪涛同志兼任军事部长的分局军事部领导。他指示我们抓住当前大好时机，充分运用淄博矿区产业工人多的优势，大发动大发展，抓紧建党、建军、建政、建设根据地，广泛建立各类群众的抗日救国团体和抗日自卫队武装，准备成立泰山区七县联合办事处，要求我们在泰山区牢牢地站稳脚跟。

张经武同志谈话时，也是首先肯定了二支队抗日、统战和建立根据地的成绩，接着就作了具体交待。他说，泰山区要抓住时机大发展，要有紧迫感，不可丧失时机。毛主席对山东是寄托了厚望的。现在泰山区有十多个独立营，有大发展的基础，但都没有进行统一整顿，要我去后先集中整编一两个中队作为主力骨干，把机关建立起来（机关宜小不宜大），然后再去扩大部队，干部下去抓部队建设，组建地方武装，县建独立营或中队，区建小队。他指出，有军队在手，就有条件坚持泰山区，但还必须有个“家”，毛主席说“根据地就是军队的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根据地的建设；这一切，都得要有大批干部，但不能靠上面派，应该继续运用鲁东南办干训队的经验，自己培养，以适应大发展的需要。关于与四支队的关系，他强调虽是平行关系，但四支队是主力，在作战上要服从四支队的统一指挥，为此，准备以四支队和特委的主要干部组建军政委员会，我们可先考虑提出特委的人选来。

黎玉同志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长期在北平、天津、石家庄、唐山和冀鲁豫边地区从事党的领导工作，1936年起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领导山东省委组织发动了全省各地的抗日武装起义，山东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都说他为人朴实谦和。在党内总是以身作则，对群众总是循循善诱，因此他在群众眼里既是一位师长，又是一位老大哥。1938年8月，他和张经武同志率大批干部离开延安，于11月才回到省委驻地岸堤。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成立时，他作为分局委员和纵队政委也迁移到了大王庄。当我北上泰山区的时候，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受到这样一位领导同志的接见，能够亲耳聆听他的谈话，自然感到特别高兴。这天，我的穿着也特别整洁。一见面，我向他行了举手礼，他立即起身走上前来与我紧紧握手，亲切地招呼我坐下。只见他一面用两个手指从一个小铁盒里夹出一撮茶叶放到杯子里，叫通讯员倒上开水送到我面前；一面看着我，大概是看我年轻，就问我有多大年纪，出生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并和蔼地说：“请先喝口茶，不要着急，边喝边说。”黎玉同志对下属如此体贴入微，使我感到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顿时全身放松下来，觉得自己不但是在面对一位尊敬的首长需要如实汇报情况，而且是在面对一位推心置腹的朋友，可以放胆叙说家常。我看他虽只是30多岁的人，但革命的重担已将他的背压得显然有些弯曲了，不过这也更加衬托他的老练、沉着和长者的风度。我怀着更加深厚的敬意回答说：“我是1915年出生的，四川巴中人，从小就逃出家门讨饭，后被资本家的工头收去做童工，不久加入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参加了罢工运动，又加入了共青团。1932年当红军，同年由团转党。今年三四月间随郭洪涛同志离开延

安到山东，根据省委部署在鲁东南建立抗日根据地。”他谦逊而又幽默地说：“你干革命的时间与我差不多，还是位年轻的老同志呢！”接着，他详细地询问了鲁东南临时特委和第二支队建党、建军、建政、建立根据地开展统战工作以及几次战斗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他还要我提出对鲁东南今后工作的意见。我想了一下，说了三点看法：一是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对愿意抗日的一般资本家、地主等中间力量不要只是单纯向他们要钱要物，而要争取他们团结到我们周围，实行民主合作，共同抗战；二是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要抓紧有利时机着重发展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和进步力量，创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就能坚持持久抗战，也不怕国民党反共的军事进攻；三是在鲁东南现有的两小块根据地的基础上，一面力求向北发展，一面力求向南发展，向北可逐渐打通与胶东和鲁中兄弟部队的联系，向南可开辟苏鲁边，扩大回旋余地。我说明，向南的发展，我们已派干部到郯城、赣榆准备建立两个县委，但不知进展情形如何，因为到我离开桑园镇的时候仍未得到他们的工作报告。黎玉同志听了很高兴，连连点头示意，并说向北、向南都是鲁东南发展的方向，表示分局和纵队要认真研究这些意见。说着说着已到开饭的时候，黎玉同志吩咐通讯员多打一个人的饭菜，并对我说：“我们俩一同吃饭，边吃边说。”他接着向我交代了去泰山区的任务：“泰山区是扼津浦、胶济两铁路的战略要地，是山东分局和纵队同中央交通联络的一条必经之地，我们一定要把这块腹地牢牢掌握在手里。这个任务现在就交给你了，相信你能很好地担当起来。我这次去延安曾到过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和董老。董老还提及到山东敌后的有个四川年轻同志吴尚德，红军长征时曾担任过党的大金川省委组织部长，兼大金川省少共书记，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挨过张国焘的整，后因在党校第一个报名坚决要求到敌后，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原来你这个杨昆就是吴尚德！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和重托啊！”关于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他指出：一、要抓好部队的建党工作，要贯彻毛主席“把支部建在连上”的方针，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二、要抓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和军事训练工作，使部队成为有觉悟、有文化、特别能战斗的真正人民武装；三、要和四支队亲密团结，协同作战，把泰山区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四、要去四支队一趟，与四支队领导人共同研究，提出泰山区军政委员会的人选名单。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浩、副司令员赵杰、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和特委的书记、军事部长均应参加，联合办事处或专署也应有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但因机构尚未建立，名额以后再补。最后，黎玉同志还特别指示我要注意一件事：泰安县有个独立营，营长是程鹏同志，曾是泰安的一个老区长，拉起民团，积极参加了徂徕山起义。四支队南下天宝山时，他带着独立营回到徂徕山，一直不愿离开徂徕山区，要坚持泰山区敌后的抗战。徂徕山是第四支队的发祥地，又处于泰安、莱芜、新泰三县之交，军事地位十分重要。程鹏同志主张坚持这块阵地有一定道理，我们不要给他扣上什么“地方主义”的帽子，更不能把他当作旧政府官员处理。要我去后找泰安县委书记张烈同志和程鹏同志好好谈谈，要他们坚持徂徕山区的抗日武装斗争，队伍只能扩大，不能缩小，特委要帮助他们发展壮大，要坚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保证徂徕山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红旗不倒。该营中要充实适当的党员干部进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泰安县委讨论独立营工作问题时可以吸收程鹏同志参加，条件成熟时可以吸收他入党；对在抗战中牺牲了的马营长，要树为民族英雄，加以宣传，对其直系亲属要作为烈属加以照顾、安排。黎玉同志嘱咐我一定要处理好这一问题，不要使他们产生什么顾虑。我当即表示“坚决照办”。

与黎玉同志的这次见面充满了亲切温馨的同志情谊，谈话结束后我的心情十分

舒畅愉悦，久久回味。当我回到杨刚毅同志办公处的时候，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兼妇委书记史秀云同志和妇委副书记郑琳同志已在那里等着我，她们向我交代去泰山区后要继续重视并支持妇女运动的开展，因为她们认为我在鲁东南特委工作时妇女运动有起色，要我搞军事莫忘抓妇运。她们还以开玩笑而又认真的口吻关切地对我说：“听说你在鲁东南和刘浩同志的恋爱关系吹了，不要紧，到泰山区去找个称心如意的爱人吧，预祝你成功！”

约在12月底，我和通讯员同纵队所派护送我们的6位同志以及军马饲养员一行9人离开大王庄向泰山区进发。行前，张经武和纵队参谋长王彬同志特地向我介绍了去泰山区的路线，并开了一张通行证，画了一张路线图，说所经之地都是我军的防区，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只是泰安特委的驻地不详，可能是随四支队行动，得由我自己去找。我们从大王庄出发，经过水帘坡、小王庄，翻越石门岭，当天下午到达新泰的土门。第二天经过蒙阴大黄庄，第三天就到了莱芜颜庄区的颜庄。按照王彬同志的介绍，这一带驻有四支队的四团二营，营长李国林，教导员刘春，通过他们可以找到四支队司令部的驻地。在土门，我向新泰独立营传达了山东纵队关于建立泰山军分区的指示，以及对该营营长李耐夫、教导员李枚青两同志的新任命，并对该营的工作进行了安排，由曹旭同志任营长，曹新甫同志任教导员。他们主动派人去颜庄与四支队四团二营联系，李国林复信表示欢迎四支队一大队和泰山军分区首长路过颜庄。因此，我对李国林的叛变行径没有任何警觉。当我们进入颜庄时，李国林已在村里埋伏下100余人等待我们，他带着十余人出面笑脸迎接，把我们引至该村的一个关帝庙，突然伏兵四起，将我们团团围住。我们一行9人被缴了械，遭到武装扣押。这时才恍然大悟，我们遇上了叛军。李国林有恃无恐，公然向我们宣布，他已不再是八路军了，而是秦启荣所部第三十二梯队的司令。我质问他：“你当了秦启荣部的司令官，也还是实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嘛，为什么无端扣押我们？”李国林说：“我要把你们当人质，换回我部在四支队学习的20多个人。”我说：“我们是从这里路过的，你们在四支队学习的人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们扣押我们是毫无道理的，是破坏统一战线、不利于国共合作的行为，我们要强烈抗议！我们要到莱芜去，你应该以礼相待，送我们启程，才有利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李国林每天都来与我们谈判，我们每次都是提出严正抗议，这样对峙了12天。在此期间，我们对看押我们的士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争取、瓦解工作。这个连队的绝大多数士兵都是淄川、博山的煤矿、铁路工人，都是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下才参加八路军的。李国林过去当过土匪头子，连长和个别排长是地痞流氓，大多数干部和战士对他们不满，且因生活较苦，多有思乡之情。其中有位排长叫韩德勤，有位班长叫张志勇，都是中共候补党员。我们被包围缴械时，他们俩曾向我使过眼色，使我意识到这里发生问题了。后来，韩德勤同志还写了纸条包在小石块上投给我们，又使我们得知刘春同志到四支队开会去了，李国林就乘机投靠了秦启荣。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们就在韩、张两位同志的配合下加紧做争取战士的工作，公开宣传国共合作抗战中国才有出路、反对积极抗日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只对日寇有利的道理，同时选择对象个别劝说其脱离李国林，随我们一同跳出虎口归队。正当韩、张两同志从内部策动之际，发现一班长跑出去告密，我们当机立断，由韩、张带领已表示坚决归队的7名战士和我们一起，连夜从颜庄西门土围墙的缺口处突围。到达新泰独立营驻地，受到李耐夫、李枚青等同志的热情接待。

我们虽然脱险而归，但这次意外的波折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提高警觉，才能免受损失，立于不败之地。脱险后见到亲人、同志，委屈与喜悦之情交织在一起，一泻而出。我们决定，由李枚青同志前往大王庄向分局和

纵队当面汇报李国林叛变和我们脱险归队的情况。李枚青同志回来后，传达了分局和纵队的指示：对我们一行9人临危不惧、分化叛军、胜利脱险给予通报表扬；对韩德勤、张志勇等9位归队的战士予以表扬，并每人奖励3块大洋；继续争取李国林部的战士归队。根据指示，我们决定以他们9个人为基础组建一大队的第七中队，韩德勤同志任副队长，张志勇同志任排长，该中队受中共莱芜县委宣传部长亓宗禹同志领导，负责对李国林部的分化、瓦解、争取工作。由于我们当时没有钱来执行对韩、张等的嘉奖，李耐夫同志就主动回家变卖了半亩地，带回35块大洋，给他们9个人各发了3块大洋，剩下的钱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不久，李国林部又有十余名战士经过争取归了队，加入了第七中队。当地青年参军很踊跃，七中队很快就发展壮大。驻博山一带的秦启荣得知消息后，便调李国林部进驻距他较近的双龙峪。当李国林率部到莱芜徐家店一带骚扰时，被我们打了一个伏击，又有三四十个战士跑来归队。经过这次波折，组织上决定我改名吴瑞林。我和李耐夫、李枚青同志带领新泰独立营到莱芜、新泰交界的雁门关，立即与泰山特委取得了联系。当时，特委驻在莲花山西部的圣井村。我从大王庄出发的目的地终于达到了。

临、郯、费、峯四县 边联抗日政权的创建和发展 (上)

赵 炯

鲁南抱犊崮山区，扼山东南大门，雄踞于陇海、津浦两条铁路交叉点徐州的东北，和天宝山区南北相连，山势险峻，地形复杂，是历代统治力量薄弱之处，天高皇帝远。正因如此，这里历来也是土匪活跃的场所，同时地主豪强等地方势力亦很强大。别看是偏远的穷乡僻壤，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日军华北、华中派遣军的接合部；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与其大后方联系的主要通道，同时也是华中新四军和华北八路军的接合部和华中、山东党政军同陕北党中央联系的枢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战以来，这块历来不被重视的穷乡僻壤，立即成为国、共、日伪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而临、郯、费、峯四县边联，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激烈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它的建立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山东抗日运动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固势力，保证了华中、山东党政军组织同陕北党中央的联系和人员



抱犊崮

往来的畅通，为伟大的抗日战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它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的典范，而要说清他的来龙去脉，还必须先从中共苏鲁豫皖边特委说起。

一、“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新事物

1938年8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费县高桥镇广德堂药铺的中医周德为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一骨碌爬起来，警觉地躲在门后听了一会儿，听出敲门声虽然急促，但确是规定暗号，知是自己人，便开了门。借助晨曦，他认出闪进来的两个人，一个是李韶九，一个是杨庄的杨质卿。见是自己人，周德为便直截了当地问：“有急事？”

“表叔有急事，叫我来向您讨教！”杨质卿说，“前些时候临沂行政公署督察专员张里元曾给表叔来信，叫他拉队伍，表叔还没回信，这不，昨天他又送来信，叫表叔亲自到临沂城去，说是有要事相商。表叔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叫我速来请教！”

杨质卿的表叔是何等样人物？竟劳临沂专员亲自召见，共商要事？

说起此人确非等闲之辈，虽身居偏远山区，可在这方圆一二百里之内，也是尽人皆知的头面人物。此人姓万名春圃，字鸿源，1882年出生在今兰陵县大炉村一个地主家庭。当时他家占有200亩“伸勺子挖饭吃”的接山淤地，500多亩遍植松柏柞栎的山场，30多间大瓦房，虽称不上豪门显贵，但在这偏远的抱犊崮山区，也是屈指可数的了。万春圃自幼不好读书，喜好骑马玩枪，为人耿直豪爽、讲义气好朋友、广交游、仗义疏财、扶困济危，有正义感，在乡里颇受尊敬，公称“万三爷”。说起他的耿直豪爽、讲义气、好朋友，还有一段“万三爷卖马”的故事。

大约是1921年前后，有一次万春圃骑上心爱的枣红马，去逛向城春会，正很得意地在牲口市里打听行情，想给自己的马问个实价。可巧尚岩沟西的大地主、时任临沂县第七区区长的陈玉山看见了这匹马，误认为是卖的，老远走了过来。

万春圃见是一位长袍马褂、很有风度的人向自己走来，便向旁边的人打听：“这人是谁？”

“你还不认识？他就是陈区长。”许多人都说。

万春圃对陈玉山早就心仪已久，所以当陈玉山来问马价时，他和颜悦色地说：

“怎么，你看中了么？”

“不错，不错！”

“那你牵去就是了。”

“那怎么行呢！”

“人情一匹马呐，都是老亲世邻的，还能要钱吗？”

陈玉山仔细看了看万春圃，实在不认识，便请教了尊姓大名。得知是万三爷，也是早有耳闻，遂邀至家中。万三爷也毫不推辞，经过攀谈，都觉相见恨晚，遂成莫逆之交，义结金兰。

万春圃不仅有侠客之风，还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正义感，对当时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非常不满，但又苦无良策。

他的声望倒不是因为他家有田产，当时周围田产比他多的人家有的是；也不是因为他广交游、讲义气，而是因为他是鲁、苏、皖三省交界一带十几个县的联庄会总会首。

抗战前的抱犊崮山区，偏僻荒凉，历来是土匪出没的场所，大小“竿头”林立，

打家劫舍，闹得贫富不安。万春圃对打家劫舍，深恶痛绝。有一次他正在把兄弟陈玉山家的客厅喝酒，忽然有人来报，说是他父母被土匪绑走了。万春圃一听火冒三丈，立时就要去同土匪拼命。幸好陈玉山还冷静，劝道：“土匪绑票，无非是想钱，现在不能玩硬的，要设法把二位老人先救出来再说。”万春圃听从了这位仁兄的话，先花钱救出了父母。为了不再吃土匪的气，便在众位仁兄的帮助下，组建起保家民团。奉军失败的那年，一伙散兵在抱犊崮山区迷了路，29支汉阳造、捷克式步枪都被万三爷截获。从此他的民团日益强大，不久，他又当上了临、郯、费、峰一带联庄会的总会长，一声令下，就可调动成千上万的会众，哪里有土匪作案，接到报案可立即号令会众前去围剿，从此他成了独霸一方的“山大王”。虽然权势日盛，但此人讲义气，并不仗势欺人，且好办些公益事业。1930年，在他的倡议下，大炉办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小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校来了兄弟两位教师：聂立人、聂益人。聂氏兄弟先后都去拜访过他，谈起东北沦陷，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使万春圃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遂对聂氏兄弟产生好感。1933年共产党组织了苍山暴动，抱犊崮山区的党组织还没来得及行动，暴动便失败了。国民党进行了大范围的搜捕，并把抓捕聂氏兄弟的任务交给了万春圃。可万春圃怎么也想不通，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抓这些好人？便偷偷给聂氏兄弟送了个信，让他们赶快逃避。事后，万向上报告，只说聂氏兄弟早已闻风逃逸。

在旧社会，地主阶级内部的矛是非常复杂的，有时也是尖锐的。随着万春圃、陈玉山一派势力的发展，漫溪村地主郑向三一派早就眼红了。他们控告万春圃勾结土匪。临沂专员公署督察专员张里元听信了郑向三等人的一面之词，遂下令逮捕万春圃、万国华父子。幸亏万春圃平日交游广，朋友多，及早闻风外逃，才免了这场灾难，但其家被抄，其妻抱着九个月大的孩子被抓进大牢，直到“七七事变”前，万氏父子才刚回到家。正因他曾被张里元通缉未获，所以心怀疑虑，怕被骗，拿不定主意，这才派李、杨二人连夜到高桥镇向周先生问计。

这位能被万三爷如此看中和信赖的周先生，又是何方贤圣？

说起此人也是大有来头，此人原名郭子化，是中共苏鲁豫皖边特委书记。周德为是他来高桥后的化名。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他在徐州第七师范上学时，就积极投身到“五四运动”的洪流中，成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曾任徐州八县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后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1926年，为救国救民，毅然投笔从戎，赴广州参加北伐军，并在北伐中入了党。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在皖北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当时枣庄矿区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先后几次派去的人，因无职业掩护，都站不往脚。时任徐州特委委员的郭子化，因出身中医世家，素谙中医，1932年，受徐州特委派遗重建枣庄工委，并任工委书记。他听取了先期曾被特委派往枣庄的吴季讷对枣庄情况的介绍后，就肩挑药箱，以行医为名，来枣庄矿区恢复组织。他到枣庄后，先在大街小巷转了一圈，观察形势，寻找栖身之所，然后选了一家专接待江湖人士的客店住了进去，因他知道凡开这种店的人，都在当地有一定势力。当晚，他就给店主宋二的老婆看了病，并白送了两服药。宋二很高兴，晚间警察来查铺，宋二给他担保，才渡过了住宿的难关。不久，他在鸡市街租了两间四面透风的草棚，算是有了个落脚点。以后又盖了几间像样的屋，开了家同春堂药铺，算是站住了脚。1933年4月，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来矿区巡视工作，二人商谈两昼夜，确定矿区党的任务和组织联络方式。但不久，因特委共青团书记练育才叛变，特委被搞垮，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所幸矿区工委同冷启英是单线联系才幸免于难，但工委从此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不得不独立工作。

后组建苏鲁边临时特委和苏鲁豫皖边特委，他一直担任特委书记。



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旧址——“同春堂”药店旧址

1934年冬，设在枣庄矿区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决定开辟抱犊崮山区的工作，派李韶九、郭致运以行医为掩护来这一带活动。当时苍山暴动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依然笼罩着鲁南大地，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非得有当地有势力的人物作掩护不可。因此临行前特委书记郭子化反复交待，要想开辟这一带的工作，就一定要争取万春圃的支持。李韶九、张光中、郭致远到达抱犊崮山区后，先在高桥、大炉一带为人看病，万家人人生病也常派人赶着毛驴请李韶九去看病，时间一长，李、郭二人同万春圃就熟悉了。

1935年元月，特委书记郭子化在枣庄脱险后，将特委机关转移到高桥镇，化名周德为，开了这间广德堂药铺，仍以行医为掩护，并经李韶九介绍认识了万春圃。1935年，他们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就有万春圃的大儿子万国华。

1937年1月底，郭子化接到党中央西北特别工作组的通知，要特委派人去西安同中共中央接关系。2月初，郭子化赴西安。中共中央听取汇报后批准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组织，并将其划归河南省委领导：确定郭子化赴延安参加苏区代表会和白区工作会议，会后仍回原地区工作。7月底，郭子化回到高桥后立即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布置今后工作。

会议主要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群众抗日运动的新精神。对今后工作主要作了以下三点安排：

1. 积极开展城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徐州及各县上层人物的工作。在抱犊崮山区以万春圃为主要统战对象，利用社会关系，向临、郟、费、峯各县展开，重点做联庄会的工作。

2. 上层统战工作和下层工农群众的宣传教育、党组织发展同时进行。

3. 利用联庄会旧有基础，秘密组织武装，利用韩复榘扩军自卫的号召，组织掌握人民抗日武装、并防止反动军阀、官僚、恶霸地主及不法之徒招兵自卫不抗日。

会后，郭子化就到了大炉，受到万春圃的热情接待。席间，郭子化赞扬了他组织武装，准备抗日的爱国行动，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宣传了团结抗战的意义，指出了抗战必胜的前途。万春圃深受教育，坚定了组织抗日武装的决心。他在与郭子化等人的接触中，渐渐猜测到，他们可能就是共产党，并且深切地感觉到，共产党是一些远

见卓识、有能力的人，因此决定和这些人合作，并明确向郭子化表示：“周先生，请你相信，我万某是够朋友的，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正是上述原因，才使得这位威镇一方的“山大王”在遇到难以决断的重大问题时，立刻想到向他敬仰和信赖的周先生请教。

郭子化详细询问了情况，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在国共重新合作，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抗战的大势之下，张里元不可能耍什么阴谋来对付万春圃，而是要利用他，便果断地说：“回去告诉您表叔，不用害怕。张里元是想利用您表叔的势力和声望，在山区组织武装，一旦临沂吃紧，他好向山区撤退。我们正好将计就计借他的名义，用他的供给，拉自己的武装。”并决定派郭致远以地方绅士的名义陪同前往，好随时掌握情况。万春圃相信郭子化的分析，当天便同郭致远一起骑驴赶赴临沂。

见面后，弄清了原来张里元是想让万春圃出面组织临、郯、费、峰四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恢复联庄会。由于万春圃心中早已有数，当即表示：为了抗日，义不容辞，只是缺少武器、给养，要政府支持。张里元很满意，当即委派万春圃为临、郯、费、峰四县边区联庄会会长，联络旧时各县联庄会长，建立办事机构，并派其秘书李仲勋协助。

万、郭二人立即返回大炉，在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领导下，很快建起了临、郯、费、峰四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筹备处。

1937年11月10日（农历十月初八），在临沂县第七区尚岩村召开第一次“临、郯、费、峰四县边区联庄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临、郯、费、峰四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地址设在第七区驻地尚岩沟西大地主陈玉山的家里。张里元派其秘书李仲勋当主任，万春圃的外甥宋鲁泉被委为副主任。下设六个股：

- 宣传股长，李薇冬（中共党员）
- 组训股长：纪 华（中共党员）
- 军事股长：万国华（中共党员）
- 谍报股长：郭致远（中共党员）
- 卫生股长：李韶九（中共党员）
- 总务股长：王幼臣（无党人士）

六个股中五个股长是中共党员。办事处设常备队，万国华、刘清如两个中共党员分任正副队长，各县联庄会长虽多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但特委都派一定数量的党员帮助工作，掌握他们，如峰县联庄会长田晓峰，特委派李薇冬做他的“智囊”。副会长梁继箴，由郭志远做他的军事教官。其他各县大都如此，只有费县联庄会长是极其反动的土豪劣绅李以锦，难以派进，只好由万春圃以亲戚关系做他的工作。

对于宋鲁泉的工作，除组织上做外，他表弟万国华也做，万春圃也做，成效显著。

泰山肃托案

赵学法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20世纪40年代初，在苏共大规模反托斗争的影响和中共内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当时的泰山区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肃托”错案，史称“泰山肃托案”，致使许多抗日阵营内部的优秀党政军干部无辜蒙冤，甚至惨遭杀害。

一、案发背景

“肃托”的全称是“肃清托洛茨基反对派”。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斯大林主政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旨在排除异己，强化集权，许多不同政见者被残酷镇压，株连大批无辜者蒙难沉冤。在中国，陈独秀等人在1931年5月成立了所谓的“托派中央”，但门庭冷落，和者甚寡，始终未成气候。抗战期间，“托派”在中国境内并无统一组织，在中共内部更不曾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系统完整的“托派”组织。可是，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国后，却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在延安《解放》周刊第29和30期以连载方式，发表了臭名昭著的《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长文，毫无根据地诬蔑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荒谬地将“肃托”与反对汉奸相提并论，虚构、夸大“托派”的声势，臆造“托派”有一套系统的组织，在党内造成了对“托派”的神秘感和恐惧感。

1938年8月，康生担任了中共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独揽“肃托”大权。在康生的强力推动下，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迅即开展了规模不等的“肃托运动”。作为抗日根据地之一的山东在所难免。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肃托”，自1939年春从鲁南开始，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路过山东指导工作时，才得以彻底纠正，历时三年多。据《山东党史资料》总第四十二期披露，鲁西区错杀33人，鲁南区错杀30余人，胶东区、滨海区等地区 and 八路军一一五师、山东纵队也有许多干部战士被错杀。其中最严重的是“湖西肃托案”和“泰山肃托案”。

“湖西肃托案”发生在1939年8月至同年11月，而“泰山肃托案”则发生在

1940年8月至1942年2月。按说，“湖西肃托案”被制止、纠正后，不应该发生同一恶性的泰山区“肃托”错案。因为194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明确指出：湖西地区“在所谓肃托斗争中，曾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暗害分子王须仁的阴谋下，采取非刑拷打，指名问供，有供即捕等诬陷手段，其结果不仅造成乱打乱杀的恐怖，而且使湖西地区党政军民工作都受到了极大损失，地方党在该地区内辛苦缔造的工作基础，悉被摧毁；忠实的党员和群众，遭受无辜的牺牲。”遵照中央的决定，暗害分子王须仁和王凤鸣以及对这一事件负有重大责任的湖西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等人，分别受到了严厉处分，对无辜牺牲者进行了平反昭雪，对被难者家属进行了抚恤。

尽管中央对“湖西肃托案”作出了决定，但并没有刹住“泰山肃托案”这驾狂飙的马车，在错误的斜路上又急驰了1年，个中原因更值得深入思考、探讨。

二、荒唐案情

1939年，莱芜境内的北部山区是泰山区的一块坚固抗日根据地，是中共泰山地委、泰山专署、泰山军分区的机关所在地。这一时期，泰山区中共的力量得到空前壮大，仅莱芜县就发展党员8000人。但在吸收新党员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操之过急，政审不严，致使党员成分复杂，思想不纯。加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伪、顽呈现合流之势，一度出现了奸细分化瓦解中共组织的破坏活动。

在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中共山东分局发出了开展锄奸工作的通知，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进行清理整顿，旨在纯洁党员队伍，加强党的建设。这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必须做好的。但是，由于个别领导干部在锄奸工作中提出了“怀疑一切”的工作方针，从而出现了严重扩大化。自1939年初泰山特委（后改地委）第一大队（后改军分区）建立军法处、吕剑光（莱芜人）担任处长后，在社会镇反工作中就露出了偏激冒进、捕杀无度的错误苗头，继而蔓延到作战部队。亲历者亓象岑1984年撰文说：“我曾亲眼看到在李条庄一次杀死战士5人，在野店村一次杀死战士4人。有的是小题大做，有的是主观臆测，酷刑逼供，屈打假招……1939年夏天，泰安大汶口有7个青年学生（4男3女）出于抗日爱国热情，经秘密相约一起逃到莲花山（新泰西北境），找到泰山特委第一大队参加抗日。只是因为怀疑他们是被敌人派来的奸细，便在野店村被一起杀掉了。”（亓象岑《泰山区“肃托”错案》）这种混淆黑白、不分敌我的错误做法，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反而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赏识。

康生的“肃托”指令下达后，泰山区的锄奸工作在擢任地委社会部副部长吕剑光（部长由地委书记刘莱夫兼）的主导下，在许多人还没有搞清什么是“托派”的情况下，就将斗争矛头对准了有名无实的所谓“托匪”，上演了一场自相残杀的历史悲剧。

“泰山肃托案”，就是极端思想酿成的系列冤假错案。

此案由怀疑泰山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刁芙蓉肇始。刁芙蓉原名王毓鉴，于1937年6月在北平私立宏达高中读书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后，随平津流亡学生返回山东参加抗日工作。同年9月，他在无棣县由李安民介绍入党，旋即日寇入侵山东，混乱中与李安民走散，失掉了组织关系。1938年春，又经杨士法介绍重新入党，年底到中共山东分局青委会工作。1939年冬由省青委会派到中共泰山地委青年部，次年担任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

1940年夏季，泰山地委青年部长、泰山区青救会主任兼地委机关党支部书记彭

子芳和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范琳（著名民主进步人士范明枢孙女），在向地委汇报机关人员思想状况时反映：听说刁芙萃的胞兄王毓铨（旅美著名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经周恩来批准回国，任中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可能是“托派”，去美国留学后，刁与其兄通过书信；刁对地委社会部的工作有些不同看法，认为“杀人太多”，对党不利；他还曾流露出对地委宣传部部长董琰不够尊重的情绪。据此，彭、范估计刁芙萃有可能是“托派分子”。这时恰值地委社会部副部长吕剑光从山东分局学习归来，闻知刁芙萃的上述情况后，引起高度重视，未作深究即布置了对刁的暗中侦察。

事有凑巧。这年的麦收前，莱芜县鲁西区委宣传委员陈峰（原名陈际云，鲁西村人）曾在家中酒后失言，对鲁辛乡党总支书记李希伊说：“待麦子熟了，要动员鲁西村贫苦农民抢地主一点麦子吃。”虽然李希伊没拿此话当真，未作具体布置，鲁西村也没有发生抢麦子事件，但陈峰说过的话却传扬开来。此事被负责侦察刁芙萃的地委社会部代一科科长刘敬斋（莱芜人，后更名刘波平）知晓，遂上纲上线，认为这是一桩“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并把这件事情和他负责侦察的“托案”联系在一起。恰在这个时候，刁芙萃到兰沟崖村（莱芜县鲁西区委驻地）检查宣传教育工作情况。区委书记郭居鉴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油坊东家之一，便准备了四盘菜摆在桌上，打算汇报结束后留刁吃饭。此事被刘敬斋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当汇报接近尾声时，鲁西区抗日自卫团团长元信忱（兰沟崖村人）也因公事来到现场。刁芙萃婉拒了郭居鉴的盛情挽留，坚持赶回机关用餐，郭、陈、元、刘四人一起送走了他。尽管负责侦察的刘敬斋亲眼目睹了刁芙萃拒餐一幕，但仍将“破坏统一战线”“吃吃喝喝”等情况串接起来，作为“托匪”活动的“证据材料”报告了地委社会部。刘敬斋这种罔顾事实、罗织罪名的荒谬做法，是造成“泰山肃托案”的直接导火索。

中共泰山地委社会部轻信了刘敬斋的一面之辞，在未作复查、核准事实的情况下，就草率地据此“汇报”提出了“破案意见”。经地委同意后，于1940年8月下旬逮捕了陈峰，陈峰成为“泰山肃托案”的第一个蒙难者。社会部根据屈打成招的“口供”，于8月28日逮捕了该区的元信忱。然后按照陈、元二人的“口供”和原来的“材料”，于同年9月间逮捕了刁芙萃和郭居鉴。此后，再根据酷刑得出的新“口供”，按图索骥，辗转牵连，迅速在地委机关和莱芜县、区机关逮捕了近30名党员干部。呈现迅猛扩大之势，造成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恐怖局面。

1940年9月底，获悉敌人行将对泰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为了丢掉撤退中的“包袱”，决定立即处决一批“托匪分子”。于是，9月29日夜，在莱芜北部牛头河村处死了陈峰、谷德、刘子芬、王俊峰、王莹等16人。加上在这之前因坚贞不屈、酷刑致死的莱芜县委南部办事处书记李耐夫、莱芜县青救会会长孟华，共18人。但李耐夫、孟华被刑讯致死问题社会部并未报告地委，擅自将二人列入被处死的18人中。这是“泰山肃托案”的第一批被错杀者。9月30日凌晨，在反“扫荡”途中，又分别杀害了刘进和王鉴等数人。无辜被杀的这些热血青年，均系“七七事变”后首批投身八路军、参加抗战的仁人志士，都在20岁左右，正值激情澎湃、青春燃烧的黄金年龄。

首批被捕者中，幸免于难的仅有元信忱、元丰珠、郭居鉴、李新华等6人。行刑那天，刘敬斋带着这些被折磨得几近麻木的“人犯”残忍地陪斩，亲眼目睹血淋淋的一幕，以示镇慑警诫。据幸存者元信忱后来回忆：所有被处死者都是用刀砍头，行刑过程是每个人各自挖好土坑，第二名把被斩的第一名埋好后再等候斩首，可谓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第一批被捕的30人，除上述6人因“坦白彻底，可以争取”被释放外，只留下了被认定为“托派骨干”的刁芙萃和王墨林，计有22人被杀。

刁芙萃经不住严刑拷问，违心地承认自己是托派的“泰山地委书记”，又在同样

的情况下谎称彭子芳是托派的“地委组织部长”、王墨林是“宣传部长”。既然刁、王二人“承认”是“托派地委负责人”，就属于“要犯”，为继续追逼“口供”，故9月29日暂未处决。30日凌晨，反“扫荡”战斗打响，地委社会部负责人仓促安排两个只带大刀的战斗，看守戴着手铐并被捆绑的刁芙萃和王墨林，然后率领社会部的武装人员匆忙转移。旋因敌人愈逼愈近，空中又有敌机扫射，看守人员各自脱岗逃跑，刁、王二人分别在两个山沟里被敌俘获，带到莱芜口镇据点。敌人问清了他们的情况后，将刁芙萃押往莱芜县城，把精神已经失常的王墨林滞留口镇。不久，地下工作人员魏佑钿按照地委社会部的秘令，将王墨林骗出据点，被劫回泰山地委社会部后处死。新中国成立后始知，刁芙萃失去自由后为敌所逼，间断地做过一些伪事，并因此建国后而获刑，但事实证明与“托匪”毫无干系，纯属冤案。后来终于查清，不仅泰山地区没有“托派”，而且整个山东都不存在“托派”，完全是人为制造的一场荒诞闹剧。

刁芙萃和王墨林的被俘，使“泰山肃托案”更加复杂化。反“扫荡”结束后，泰山地委青年部部长彭子芳也遭逮捕。彭子芳生于1914年，辽宁开原人，1932年在天津南开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前在北平东北大学电机系读书，“七七事变”后随平津流亡学生撤至山东。其父彭振国曾任东北军的军长。据彭子芳之女、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教授彭一、瑞玲回忆：彭振国与高崇民、阎宝航一起在东北发动组织过抗日部队，失败后寓居、病故于天津；彭子芳的弟弟彭德权“七七事变”后在奔赴延安途中被国民党杀害；彭子芳在抗战前曾与吕东（建国后曾任冶金部部长、三机部部长、国家经委主任、中顾委委员）一起做地下党工作，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虽然当时有人对此案提出疑问，但因彭子芳出身不好，轻信酷刑得到的“口供”，彭子芳最后还是被无辜杀害了。

“彭子芳案”株连了前述泰山军分区民运科科长刘佩久。刘佩久原名韩维密，邹县人，抗战前就读于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并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乡师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任作民生前曾撰文说：“韩维密（刘佩久）同志于1933年2月下旬因交通员庄少云叛变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7年底在党的营救下无条件释放……”

（任作民《两次被捕情形》）时任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董琰（新泰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卫生部政委刘特夫（德州人），地委委员、敌工部长兼泰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枚青（新泰人）和韩维密在一起坐过牢，都知道他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强。不巧的是“刘案”发生时，了解情况的董琰、刘特夫均不在泰山区，而李枚青则因妻子白超被疑“托匪”而撤销职务，剥夺了发言权。就这样，刘佩久在失去有效证人的情况下被冤杀。由于彭子芳被捕前曾去泰安（东）县青救会检查过工作，认识青救会长高华（又名萧雨辰）、组织委员夏荣和宣传委员于英民（原名鲁宝珩），地委社会部就将三人推定为“托匪泰安县委的成员”，并牵连了泰安（东）县委宣传部青年干部洪鹏、方正。他们于1940年9月被捕，受尽了身心折磨。后因泰山区行政专署专员赵笃生提出不同意见，并为其作证，地委社会部才释放了王墨林之妻鲁宝琰，其胞兄鲁宝珩（于英民）等人也随之躲过了一劫。

与此同时，1940年夏天莱芜县连续发生了“王大脚案”“沈念武案”和“王浩案”等错案。在“王案”中，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因怀疑汶南区李条庄妇救会长王大脚（未裹脚而得名，娘家姓亓，夫家姓王）与汶南区云凤乡党委书记亓凤鸣“男女关系不正常”，被臆断为“托匪”处死，并牵连逮捕了一大批人，横遭皮肉之苦、精神摧残。在“沈案”和“王案”中，莱芜口镇区委书记沈念武（一说口镇区委民运委员）、寨里区委组织委员王浩等人，先后因街谈巷议的“疑点”，未经核实就被错杀，数人受株连而罹难。同年9月，因泰山专署文教科科员刘进对科长刘蒲村的思想

方法有些意见，并对处理一些工作提出过不同见解，就被当作“托匪”怀疑对象抓了起来，在9月30日反“扫荡”途中处死。此案株连了一些与他有联系的学生，在第一批被错杀的人中就有邵毓举、王立军等人。同年冬天，泰山地委社会部还无中生有地制造了“章丘县冯干、吕东生案件”，以“搞挑拨离间、搞小集团、有破坏言论、搞恋爱……”等莫须有的“罪名”，枉杀了优秀干部冯干、吕东生、高玉珠、菊耐等人。其中的菊耐曾任泰山专署锄奸科科长，因对社会部侦办的“肃托案”持怀疑态度，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从而引起了社会部负责人的不满，以菊耐与淄川妇救会长马淑贞谈恋爱为由，将其调离工作岗位，名义上到后方党校学习，实际上却当作“托匪嫌疑”抓捕。严刑逼供时将菊耐的两肋烧烂，致其奄奄一息，痛不欲生。更不可思议的是，菊耐被秘杀后泰山地委社会部却宣称：“菊耐在后方党校学习时，逃跑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沈把他交给叛徒、国特、国民党的莱芜县长刘伯戈，刘伯戈在莱芜县孝义村一带杀掉了菊耐。”

1941年初，泰山地委社会部联合莱芜县公安局，逮捕了莱芜县委民运部长李雪峰和莱芜县妇联主任白超（枣庄人，流亡学生，李枚青之妻）。此时，因“侦破刁芙萃案有功”的刘敬斋已出任莱芜县公安局局长一职，得到了重用，在“反托”问题上依然惯于捕风捉影、构陷冤案，充当着极左思潮的急先锋。李、白忍受不了致人死命的酷刑，又牵连出了许多人，并逼迫李、白“承认”了是“托派的县委负责人”。随后，李雪峰和白超被确定为“托匪主犯”，押往中共山东分局社会部处死。当时白超还不到20岁，已有身孕，即将临盆，在路上因奋力抗争而被活活勒死，残害了一人两命（一说分娩后处决，母子皆亡）。其他人均由泰山地委社会部处理。

1941年3月，莱芜县公安局以锄奸为由，擅自作主，逮捕了一部分所谓“托匪分子”。其中有县委秘书处会计元立华、县委行政秘书李德霖、县文教科科长田长啸、县民政科长韩寓吾、公安局警卫排班长王若恒等若干人。泰山地委书记刘莱夫闻讯后，对莱芜公安局越俎代庖、违反组织原则的做法十分不满，立即委派蒋方宇赶赴莱芜调查核实。蒋方宇和莱芜公安局长刘敬斋一起提审了元立华、李德霖、王若恒等人。先问其中被捕的一个战士“是不是托匪”，那个战士说没干过“土匪”。又提审王若恒，逼问他“是不是托匪”，他就说“是”，但却语无伦次，漏洞百出；让他说实话，他就说“不是”。再提审李德霖，他承认先前酷刑下的“口供”，但却声明刚加入“托派”，既没有活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最后提审元立华，他承认是“托匪”，但却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再三追问，他就跪下说“蒋部长给俺作主”，并说以前的口供都是胡编的。

1941年4月，地委社会部直接插手莱芜县的“肃托案”，通过严刑逼供，迫使田长啸等人承认了第二个“托匪县委”。经地委批准将被捕的一般人员在莱芜杀了一批，放了一批。田长啸，韩寓吾、李德霖作为“托匪县委”的主犯，押送中共山东分局社会部，田长啸被处决，临刑前大喊“冤枉”，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韩寓吾释放，李德霖戴着“托匪”帽子下放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前卫报社印刷厂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得以雪洗“罪名”。

1941年春天，泰山地委社会部负责人赴新泰口头传达说，地委决定逮捕胡美贞、李玉琛、杨毅刚、赵文和、张元德等人。因李玉琛正在鲁中区党校学习，只逮捕了其四人。后来又牵连上李振东、王守全、秦成西、陈传贵、秦梅轩、张俊亭、戴彬等人。除新泰县委书记周星夫、组织部长延春成、县大队副教导员曹礼琴、公安局长朱礼泉外，其余基本上都被“咬”了进去，六、七区的干部也大批被株连。此案错杀了李玉琛、杨毅刚、赵文和、张元德、李振东等一批“顽固不化”的干部。同年夏天莱芜城区区委书记沈磊光在反“扫荡”中率区队武装转移到安全地带后，为鼓舞士气领

唱了一首抗日歌曲，即以“引导敌人”的“罪名”，当作“托匪”处决。

1941年春季泰山地委社会部改为泰山区公安局后，转任公安局局长的吕剑光继续狂热地推动“肃托”运动恶性发展。同年秋天，在没有弄清谁是“托匪”的情况下，仅凭“据说博山有一个知名人物，姓翟，是个奸细，要布置侦查”，就抓捕了博山抗日民主县长翟翥武、县委民运部长谢伯望、县委青年部长谢诚中、县政府教育科长魏行之、“各救会”（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干部杨立夫、王醒吾以及翟翥武常住的房东、军属于凤岗8人。幸亏这时中央察觉了山东“肃托”严重扩大化问题，采取紧急措施，才使翟翥武等8人幸免于难。

1941年初冬，中共中央电告山东分局：被当作托派处死的彭子芳同志是老党员，是个好同志；要注意假案。中共山东分局也迅即指示各地“要注意假案”。中央电令和山东分局的指示传达后，泰山地委内部主张慎重从事的意见开始上升，但这并没有遏制极左派们的恣意妄为，致使泰山区“肃托”错案继续发酵，连续发生了逮捕上百人的“学山案”和“泰莱边案”。

所谓的“学山案”（亦称西峪案），由一起争风吃醋的情杀案引起。1941年冬，莱芜公安局上游镇特派员、学山村的李友恩因情感纠葛杀害了抗日村长李友芝。李友恩作案后，担心东窗事发，凶案败露，遂勾结与被害人因家产纠纷积怨已久的李忠年（李友芝叔父），伪造了一份“托匪材料”，把认为对此案有可能构成威胁的人，均列入了“托派组织名单”，同时还伪造了其他材料，用布包好，秘藏于村外路边的田中。1942年1月下旬，在学山村养病的莱芜县公安局侦察股长痊愈回局上班。这时的李友恩刚调入县公安局做侦察工作，闻讯后专程赶回，陪伴侦察股长同行。二人出村不远，李友恩佯装到田里小解，顺手捡起了那个布包，当着侦察股长的面打开，里面除“托派名单”外，还有“托派行动计划”及“与日伪军联络点”等。侦察股长见事体重大，带回公安局后立即上交。莱芜公安局在没有进一步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匆忙报告了泰山区公安局。迅即，区、县公安局组成联合“破案组”，按名单逮捕了雪野区高等小学校长朱勤民、区参议员朱寿卿、小学教员韩子安、区民政助理员毕杰三、区采购员梁效文、油坊经理朱先觉、油坊伙计朱玉琳、小学教员韩子建等近20人。经多次刑讯逼供，他们都“招认”了“托匪”的身份，泰山地委也做出了处死朱勤民等3人的决定。千钧一发之际，被奉命前来复查泰山区“肃托”案的山东分局社会部审讯科长高明宇果断制止。

所谓“泰莱边案”，发生于1942年1月，一夜之间逮捕100多人。1941年12月，害怕参军参战的香山区店子村落后青年农民陈殿文，被香山区公安特派员张九田动员出来在本村做公安工作，许诺只要干出成绩，即可免除参军义务。陈殿文欣然应允，遂就职店子村的公安员，并入了党，成为村党支部委员。为表现积极、免除兵役，陈殿文不断向张九田汇报捏造的“敌情”，蓄意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将本村党支部开展的抗日工作颠倒为“托匪活动”，把民兵的早操诬陷为“托匪准备暴动”，还谎称民兵统一着装的背心是“暴动信号”，等等。张九田不会轻信这些空口无凭的“汇报”，要求陈殿文设法搞到“托匪”文件。于是，陈殿文就煞费苦心地秘密炮制了一册“托匪登记表”，并绘制了香山区地图，用布包好藏于麦田。1942年1月的一天，陈殿文在陪同张九田途经那块包藏祸心的麦田时，以小便为由取回了布包，假说是偶然发现捡到的。泰山区、莱芜县两级公安局对这些弥天大谎竟深信不疑，在未经详察的情况下，就于1942年1月的一个夜晚突击抓人，迅即处死了香山区长郭子彬、农救会长王子周、上港区长魏光涵3人，还杀了村里的数名党员干部。正要大开杀戒时，又被火速赶到的高明宇紧急叫停，挽救了这些无辜者的生命。

三、真相大白

发生在泰山区的几个“肃托大案”，终于引起了中共山东分局的警觉。同时，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肃托”案件也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注，急令各地立即停止“肃托”，纠正错误。

1942年初，中共山东分局社会部审讯科长高明宇奉命专程到泰山区调查“肃托案”。在这之前，高明宇已经发现了泰山区“肃托”的错误倾向。“1942年新年前，山东分局调审翟翥武案，地委社会部审讯科长夏新生同志押送翟翥武等8名同志到山东分局。当时山东分局驻沂南县东西四堡村，社会部驻刘家城子村，社会部长刘居英同志到湖西区去了，由分局社会部审讯科长高明宇、审讯股长王斌和小韩（已牺牲）等三同志听取夏科长的汇报。此前高明宇同志通过地委社会部上报的书面材料已看出可能是假案。夏科长汇报中谈，侦查到的翟翥武的‘托匪’罪证有九条：一是不爱护根据地，例如睡觉铺草过厚；二是仇视保卫干部；三是吸用从敌占区流入的纸烟；四是搞三角恋爱（指翟跟另一男同志的爱人谈过话）……汇报到这里，高明宇同志不耐烦地说：不要汇报这些问题，这些材料就能说明他们是托匪吗？要汇报与托匪有关的侦查材料。夏便无言可答，汗流满面，没有再汇报下去。”（沂蒙岑《泰山区“肃托”错案》）高明宇感到问题严重，立即报告了山东分局，引起了领导层的高度重视，责成他代表山东分局社会部，急赴泰山区纠正错案。

高明宇在泰山区听取了几个案情汇报后，当即提出了诸多疑点，特别是通过对“学山案”和“泰莱边案”提供线索的李友恩、陈殿文的笔迹调查，初步认定两案的所谓“托派名单”系李、陈二人伪造。经过传讯李、陈二人，案情很快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对其他“肃托案”也一一作了否定。不久，高明宇调任鲁中区公安局长一职，遵照山东分局的指示，指导泰山地委在莱芜雪野区小西坡村召开群众大会，为被捕和被杀人员公开平反。高明宇在会上宣布，所有受害人员一律恢复名誉、恢复工作；罪犯李友恩、李忠年判处死刑，当场处决。不久，泰山地委、专署在泰莱边的焉家庄召开群众大会，对“泰莱边案”公开平反，同时对泰山区在两年内搞的“肃托案”全部平反。会上，专员赵笃生代表地委、专署向群众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当众宣布全区因“肃托案”被错杀的人员，除极少数人待查定性外，其余一律追认为烈士，被捕人员一律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同时判处陈殿文死刑，立即执行。还宣布撤销直接责任人吕剑光的职务，调离泰山区。在党内，中共山东分局决定给予吕剑光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鲁中区党委和泰山地委严重警告集体处分。同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调整了泰山地委领导班子，由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政委汪洋兼任泰山地委书记，刘莱夫降职为副书记。



当年发生在临费沂边联县的一起“肃托”案件

郑玉强

—

那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局面、遍地充满烽火硝烟的一年。那月，是恰恰五黄六月暑季来临的季节。那天，是天气闷热使人感到喘气不舒的一天。

夜幕低垂，不觉夜深人静，上弦月慢慢从东方升上来。临费沂边联县青驼区艾于湖村一农户家里，驻扎在这里的鲁中区党委社会部的人员不仅没有休息，反而更加忙碌起来。朦胧夜色中，几个稍年长者背着手站在院子里，另几个年轻人奔向一间屋子里，押解出五六个五花大绑的人。然后，他们一起静悄悄地走出大门口，脚步窸窣，向村南蒙河岸边的一处沟岔那地方走去。被绑的人中，有一位身材高挑、略显瘦弱的30多岁人士，戴着一副眼镜，走在最前面。他后面，是一位衣着粗朴的农民，沮丧地低着头……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那条沟岔旁，停了下来。沟岔里有着不多的积水，两岸长满了茂密的蒲苇和一些或立或卧的水草。上弦月挂在西南天，灰蒙蒙的光芒笼罩着沟岔周围的一切，什么动静也没有，也没有什么人说什么话，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像早已排演过一样机械、类似麻木地进行，没有抗拒，没有指令，没有颤栗。只有黑暗中传来几声“咔嚓”的声响。近处的人似乎看见了抡起的大刀片在黑暗中闪出的寒光。第二天，消息传出：社会部又“肃托”了几个。此时，为1941年7月下旬某日的半夜。



大学时期的
田子珍

被“肃托”者何许人也？说来你可能不大相信，戴眼镜的那位年轻人，即才上任刚满一年的临费沂边联县县委组织部长田子珍，大学生出身，是一位年轻精干有才有为的青年干部。那位农民模样的人，即常山区横河村党支部书记李某某。这位田子珍，并不是本地人。他原名田衍孚，字子珍。1909年生于东平县七区田大店村（现属梁山县）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里。1925年，他16岁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济南师范学校），在校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29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开始接受马列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学校除名。

1932年（1933年），田子珍回到东平老家，被聘为东平县第三小学语文教员、校长。1936年他聘请东平人万明理到学校任教。1937年，经由董临仪、万明理（即建国后相继担任省委书记、铁道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介绍，田子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田大店小学党支部书记，并和万里一起，在师生中创办“读书会”，介绍了大量进步书刊引导师生们去阅读。

“七七事变”以后，在中共山东省委特派员董临仪的指导下，担任中共东平县委委员的田子珍积极联络东平、汶上等县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在田大店秘密集会，组织“农民福利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日团体。他与哥哥带头收集枪支，准备组织抗日武装。自己动员家庭献出步枪3支，手枪1支，银元200余块，联合刘星、陈伯衡、曹志尚等人，于1938年2月5日带领100余人、枪50余支，赴汶上县永安寺，与汶上的部分人汇合，成立了“东汶抗日游击队”（又称“东汶人民抗日自卫队”），在汶上县杨集、白塔一带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6月，东汶抗日游击队进行整顿改编。之后，田子珍离开队伍重回地方工作。在田大店村，他继续发动青壮年参加八路军抗战，动员两个侄子带头参军。他又组织了100多人的连队。于同年冬，带领这个新兵连到达长清大峰山，编为八路军六支队一团一营二连。

整编完毕之后，党组织安排田子珍去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从此，他来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心——沂蒙山区，跟随分局党校辗转于岸堤、王庄、青驼寺一带，一

边学习，一边开展抗日活动。1940年6月党校毕业后，山东分局分配他到临费沂边联县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其间工作开展得得心应手。

1941年3月，临费沂边联县县委书记王介福带领县大队过路，在土山区土山村（今属沂南县大庄镇）遭日军飞机轰炸被炸伤大腿，伤势严重。据说，当时是县大队转移到哪日军飞机就跟到哪轰炸。有人怀疑，似有内奸在联系指引。

专门负责内部锄奸工作的鲁中区社会部闻讯来破案了。部长朱毓淦亲自带队，来到边联县调查。一来二去，最后竟把组织部长田子珍抓走了。有人这样反映，说田子珍包袱里经常带有一块镜子，行军每到一个驻地就拿出来照自己。那时候，条件艰苦，每位工作人员大都用块布包裹日常用品，行军住宿随身带着。

三个月后，田子珍等即在鲁中区社会部驻地艾于湖村遭杀害。

二

1981年11月6日，沂南县有关部门曾派员拜访抗战期间在临费沂边联县委组织部任组织统计干事、建国后任黑龙江省广播局局长的杨树涛，谈起这段历史时，杨是这样说的：

“1941年3月，王介福在土山村北敌机炸伤腿部。他当时带县大队过路。当时医院没了，养伤只能在县境内，躺在担架上由几位民兵轮流抬着到处转移，一夜转移多次，最多的时候一夜转移七次。有好几次，是我们出村，敌人就进村里了。形势就是如此严峻。……田子珍是1941年秋大扫荡之前被杀的。在艾于湖。召开几千人大会，每村去几个人，当时是山东分局召集的。朱瑞讲话，刘居英讲话。之后他没意见，就杀了。原因说他是托派。王介福被炸怀疑有他的事儿。他画了一匹马，马很胖，马夫很瘦，就说他是托派。”

1982年4月23日，在采访当年边联县委书记、建国后任国务院某部副部长的王介福时，他是这样说的：

“田子珍案件是冤案。山东当时有几个案件，一是湖西‘肃托’，白子明等人搞的，这股风刮到了铁路东。山东分局、鲁中区各级社会部都学了这一套。二是山东分局机关、岸堤干校、山东纵队机关也都进行了‘肃托’，致使部分党员干部被逮捕，有的惨遭杀害。后来中央来电报指示不能再杀，没有这么严重，基层没有‘托派’。

沂蒙肃托是朱毓淦搞的。当时，山东分局驻青驼寺，鲁中区党委驻艾于湖村。有一天，朱毓淦去了边联县，问我郭西三怎么样，刘亚明怎么样，他认为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他想杀人。

3月7日（1941年）日军扫荡，我受伤昏迷不能动。当时医院没了，直到后来才住院。在这期间，朱毓淦把田子珍抓起来，说他是托派，我这次负伤与田子珍有关。7月份在艾于湖把他杀了。当时就是搞逼供讯，演戏，牛头马面，熬老鹰，直到逼你承认……

我当时正在住院，不知道这事儿。还是冯乐进和我说的。后来，万里同志说，他怎么是托派呢？是我介绍入党的党员。杀田子珍，是省战工会负责人批的，鲁中区社会部杀的。”

1986年6月15日，中共临沂地委组织部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的山东省委《关于对湖西“肃托”案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精神，为田子珍平反，恢复党籍。沂南县万松山鲁中烈士陵园留其革命烈士英名。翌年清明，中共沂南县委派员将田子珍遗骨送往梁山县安葬。一代抗日英豪终于魂归故里。

曾国华传 (六)

王连城 曾林辉

十、黑土地血红雪白

1945年10月，曾国华被任命为山东解放军第三师副师长。正在胜利执行大反攻任务的三师突然接到进军东北的命令。师长王建安、政委周赤萍奉命留在山东，由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带三师去东北。副师长曾国华和副政委李伯秋则负责具体组织部队跨海闯关东。

曾国华、李伯秋接受任务后，首先感到这是一次离开根据地、奔赴新战场的大行动，时间紧、任务急，又不能公开动员，对内对外都得严格保密，所以在鲁中集结部队时向下面说：东北有日本人囤积的大批军火，即将运到山东，部队要开到胶济路去接收新武器。经过7天急行军，赶到了胶济路，又对部队说：“海上风浪大，船没有到，要到龙口去等。”部队又走了半个月到达龙口，这时才向部队传达向东北进军的命令。

曾国华和李伯秋商量，部队的思想弯子转的太急，抗战胜利了，又离开家乡去关东，一下子不易想通，所以要作深入的思想工作，首先要把基层干部思想搞通。他们分工，李伯秋抓思想教育，曾国华负责过海的组织工作。他们要保证部队开得动，不出现非战斗减员。

按照上级规定，部队的武器弹药包括干部的手枪要全部留在山东，每个连只带两支步枪用于站岗放哨。对此有些战士舍不得，他们手中的枪有的是自己从鬼子手中夺来的，有的打死敌人立过战功，大家思想不通。曾国华向部队宣布：这是军事纪律，东北有新枪新炮，不丢下旧的就没有新的，必须坚决执行。

曾国华又召集各团干部开会，安排渡海行军序列，分配船只，并要求部队遵守乘船纪律：

- (1) 尊重船老大，说话不得带“翻”“沉”等不吉利的字眼；
- (2) 夜间行船，严禁有火光；
- (3) 大小便要报告，不得在船上乱走动；

(4) 如果船出故障或遇大风，要听从指挥。

曾国华强调，我们要安全渡海，这也和打仗一样，这些就是战场纪律，要传达到每一个战士，各连都要写出书面保证。

当时的渡海转移，部队要求少带孩子。恰在这时曾国华刚满1周岁的儿子患下额腺炎化脓，开刀时没有麻药，脓没有挤净就缝合上，孩子的脖子还是歪的。曾国华的爱人刘时铁考虑当地医疗条件不行，托给老百姓不放心，想把孩子带上，就同曾国华商量。曾说：行军打仗怎么能带小孩子，留下，托给地方老乡。刘时铁知道和他争辩没有用，就去找李伯秋请求。副政委一看情况特殊就点了头。刘时铁没让曾国华知道就偷着让马夫带孩子上了船，当曾国华检查各船发现孩子在船上时也只能默许了。

11月末，山东三师作为山东部队挺进东北大军的第三批，从黄县龙口登船渡海。他们分乘30艘汽船，140只帆船，大船能乘1个连，小船只能坐两个班，分批次启航出海。

曾国华和李伯秋带少数随行人员分乘两艘汽艇率先出发了。航行一整夜，曾国华等在皮口登陆，大部队则在皮口和庄河两地陆续上岸。曾国华指示参谋人员立即掌握部队到达情况。在陆续报到的船只中，发现师部管理科长王继增带的警卫连、侦察科长韩少峰带的侦察连、二团特务连这3条大船共有500余人未按时到达，在管理科长带的船上有机干干部和家属。曾国华的爱人和儿子也在这条船上。曾国华、李伯秋都很着急，派出汽艇寻找也未找到。原来，王科长的船因风浪过大，船老大把帆降下来，在海上飘流了几天，他们带的粮食和水都用尽了。韩科长的船触礁，船底进水，都快淹到人的脖子了，幸亏遇上一艘运梨的商船救了他们。特务连的船是误入老铁山水道被苏军“老大哥”扣起来了。后来，王科长的船6天后到达，曾国华见到儿子十分高兴，对刘时铁说：我还以为你们母子已经葬身鱼腹了呢！第二天韩科长的船也到了。韩科长向曾国华报告：“师长，有惊无险，一个没死。”两个船老板见了曾国华就下跪磕头，“托八路军的福，我们没有丧命”。曾国华请管理科给救人的商船发了奖金，给触礁的船老板回家的路费。又过了10天，二团特务连在辽阳赶上大部队，这时团里正准备给他们开追悼会呢。

三师部队在皮口、庄河稍事休整，即赶赴普兰店搭乘火车进驻辽阳、本溪地区，与先期到达东北，已从沈阳撤出的冀热辽十六军分区的部队会合。

曾国华、李伯秋随罗舜初政委见了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首先商量解决三师部队的枪支问题和就地扩军、肃清土匪的事宜。十六军分区到达沈阳后收缴了日军留下的大量武器，三师部队用新枪新炮一下子武装起来。又在本溪、抚顺煤矿将一批抗战时被日军俘虏下井做工的国民党士兵补充了部队。

1946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成立。纵队首长和机关都由辽东军区兼任。山东三师编为三纵七旅，曾国华任旅长，李伯秋任政委。

1946年2月，刚开到东北的国民党新六军二十二师占领了盘山、台安一带，进逼辽阳。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华决定，以南满主力三纵、四纵向敌二十二师发起反击。三纵当时没有纵队机关，因而3个旅是各自为战。曾国华的七旅任务是，配合四纵围歼盘山以东沙岭子地区的敌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和辎重营。2月15日，曾国华指挥部队从辽中出发，经台安奔袭敌人的辎重营。这时的冬天，呵气成霜，滴水成冰，积雪一尺多深。部队在漫及腿肚的雪地里跑了一天一夜，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发起攻击。当我军尖刀班的枪口逼敌哨兵“不准动”时，一个四川口音的敌军还在说：娘卖×，跟老子开啥子玩笑！”当敌人真的明白八路军杀来时已经晚了。不过刚到东北的国民党军也不示弱，立即用其美式武器顽抗。七旅则发挥夜战近战的特长，速战速决，全歼敌辎重营。

曾国华又指挥七旅进至台安以南，配合四纵6个团攻击沙岭子。经过三夜一昼的激战，歼敌近700人，但我军伤亡高出敌军两倍多，特别是经过八年抗战的战斗骨干伤亡大。七旅十九团在撤出战斗时，五连副连长张佃举带领一个排掩护，阻击敌人达3个小时，打退敌人一个营的多次冲锋，身上负伤6次仍坚持指挥直到光荣牺牲。曾国华、李伯秋呈报军区追认为战斗英雄，命名他担任过排长的六连三排为“佃举排”。

2月25日，七旅撤至辽阳附近的刘二堡一带休整。在辽东军区提出的“研究敌人，对付敌人，消灭敌人”的口号下，七旅自上而下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总结。曾国华怀着沉重的心情在干部会上说：沙岭子战斗是我们到东北后的第一仗，也是和国民党新六军这个王牌部队的第一次接触。尽管我们这些经过抗战的老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可歌可泣，但仗打得不顺利，进攻受挫，付出代价过大。接着他又对敌我双方作了分析：我们面前的新六军自恃远征军、美式装备，傲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看不起我们这些被他们称为“土包子”的八路军。我们又觉得你们打鬼子时跑哪儿去啦，现在打我们来劲啦！又咬牙切齿地恨，又不服气。应该说，比士气，差不多，各有长短；比武器，我们不行，人家有冲锋枪、六〇炮、火焰喷射器；比技术，枪炮打的没有人家准；比战术，我们打游击战行，打运动中的攻防战还得学。就有一样我们比他们强百倍，这就是不怕死、不怕苦的战斗作风，有了这一条，没有的我们可以有，不会的我们可以学。最后他还强调：我们以后的作战对象主要是新六军，要寻找战机狠狠地挫挫它的锐气。我们要学会打运动战，克服游击习气，要赶快掌握手中的武器。

1946年3月下旬，国民党在占领辽阳、抚顺之后，又集中新六军等6个师的兵力，以沈阳为基地向南满大举进攻。

4月1日，国民党二十五师、十四师同时进攻本溪。三纵奉命反击。曾国华、李伯秋率七旅在石灰厂、三人沟、大甸子地区与国民党二十五师激战一昼夜，毙伤700余名，将其击退。国民党十四师也在桦甸子遇到八旅的抗击，未能前进一步。“一保本溪”获得胜利。

4月7日，国民党又分兵三路，由其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指挥第二次进攻本溪。曾国华指挥七旅和徐国夫指挥的九旅一起，迂回包围左路国民党军二十五师，将其击溃，击伤其师长刘世懋。右路国民党军十七师也被四纵和八旅等兄弟部队击退。这次保卫本溪，连续激战8昼夜，共歼国民党军4000余人，致其十四师损失三分之一，二十五师损失近半。“二保本溪”再次胜利。

4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彭真，指出：“本溪保卫战的胜利，必能引起于我有利之变化。望通令全军鼓励士气，粉碎顽军之进攻。”一保、二保本溪的胜利，中央的表扬，使率部参加了这两次作战的曾国华走出了沙岭子受挫的阴影。他对政委李伯秋说，“人是吃一堑长一智”，我们接受了沙岭子的教训，开始变聪明了，现在部队的士气也上来了，要防止骄傲。李伯秋点头赞同。

4月中旬，曾国华的七旅奉命由南柞木乘火车北上，参加保卫四平的战斗。开始，七旅和八旅一起在四平东南地区构筑工事、阻击东路敌军，保障四平侧翼安全。

5月5日，曾国华又率七旅会同八旅南下开辟“第二战场”，在海青房地区与敌一九五师相遇，歼敌500余，将其击退。随之又开展大规模的破袭战，破坏了上百公里的铁路和公路。

5月18日，林彪见四平城北塔子山失守，无法挽回，当即命令部队撤退，结束了历时40天的四平保卫战。曾国华、李伯秋率七旅向东部山区转移，敌新六军尾随追击；七旅偃旗息鼓钻山沟，新六军大摇大摆走大路，坐汽车；七旅两条腿，有时跑了一天刚想宿营，敌人就追上来了，又得组织抗击，且战且退。部队困乏极了，情绪也



低落极了。曾国华、李伯秋面对这种情况，就觉得这样退下去不是办法，要寻找机会还击敌人一下，以振作部队的士气。这时，敌人的追击陆续停止，兵力由于占领据点而分散起来。

5月28日，侦察得知敌二〇七师一八一团三营孤军冒进，远离师团几十公里，驻进黑石镇。李伯秋向曾国华建议杀它个回马枪。曾国华随即决定抓住这个战机歼灭这股敌军。他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部署这次战斗，命令二十一团主攻，十九团助攻，要打歼灭战。曾国华又向大家通报：这个营是国民党青年军的主力，装备好，有3门迫击炮，9门六〇炮，6挺重机枪，每个连有9挺轻机枪，火力很强，和它打阵地战不行。我们还是老办法，打夜战近战，猛打猛冲，刺刀见红，不让敌人发挥火力。李伯秋又补充说，这股敌军的成员都是抗战期间征召的高中生初中生，训练有素，远征过缅甸，骄傲狂妄，他们乘着攻占四平的风头，气焰很嚣张，我们这次要狠狠打打它的威风。

5月29夜，曾国华指挥七旅发起攻击，敌人很有经验，立即缩进镇里，利用工事、房屋、墙垣，依靠火力，顽强死守。我军连夜行军，疲劳不堪，弹药消耗殆尽，没有炸药包、爆破筒等攻坚器材，只能用刺刀、手榴弹，接近敌人死打硬拼，在镇内与敌逐街逐巷争夺，血战一夜，虽然占领了大部镇区，杀伤了一批敌人，但是敌团长亲自指挥全营缩在几个坚固的院落里负隅顽抗。拂晓，曾国华只好命令部队撤出战斗，监视敌人，伺机歼敌。当最后撤出的十九团发现敌人要突围时，曾国华立即指挥部队进行阻击和围堵，打了一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毙敌200余人，俘其团长以下300余人，缴获敌人全部武器装备。七旅歼灭黑石镇的敌人后，部队的士气为之一振。曾国华指挥七旅又乘胜攻下桦甸县城，歼敌40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还有4辆汽车，残敌逃进山林。黑石镇、桦甸战斗胜利后，曾国华在干部总结会上说，这两次胜仗意义重大，因为这是在四平失守之后千里退兵中向敌人发起的首次反击，它振奋了我军的士气，也打击了敌人的锐气。东总在通令嘉奖中指出：黑石镇、桦甸战斗“对击破国民党军在东北扩大内战之行动，对保卫东满人民之和平、民主有重大意义”。

6月2日《自卫报》发表的《论目前东北战争形势》的社论中，在谈到分散敌人兵

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列举了“曾国华旅在黑石镇歼敌一八一团的战例”作为证明。

1946年6月6日，国共双方达成东北休战15天的协议，自6月7日中午生效。这时，国民党军进攻也攻累了，我军退却也跑乏了。实际上这次停战直到9月末，曾国华、李伯秋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休整机会。曾国华说，“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段停战时间，部队的体力要恢复，伤员要治疗，弹药要补给，干部要调整，兵员要扩充。”李伯秋说，“逃亡要杜绝，部队要巩固，士气要恢复。”曾国华说，“对极了！这是最重要的，你是老政治工作者，最有办法。”李伯秋政委早就看到这个问题，也正在考虑如何解决这个关系部队胜败的问题了。当时，七旅的部队成分有山东过来的老抗战，他们面临的是抗战胜利后还要打仗，由民族矛盾转为阶级矛盾的再教育问题。还有到东北后在农村招收的新兵什么也不懂，也没来得及教育；特别是从抚顺、本溪煤矿招收的矿工，他们大多是抗战时中条山战役被日军俘虏的国民党官兵，这些人对人民军队官兵平等很佩服，但是正统观念很深，坏习气改不了，为什么要打国民党还不明白。部队的思想相当混乱，士气低落，牢骚多，逃亡严重。由这部分人组成的二十团九连，沙岭子失利后指导员开小差了，四平一撤退，连长又不辞而别，当撤到东丰时，一个晚上就跑了22个。二十一团半个月跑了138个。李伯秋政委经过调查研究，针对部队这种思想状况，提出在部队中开展“诉苦”运动，进行阶级教育，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曾国华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他说：“先抓思想，不解决思想问题，手中有枪有炮也不管用，军事训练放在后面。”

7月间，七旅在休整中首先进行思想整顿，在连队迅速掀起了“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以此为内容进行了有声有色的阶级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功。经过这一教育，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思想稳定，官兵团结，斗志昂扬，真正奇迹出现了。那个问题最多的九连，经过诉苦由后进变先进，在1947年的夏季攻势中被命名为“英雄连队”。曾国华看到部队高昂的战斗情绪，积极的练兵劲头，高兴地对李伯秋说，“你真是立了大功，这比装备十门大炮都管用呀！”罗荣桓副政委评价这次诉苦教育，是部队教育工作上一个具有极大意义的创造。后来，毛主席曾亲自修改这次诉苦运动的经验，批给全军，称之为“新式整军运动”。七旅部队在诉苦教育所激发的求战气氛中进行了四大技术和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的战术训练，尤其强调了夜、近战和白刃战的演练。部队的军事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经过这次整训，七旅补充了新兵和武器弹药，恢复满员建制。根据东总指示，三旅改为师，曾国华任师长，李伯秋任政委。

1946年9月，为牵制敌人进攻北满，东总指示辽东军区在南满打击敌人。辽东军区命令三纵攻打开原以东的西丰县城。九师攻城，七、八师打援。曾国华的七师在石河驿、乌龙岭歼灭从西安增援西丰的敌青年军二师一个营。

1946年11月，曾国华升任三纵队副司令员。和司令员曾克林、政治委员罗舜初一起组织了四保临江战役。

12月11日，曾国华参加南满分局在七道江召开的师以上干部出席的党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坚持南满还是退出南满这个关系东北全局的大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在辽东军区政委陈云同志的说服下，统一了坚持南满的认识和决心。会议决定：三纵担任内线作战，正面顶住敌人，四纵挺进敌后、牵制敌人。曾国华和纵队领导一致表示：“坚决坚持南满，坚决完成军区交给的作战任务。”

1947年1月2日，国民党军集中了三个师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曾国华协助纵队首长组织指挥七、八、九三个师进行反击。

这时部队经过诉苦教育，求战情绪高，报仇立功决心大，但环境十分艰苦，时

值严冬，气温零下40摄氏度，雪地行军，露天住宿，忍饥挨饿，有时把老百姓的所有粮菜都吃光了，甚至连刷酱缸的水也喝干了；有时一个营吹集合号看不见队伍，原来战士们脚都冻坏走不动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三纵部队历时19天，作战43次，歼敌1700余人，第一次保卫临江胜利结束。

三纵部队利用10天休整时间，补充了新兵和弹药，又发动官兵防治冻伤，设法改善伙食，恢复体力。三纵领导提出，要在克服困难上和敌人竞赛。时值春节，部队中新战士不少。曾国华到部队检查工作时，要求部队春节最好能吃一顿饺子。有些连队吃上一次用土豆作馅的荞麦面饺子。

1947年1月30日，杜聿明乘北满主力回师松花江北，又集结四个师的兵力向临江发动第二次进犯。

2月5日，在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的直接指挥下，三纵部队在四纵十师配合下向敌人发起反击。连续战斗9昼夜，共歼敌4000余人，俘虏敌二〇七师少将旅长张建勋。被俘后这位将军大骂一九五师师长陈林达，骂他逃跑时不吭声，送掉他和他的三团。

杜聿明两次进犯临江遭受惨败并不甘心，2月中旬又集中4个师第三次进犯临江。曾国华又协助三纵司令员曾克林组织三保临江战役，连续作战37天，歼敌四个团计一万余人，解放柳河、辉南、金川、旺晴等四座县城。

在三个月里连续取得了三次保卫临江战役的胜利，部队的情绪高昂，胜利信心大增。曾国华在纵队司令部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们部队打运动战，以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有实战经验了，仗是越打越聪明，越打越顺了，部队的游击习气少了，炮也打得准了，部队也越来越团结了。

疾风劲草阎尔梅 (三)

阎 强

应叶润山之邀加入山东榆园军

顺治四年春（1647），叶润山入榆园军，阎尔梅已经加入了山东榆园军，以自身特殊的身份，秘密联络各地反清力量。过兖州，走钜野，奔河南，上少林。访毕开之、梁东川、李三五，见少林方丈等。为解后顾之忧，顺治五年，阎尔梅将长子送到淮安。并在淮安看望了隐居钵池山下的万寿祺，以“求羊三径客，诗酒六朝僧”之诗句，惋惜江南明臣逃避现实，享受逃禅的生活。以“幸无伤春暮，白马效虞宾”之豪情，激励万寿祺重举义旗，东山再起。

顺治六年正月，山东杜全、张文齐起兵临清，孙化庭等人起兵长清。二月万寿祺过沛见阎尔梅，共商大计。12月榆园军兵略徐州。

顺治九年八月，阎尔梅参加山东榆园军事发，漕督沈文奎遣兵捕阎尔梅并及阎尔梅仲弟及侄儿御九。十二月移檄总河杨方兴，以八县兵押阎尔梅北去，12月15日下济南监狱。顺治十年十一月在各方人士的解救下，阎尔梅从济南监狱移至宽候所。顺治十二年（1655），53岁的阎尔梅从宽候所脱逃归沛。

第一个四年的出逃

顺治十二年（1655）8月19日，清兵来沛，再次缉捕阎尔梅。晚上阎尔梅正在好友冯尔常家喝酒。夫人张氏、妾室樊氏居马村楼上。闻信仓促间托八岁儿

阎哭出，两夫人投环死，五鼓捕兵至，两夫人已经烈死。清兵得信阎尔梅在冯家，前往围捕，过冯尔常家，打听其住处，冯尔常自称姓马，骗过清兵，放走阎尔梅。阎尔梅和舍人李骧携幼子连夜出逃。奔河南虞城乔集将幼儿藏匿于张十六家中。自己居古寺，扮弃舟渡行人，自称吕老。后行迹败露，奔走于夏邑，幼儿寄于李氏。而捕者旋及李家，李氏破家将幼子送阎尔梅所在杞县，后送于许昌。此时做过沛县令的王半石为许州令，得旧舍人带着阎哭见阎尔梅。阎尔梅又将幼子托付于王半石而就私塾于许州。行迹稍漏，私塾先生逃走。阎尔梅的大儿阎炅被藏匿于淮阴山阳吴嵩山家。不久捕者至，吴嵩山让19岁的阎炅持信奔河南临颖朋友家中，自己则就捕。阎炅得入临颖教授于王氏。这时老二阎哭被送至临颖，兄弟二人对外以师生相称，相依为命。阎尔梅则西过洛阳，从新安、澠池至陕州。北渡河，游河东，随后到长安。游甘泉、九峻，西入咸阳，遍游周、汉唐诸陵。顺治十四年春，阎尔梅由关中返回河南。至杞城，夏游铁里，复至许州，至禹州，遍游崆峒、具茨、大隗诸山。10月游密县，岁末至临颖。顺治十五年，阎尔梅从临颖到少林寺，秋至杜郎，岁暮还沛。这样就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河南、陕西的逃亡。

在这次逃亡的过程中，阎尔梅于丙申年（1656）三月十九路过阆乡县（今属河南灵宝市），此地南依秦岭，东靠函谷关，西连潼关，是古时兵家必争之地。阎尔梅来到阆乡县的这一天正是大明崇祯皇帝的忌辰。阎尔梅百感交集，写下《丙申三月十九日过阆乡县有感》：

黄帝隆升久在天，孤臣遗落鼎湖边。

一驴亡命三千路，四海无家十二年。

霜露几经寒食火，园陵谁扫忌辰烟？

朝来独望昌平拜，童子闻歌亦泫然。

其中诗句：“一驴亡命三千路，四海无家十二年。”成了阎尔梅的千古绝唱。

第二个四年的出逃

阎尔梅的第二次出逃同样历时四年，穿越了豫西北、鲁西南、山西、陕西、宁夏、四川、湖北、江西、云间（上海）、江苏，完成了第二个大回环。从顺治16年（1659年）正月出发，到康熙元年12月返回沛县。

在此次逃亡中，阎尔梅由连云栈入川，所到之处诗赋山水，在杨犹龙的引荐下，当地才子争相为主，结识阎尔梅。因又不知阎尔梅为何人，只称翁先生。后入湖北，稍稍有识其真人者，相见惊愕，以为阎尔梅早已死亡，或出挽诗，相向而哭，时有赠句曰：汉沔彭蠡鬼再活！

后入江西诸郡，登匡庐，居其数月，临风长啸，意有所得则寄情于诗。过陶靖节墓肃然而吊如见其人。吊罢则自吊曰：

其一

年来文物忌中华，非杀其身即破家。

假使先生当此际，如何漉酒看黄花？

其二

天开大狱族衣冠，肯放东篱一步宽。

吊罢先生还自吊，永初时易此时难。

此后沛县阎夫子真实姓名外漏，竟惹时人来谒。沛县旧友、百姓多联名为之请命，山东狱案得缓。于是阎尔梅返，历吴淮抵徐州。过故垒旧行营处，这让阎尔梅想起史可法不谏言，死难扬州，而自己逃亡多年，家破人亡。无限感慨曰：使听予言，

安至此哉！登燕子楼叹曰：使盼盼而男子，必不以人臣事二姓矣。见燕子楼刻关盼盼诗歌，随和三首，题于壁上：

其一

空楼寂寂十经霜，百事无欢懒下床。
每到春来常苦困，秋来苦醒夜偏长。

其二

初时弄笔写云烟，岁久魂销意索然。
丝竹满堂花满目，愁来都不似当年。

其三

相思一夜一千回，人在情中梦不来。
无限愁肠真似火，几时烧断得成灰？

第三个四年的出逃

阎尔梅的第三次出逃是从康熙二年（1663）秋天出发，到康熙五年（1666）春天返沛，两头算起，也是四年的时间。

这次他穿越的线路是：先游赵魏，复走山东，北至昌平，游恒山西至大同，从雁门进入大漠，然后归京师，于康熙五年春返沛，完成了他的第三个大回环，时年64岁。

康熙四年秋起，阎尔梅又两次出游，完成明代边防史的编著。钟山客纪伯紫、白仲调皆阎尔梅好友，谋划阎尔梅狱案之事。依据狱放旧例，将阎尔梅的年龄虚增十岁，代为草状。又使小童侦宁持状上于刑部。龚孝升接状后，为之上疏皇上。众好友又指使阎熈见魏相国，拜求周旋阎尔梅案件。魏相国，名裔介，字石生，时任保和殿大学士。稍后，皇上准，阎尔梅反清案自此彻底解决。随后父子返沛，复封祖坟。

晚年的游历生活

康熙五年的夏天到该年的初冬，阎尔梅再次启程，此次出行的目的是参加顾眉的葬礼。他从沛县出发，经宿州到达庐州。秋渡江前往南京，谒孝陵，然后西去安庆，复东返，顺流而下，游余阙祠，过大通河望九华山，芜湖吊黄将军，过天门山、牛渚山，到采石矶到乌江浦北转返沛。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穿越苏皖两地的小回环。

康熙六年秋，到康熙九年夏，阎尔梅又用了近四年的时间出游。这次出游，游程曲而长，停点多，目的考证明边塞。康熙六年（1667）秋，阎尔梅从沛县出发，到达上谷（张家口）。东出榆关（抚宁县），冬入都，寓真空寺。康熙七年二月至昌平，谒十三陵。三月出都，六月到澹村，游浚县（今属鹤壁市，明属于北直隶大名府）八月至大名（今河北大名县），冬游邯郸。康熙八年三月，出邯郸，至安阳。游林虑、天平。从卫辉西游，经修武、怀庆、抵丹口，到达河北济源，南渡黄河到洛阳。西行过新安、澠池、抵陕州，折而东南，经伊阙、汜水、荥阳、到达通许，深秋到达虞城、冬入都寓慈仁寺。康熙九年夏，由京师返回沛县。这样他完成了一个八字型的大穿越，归来已是68岁。

康熙九年秋到康熙十一年冬，阎尔梅再次出游，历时三年，归来已经70高龄。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远行。康熙九年秋游上党，9月至太原，访傅青主于松庄。畅游山西各地，冬返太原度岁。期间由林县登太行进山西，跨度两年。大致分三条线

名人素描

路穿越山西。第一条：从林县到太原。穿越了林县、壶关、虎亭、闕与、发鸠、武乡、和顺、太原。第二条：从太原至保德。穿越了忻州、静乐、岢岚、保德。第三条：从保德游三关回太原。穿越了河曲、朔州、偏头关、老牛、武宁、雁门、太原。康熙十一年春，阎尔梅在太原，间至交城、寿阳、盂县、转入蔚县、广昌，冬至太原返沛。随后的几年，他虽有出游，但都是在家乡周围游历，康熙十年11月26日在家中去世，卒年77岁。阎尔梅怀着无限的感叹，离开人世。死后家人依照其遗嘱依汉制筑覆斗坟。反清之志至死不改。正如他诗中所云：“满地清风难容我，何时明月再照人？”“妄想玄珠升太庙，宁知白首做顽民。”“屈指当年名下士，西风劲草属何人！”

从顺治十二年八月阎尔梅出逃开始，到康熙四年在龚孝升的帮助下，山东榆园军案被解，康熙五年归沛，这12年中，阎尔梅一直过着亡命天涯的生活。“一驴亡命三千路，四海为家十二年”是他真实的写照。晚年的阎尔梅对大明的思念并没有湮灭，毅然奔走边塞，写下《明边史》，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



阎尔梅之墓

沂蒙大地一支笔 (三)

——惠玉昆先生的书法历程和业绩

刘瑞轩



吟诗作文字外功夫

我们欣赏惠先生的书作，总觉有股典雅之气、清刚之气，而无尘俗之气。它能使人精神升华，脱俗出尘。这根源于书家有深厚的文化根底，有古诗文的涵养。但几十年来忙于挥毫，他无暇多作诗文。至今，我们搜集到的只有59首诗。这些诗其中有34首咏怀、赠答诗，有25首题画诗。

书画相通，因为惠先生对字的观赏评论能力很高，以这样审美眼光观画，必然评价得当。他和著名画家皮之先是书画朋友，又是同龄人。一次，皮之先画了一幅山水画《访友归庄图》，惠先生很欣赏，皮之先随之让他给题诗，惠先生欣然命笔，题诗曰：

访友归来月莽苍，竹林深处是我庄。
桥畔茅庐神仙居，明日升起琴声扬。

这首诗形象地描绘出月光莽苍中的一幅村居图，有小桥流水，有竹林掩映，真是让人可观、可游、可居。更可贵的是，诗人未停留在眼前的景物上，

他又展开想象，说主人是位文人雅士，通琴棋书画，待到旭日东升时，茅屋中会飞出悠扬的琴声。这真是有色有声，意境优美的图画。

惠先生和书画家马约是好友，书画交往，情长谊深。一次，马约应约给惠先生画了一幅《猫》。惠先生很高兴，如获至宝，随之吟了一首四言诗：

马约画猫，活泼可爱。
寥寥几笔，千姿百态。
前无古人，独出心裁。
后无来者，恐难超迈。
久赏不倦，悦目开怀。
有幸得之，宝传代代。

作者用简练的语言，一下子抓住了马约画猫的特点：不求皮毛的形似，而要表现动态，重在传神。因此寥寥几笔，就能画出活泼可爱的猫。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购画者看到马老师几分钟就画好一只猫，能卖上千元。就问：“你画得这么快，就能卖那么贵吗？”马答曰：“我站在画案前天天练，画了几十年。这个时间你算了么？”问者默然诚服。惠先生还高度评价了马画的地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国画猫的名家曹克家等多是用工笔的细致刻画，并不是用写意画法。马约用概括的线条草草地勾勒，这可谓“前无古人”。也有人学马约画猫。但无画外功，没有下功夫练书法，他的线条就不可能那么流畅有力，那么有韵味。目前看尚“后无来者”，以后能否有人下功夫超迈，还要拭目以待。

题画诗忌讳就事论事，没有深远寓意，最好借物咏怀，托物言志，请看《题钟依画八哥》：

容貌差近美，墨身亦素朴。
树上有鸣声，笼中吐人语。
鸟如通世情，未必受人使。
人何不自知，学舌终招苦。

此诗写八哥鸟，因会学舌，被关在笼中，受人支使。写的是鸟，暗喻人情世事，人如果爱学舌，也必然像八哥一样“终招苦”。大画家齐白石也曾画八哥，题词曰：“汝好说是非，有话不在汝面前说。”惠的题诗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惠先生的咏怀诗，反映的社会面比较广，大约有四个方面：一、题赠祝贺。惠先生遇到可喜可贺的事，都要写诗祝贺。如：《贺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临沂分校成立30年》《贺日本雪心会书法作品来临展出》《贺硬笔书法大赛》《贺老干部书画展》《贺临沂地区农民书协成立》《贺临沂市第二届老干部书画展》等。二、颂扬或怀念书画家。惠老师在书法界有很多朋友，对他们的成就，他由衷佩服，常写诗颂赞；有的画家去世了，他则写诗表达缅怀之情。如：《赞吴丈蜀先生书法作品》《观林剑冲画虎义展》《悼念王小古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等。三、旅游观光感受。如：《参观秦陵兵马俑有感》《题富贵室内盆景》《兰吟俚语》（观鲁南花卉城）。四、咏物感怀。他对身边的事物有感触，也写诗抒怀。如：《学书有感》《自嘲》《雅居诗》《咏郁金香墨汁》《看电视打油诗》等。

用古体诗形式写现代生活有很大难度。当今的名词、术语皆多音，硬要容进五言、七言，还要押韵合辙，符合格律，这等于戴着枷锁跳舞，不是高明的诗人难以达到。有人认为写得句子整齐、押韵，就是诗，甚至将标语、口号押上韵也算诗。这是极大的误解，试看惠先生写的《悼念王小古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诗书画印独全能，惜君怀才运未通。
才得佳音泉城去，忽有哭声恸沂蒙。



大道将施身先逝，艺苑不幸天殒星。

廿年过去当堪慰，桃李盛绽誉寰中。

这首诗饱含悲伤，痛惜之情，又有“天殒星”“桃李盛绽”等鲜明形象，格律也大体符合。这就和那些顺口溜、标语口号的“老干部体”不可同日而语了。

与诗相通的是对联。惠先生除了写古代的名联，也写自己撰的联。我们收集到的有十多副，请看下面四副：

赞吴丈蜀书法

洗尽铅华返纯朴，抛却艳装归天真。

为临沂公证处题

公行天下，正走八方。

庆贺第十届书圣文化节

沂蒙老区文采光耀今古，书圣故居翰墨香流中外。

贺《临沂日报》发行60年

每日里见闻悉备，六十载褒贬无私。

这几副联，从内容上看，都和写的对象十分贴切，第一联写吴丈蜀书法的质朴，第四联写报纸的新闻特点多么准确！从艺术上看，对仗工整，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数量词对数量词。特别是第二联，不仅抓住了公证处的特点，上下联还巧妙地嵌入“公正”二字。

惠先生的单篇文章少见，我们从他给书画的题跋中可见文风之一斑。如：1996年，他在用小楷写《洛神赋》后，跋曰：“白内障术后已阅四月矣，书此以试目力，果然手颤视茫，虽字不满千，则双目已觉疲乏难耐。而后写小楷合当停笔。”2014年，他看到从南方得来的《集柳碑》明拓本，而王羲之故居刻的碑用的是清拓本。他在明拓本付印前，题了一段跋：“震前集柳已稀若晨星，此拓本一字未缺，诚名碑故地之瑰宝，有幸得观，眼福非浅也。”

这两段跋文用文言文写，合乎体例，而文词又简洁、典雅，饶有味道。

惠先生之诗文能达到如此水平，盖因他有私塾饱读古文，吟诵诗词的底子，又多年手不释卷所结之果，诚非一日之功也。

白学光：战争中，我们以笔作战

于岸青

当得知白学光老人已经快100岁了，我内心不禁恍惚了一下，100岁的老人该是怎样的啊。

我以最快的速度，落实了采访诸事宜，于得到消息后的第三天早上九点，我们准时到了青岛市福山路一所老旧的楼房。

那天是4月12日，早春的青岛没有太阳，风刮过来清冷清冷的。进到门里，白学光老人的儿媳马女士将老人唤出。在等待的那一刻我急速地想象了一下，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让我惊讶的是，迎面而来的竟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握手果断有力，声若洪钟，中气十足。

一直在照顾他的马女士说，去年在八大关小礼堂，老爷子一个人给山东省海洋研究系统的工作人员做党建党史报告，两个半小时，而且是脱稿，当时把所有在场的听众都给震住了。

老人高高的个子，只穿着家常的毛衣，双手却温暖如春，常见的老态，在他身上全是生命的活力。

落座后，白老急切地跟我打听大众日报社的老朋友们。朱民同志怎么样，身体还好吧？陈沂同志的爱人马楠同志现在情况怎么样？陈冰同志还好吗？

我就我知道的情况一一告诉了白老。当听到朱民同志和陈冰同志已经去世时，白老眼光盯着天花板，现出惆怅说，朱民同志比我小啊。

1941年3月，白学光自湖西区调到大众日报社，任总编辑、报社管委会副主任。在最为艰苦的1941年的冬季铁壁合围中，为了应对日本鬼子的追击，白学光率领第三战时新闻小组，使用“沂蒙大队”的番号，武装起来打游击，出生入死，与敌周旋，成功地保存了实力，并且克服重重困难不时出版《大众日报》战时油印版，从1941年11月14日到1942年1月24日止共出版了15期，并能基本保持本报原貌。

白学光除全面审稿，重点抓一版和社论，现存12期报中就刊有10篇社论。报纸一方面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向广大军民传达了党的声音，认清形势，明确任务，鼓舞斗志，对坚定信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让世人了解了沂蒙军民抗敌斗争的最新战况。看到报纸，群众高兴地说：“八路军在，

共产党在，一定会胜利，决不上敌人的当。”《大众日报》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沂蒙大队”的战斗员每人都配有长枪和手榴弹，在游击中，知识分子和工人互不服气，作为沂蒙大队的政委，白学光把大家组织起来，用毛主席的有关论述进行思想工作。他指出，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结合，是“无兵司令”，一事无成；工农分子不学习文化知识，永远愚昧落后，难以翻身，因此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一番思想工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敌人的铁壁合围下，生活物资极端匮乏，大部分同志棉衣未发，只好披着被子。粮食严重不足，特别是缺盐少油，有的人全身无力，有的人视力模糊。一天，白学光拿出12元，让队员买了一只羊，改善生活。肉刚下锅就发现敌情，大家一边监视，一边将未全熟的肉全吃了，大家说这叫“武装保卫羊肉”，毕竟这是一个月以来第一次尝到肉味。晚上，白学光和大家一起睡草铺挤在一起取暖，为了应对紧急情况，也为了保暖，都不脱衣服，又不洗澡，身上生了虱子，白学光有件毛衣，藏的虱子更多，有时跟同志们在太阳下面比赛捉“抗日虫”。

我在报史回忆文章中看到，白学光心爱的枣红马就在此次战斗中被敌人捉去了，从此他和大家一样身背被包行军爬山。但白老对此似乎记忆有些模糊了，马女士说，她见过一张老爷子骑着马的照片。白老笑说，我是有过马，也有枪，盒子枪，但很少用，因为我有警卫员，没有太多的机会用。

日寇“扫荡”结束后，沂蒙大队走出大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对白学光说：“你们在蒙山狭长的布袋里与敌人周旋，保存了力量，出版了报纸，任务完成得很好。”

战后，报社在驻地进行了总结，大众日报管委会主任李竹如同志说，报社职工勇敢机智坚持斗争，基本保存了力量，保护了物资，指导了战争，这是重大胜利，特别是大家在斗争中锻炼了意志，学到了经验，增长了才干，赢得了群众拥护尤为可贵。他表扬了大批模范人物和事迹。他说：山东过去有很多“山大王”，这次在蒙山文有白学光，武有郭克刚，文武双全，屡战获胜，堪称“蒙山王”。

1942年春，报社随山东分局转移滨海区，首批人员由白学光带领武装护送到达



《大众日报》排字房的工人在认真排字

临沭。两个多月的游击生活，大家非常疲惫，衣服破烂，虱子成堆。白学光开始整顿队伍，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整理服装，内务，按时休息，并要求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进行军事训练等等，半个月后队伍面貌一新，并因陋就简于1942年3月1日顺利出版《大众日报》战时版，因印刷设备未随队迁移，在当地只找到一台八开机，“战时版”是“小号”的大众日报，每版仅容1100字，如此仍配发一条300字的社论。直至一个月后，恢复正常出版，使《大众日报》胜利完成由沂蒙到滨海的重要转移。

报社安顿下来后，落实到山东视察工作的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大力开展群众运动报道，在近三个月内，共发此类报道117件，平均每期4件，这是《大众日报》创刊以来第一次系统地大规模报道群众运动，加强了报纸的党性、指导性和群众性。后来，白学光总结说，这个时期的报纸充满了活力，三方面喜欢看《大众日报》，群众看，从中了解情况；干部喜欢看，可以得到启示；领导层也喜欢看，从中了解情况，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报社同志也从实践工作中得到锻炼，提高了认识，改造了思想和世界观。时任大众日报社长的陈沂同志也总结道，这是大众日报工作的转折点。

谈到在蒙山的艰苦斗争，白老说：“那一段生活是脑子里忘不了的。日本鬼子动用了5万人搞铁壁合围嘛，我带着一部分同志就在敌人的包围圈里活动来活动去，还照常出油印报呢。我们出的油印报在当时影响很大，广大军民看了很兴奋，对战胜敌人更有信心了，敌人也能看到，看了很害怕。”

“战斗结束后，我们这几十个人有编辑记者，有电台的同志，没有一个伤亡的，虽然经常能与敌人相遇，十分惊险。当时山东分局书记是朱瑞同志，还有李竹如同志，就是李竹如同志给了我个绰号，叫‘蒙山王’。我说啊，这不是个人的功劳，是因为党的领导，当时有党的正确领导，我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敌人我们都能想方设法战胜。跟现在大不同的是，我们那时思想上很单纯，就是一心一意为革命，一心一意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跑。”

白老谦虚地笑说，“别看我在报社工作这么些年，我的笔杆子不行，只能做到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好，带领同志们一起共同努力，把《大众日报》办好。在敌后来讲，《大众日报》是办得不错的。陈沂同志为办报出了很大的力。战争中，战士们以枪作战，我们是以笔作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大众日报》得到极大的发展，而此时，奉组织要求，白学光率大众日报社15位同志随军赴东北办报，从此离开了艰苦战斗的大众日报社。

从安徽退休后，白学光又回到山东，在青岛安度晚年生活。92岁那年，他因白内障接受手术，这是医院史上少有的高龄患者，全科动员，随时应对紧急情况。术后，他借助放大镜，能保持日常阅读。除了听力有些不大好之外，白学光老人看起来身体状况很不错。马女士说：“老人吃饭睡觉都挺正常的，每天还到小鱼山溜达一圈儿。电视上的新闻节目，中午、下午、晚上，他一天要看三次，另外家里还订了好多报纸，最喜欢看的是《参考消息》，你要问他国际国内的大事，他能说得头头是道。”

应我们的邀请，白老马上兴致勃勃地提笔为大众日报题词：“密切联系群众，永不自满；立足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向未来，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为实现最高理想和最高目标而奋斗！”落款是“九十九岁老人白学光”。

(写于二零一六年)

白学光：曾用名白子明，曾任中共山东分局湖西区委书记。

《打得好》一曲创作始末

吕光

1947年春，我们剧团刚在鲁南前线参加完庆功大会，就接到上面的指令，说是北边将有更大的仗要打了，让我们文工团赶快去参加又一次庆功大会的演出。于是我们立即整装出发，兴冲冲向北边赶去。

可是，还是迟到了。在我们赶到半途时，莱芜大捷的胜利消息已向我们飞来。这天我们正在一个庄上，清早，屋外有不少人围在土墙前，瞧墙上贴着一张印着红色大字的捷报，那上面写着莱芜大捷的胜利战果：歼敌五万六千……活捉司令李仙洲……缴获多少战利品……大伙正瞧着，有人情不自禁地喊了声：“打得好！”我发觉身边的王杰同志像触了电似的一愣神，转身就走。我向来敬佩这位擅长写歌词的领导，知道他一定又有了新的发现，便跟着他进了屋子，只见他坐到桌边，取出钢笔、纸张，就飞快地书写起来。我伏下身去一看，见纸上写着：



打得好来打得好，四面八方传捷报。

到处都在打胜仗，捷报如同雪花飘。

他接连写了好几段，写后又字斟句酌地作了一番修改，便拿着纸匆匆地走出门去了。

后来的事则是我听别人说的。据说他去找团长、音乐家章枚看这歌词，章枚看后显得有些为难，说这是顺口溜，平时说说快板还可以，若拿来谱歌曲，七字一句很呆板，即使谱出歌来也不会好听。

这时恰巧音乐股长朱践耳在旁边，他见了歌词后，谦虚地说：“让我试试看。”

朱践耳回去后，想了很长时间，拿着歌词反复朗诵，想着怎样打破这七字一句的框框。他想啊想啊，朗诵了一遍又一遍，突然灵机一动，紧握拳头，提高嗓音，大吼一声：“打得好来打得好，四面八方传捷报来传捷报。”接下去“到处都在打胜仗，嗨，捷报如同雪花飘。”曲调也就顺理成章地哼出来了。这下子他心里亮堂了，框框终于被打破了，他很快把曲谱写了出来。第二天早上，他先找了宗弼同志唱给他听，请他提了些意见，然后去见章枚同志。章枚同志看了歌曲后，大为赞赏，他的热情也被激起来了，他给歌曲锦上添花，增写了女声唱的和声，就叫人抄在大黑板上，立即召集大家，由曹鹏同志指挥和教唱。

就这样，我们一边练唱，一边继续行军北上，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在庆功大会上演出大合唱时，第一个节目就是这首《打得好》，即刻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赞扬和欢迎。后来我们每到一处演出，就必唱这首歌曲，就这样，这首《打得好》歌曲就很快流传开来了。

由我们首唱的这首《打得好》不但各军区文工团唱，广大的指战员和战士在行军时、集会时都高唱着，此起彼伏。它反映了我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阶段一系列的战役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蒋军兵败如山倒”，我军大踏步南下，迎接南京、上海的解放。歌词和歌曲充分表达了我军气势如虹、一往无前、歼灭百万蒋军势如破竹的局面和迎接全国解放的豪迈自信的激动心情。一支好的歌曲是能唱出千百万人民的心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打得好》无疑就是解放战争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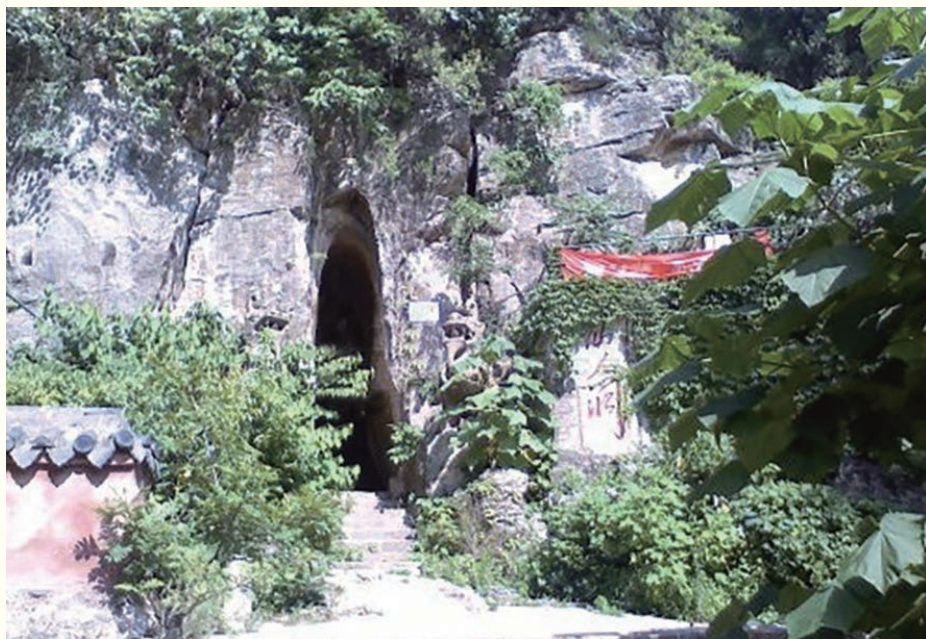
费县阁老府轶事

张振伦

费县城南关有一座阁老府，是明朝阁老张四知的府第。

张氏一族，祖居清河县，后迁历城，又到章丘，最后来到费县，皆以卖布为业。张四知父名张渭，为人正直善良，好抑强扶弱。当时，有一陈姓贫民因盗伐财主坟地中一棵树，按明律该获罪入狱。该农民来到张渭面前长跪不起，诉说全家老小生活之艰难，请求帮他一把。张渭遂将原告状词中“私杀林中一棵树”，中的“中”字改成了“東”。开堂时，县太爷一看状词大怒，判农民无罪放回，财主刁顽赏20大板。陈姓农民因感念相救之恩，又见张渭年过40尚无子嗣，即将自己18岁女儿送他作妾。新婚之夜，新娘啼哭不止。张渭说：“你嫌我年纪大，不要紧，明天我送你回去，再给你找年龄相当的人。”女的说：“我已在你家住了宿，回去也难保清白之名。”张渭说：“好办。今晚我不住新房，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行了。”说完转身要走。女方深感他老实善良，遂转意不再另嫁。次年生一子，名张四知。几年后，又生一子，名张四维。弟兄俩聪颖好学，天启元年（1621年）分别中了举人、秀才。

张四知七八岁在城隍庙读书时即颇负诗名。一日，他的老师闲逛，走过县衙门口，见一匹红马尾巴被风一吹，缕缕可观，信口吟道：“风吹马尾千条线。”只听身后一孩童朗声对答：“日照龙鳞万点金。”老师回身见是张四知，惊讶地预言：此生将来必定不凡。



费县许家崖仙人洞

张四知忠厚善良。据说他十四五岁时，有一回在河边赏景，见一女子过不去河，正发愁掉泪。就不顾“男女大防”的陈规，脱鞋把她背过河去。对此，人言纷纷，老师也责怪。他作诗以对：

美女河边叹急流，蓝袍权作渡川舟。
暂将桂手挽香手，斜倚龙头靠凤头。
一朵鲜花簪儒背，十分春色满河舟。
轻轻放下临江别，默默无言各自羞。
后生本无轻佻意，只因善念绕心头。
老师听他讲得有理，也不再追究了。

张四知、张四维兄弟俩很有志气。明天启元年辛酉科考张四知中举后，母亲去世。费县城名宦王雅量为京官御史，前来吊孝，碍于身份，未行全礼。兄弟俩牢记在心，将母亲灵柩停放林中不葬，由弟弟张四维打理家事，哥哥张四知来到许家崖仙人洞，潜心苦读。洞内冬暖夏凉，倒也舒服，只是蛤蟆哇哇乱叫，张四知向水中撒了一把沙，说：“别叫了！”果然，蛤蟆再叫不出声了。传说歇后语“仙人洞的蛤蟆——干鼓肚”就源于此。天启二年，举子会考又中进士，殿试选授翰林庶吉士，又升为检讨。崇祯年间，升任礼部右侍郎，崇祯十二年五月进入内阁，加太子太保衔、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人称张阁老、张国相。朝廷同时还赠誉其父张渭“沉心向学，至性敦伦”。母陈氏，朝赠一品夫人，誉其“赋性静贞，秉规端肃”。并恩准张四知回家葬母。这回，王雅量又来吊孝说：“阁老之母，担得起御史全礼！”乃拂袖向前，行了二十四拜礼。

未几，圣旨下：着在原住址修建阁老府。为拆旧盖新事宜，兄弟俩产生了分歧。张四知手拿张四维醉中按下手印的卖房契，说这才是遵旨。无奈之中，张四维负气出走，用两个箩筐挑着孩子辗转来到方城，先投靠张家街张姓门下，后在姚家寨定居。耕读传家，家族繁盛，现已达400多口，分布在姚家寨、韦家寨、大沟、南峪等村。

张四知嫉恶如仇。他探家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张姓农民女儿出嫁前，亲家传语过来，说陪大客的都是戴顶子的。张姓农民犯了愁，带了一包茶叶作见面礼求张四知。张四知问准了出嫁的日期，让其先回去等着。出嫁那天，大客换成了京里来的两名二品官员。两乘八抬大轿送新娘来到婆家，这回轮到陪大客的傻眼了：垂手而立，看着大客吃饱喝足才被恩准坐下歇一会儿，此事在当地传为美谈。

张四知尊师重教。他在京为官20多年，其间多次探家。路过老师的村庄时，老远就下轿请安。见老师衣破无食，晚景可怜，立刻给以资助，又交代县令给予照顾，县令自然磕头如捣蒜地答应。邻居高梦说幼时聪明好学，因家贫面临辍学，张四知立即给以照顾，使其完成学业，后官至清朝安徽按察使。

张四知入阁时，明政权正面临内忧外患：关外清军虎视，关内李自成造反，朝中官员贪污腐败，崇祯帝虽年轻气盛，志在力挽，奈无回天之力，众阁老也无补天之术，此时，多疑的崇祯帝又中了清军的反间计，将边关猛将袁崇焕凌迟处死，清军入关前夕，张四知罢官回家，重回仙人洞，感慨万千，作诗一首以寄情怀：

四面青山一线天，彩云纷飞绕玉环。
远隔咸阳三千里，避秦何必去桃园？

张四知晚景凄惨，死后由徒弟门人葬石沟村南岭，解放后土地整改，平其坟墓。

张四知去世后，偌大财产，不知所终，只闻方城一个小商贩，冒张四维之名，将老林林地变卖，现阁老府为仅存遗址。



《沂蒙抗日根据地图志·人物》——

徐向前

本 编

徐向前（1901—1990年）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五台人。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1939年6月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抗日军政大学代理校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0年，徐向前在沂蒙抗日根据地



1944年10月贺龙与朱德、周恩来、徐向前在延安机场



徐向前在滨海



徐向前与家人在延安

“益化”还是“赢化”？

高 雷



赢六化

齐圜钱三品开中国虚值圆钱之先河，奠定了方孔圆钱以枚为基础单位，采用不同面值的计值方式，直接影响到汉王莽的六泉，在清咸丰一朝达到顶峰。该钱在形制采用外圆内方、内外起郭的式样，增加了钱币的使用强度，提升了钱币的审美价值，固化成为中国古钱的主要制作模式，延绵2000余年，在钱币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赢化”的解读自有清以来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是清朝李佐贤将其定名为宝化、宝四化、宝六化。沿袭了洪遵《泉志》的说法，源自《汉书·食货志》，认为是周景王时所铸，“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

二是将赢读作贍（ài），以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影响最大，它的根据来源于《说文解字》，认为贍自本字为𦵏，“因泉文故加贝作益”，并断定“益货当为汉武帝时益都所铸”。

《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𦵏，籀（zhòu）文贍，上象口。下象颈脉理也。”段玉裁注：“象形字，与亢略同。汉百官公卿表曰：𦵏作朕虞（古官名，管理山泽），应劭曰：𦵏，伯益也。师古曰：𦵏，古益字也。按此假借籀文贍为益。”

三是马伯昂《货币文字考》认为此币的出现应该在战国之末，秦始皇兼并六国之际，读作燕货。他说：“按燕篆作‘𦵏’。《摭（zhí）古遗文》作‘𦵏’，此作‘𦵏’，从‘𦵏’，即‘𦵏’之省文，从‘𦵏’《摭古遗文》作‘𦵏’，《说文》作‘𦵏’，是为咽字之古文，会其声意，显然是燕字。”

近代中国，钱币收藏界素有“南张北方西蜀罗”三足鼎立之说。其中的“北方”指方若，字药雨，以目光锐利，尤精鉴别而著称，他对上述说法，在《言钱补录》中认为：“进言文字，马氏货币文字考释燕，但求形似，燕化亦不应出齐地，或谓乐毅下齐时铸，又附会不经。近人释‘贍（ài）’，失之更远。不若从诸家旧释而读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马伯昂考证为“燕”，追求的是字体地相似，但齐国不可能铸造燕国钱币，说是燕国大将乐毅攻克齐地七十余城时铸造，这有点牵强附会，荒诞不经。而近人考证为“贍（ài）”，那差得就更远了。还是沿袭为“宝”较为稳妥，起码于史有

据。方若在原地转了一个圈，没有向前跨一步。但他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就是“𪚩”字的古体与𪚩字形的相似度。从中或者可以破解𪚩的密码。

“燕”字的甲骨文写法有𪚩、𪚪《甲骨文字典》、𪚫《新甲骨文编》，可以肯定金文𪚬来源于𪚫。而与益字无缘，金文编中益的写法为“益”，𪚭的写法是“益”，《说文解字》释𪚭为𪚭，风马牛不相及。当然《说文解字》中的错误不止此一处。所以方若说：“近人释‘𪚭(ai)’，失之更远。”

《古文字诂林》比较认同马伯昂对𪚩的考证，其中马伯昂认为𪚩是咽字之古文，是有一定道理的（同音相借）。𪚩字的确符合“燕”的写法，甲骨文燕字是象形字，分为四个部分，燕喙、燕头、燕翼、燕身及尾，𪚩保留了燕喙、燕头、燕翼，省掉了燕身及尾，章炳麟说：语有阴阳，画有疏密。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字笔划的增减是一种普遍现象，齐国货币文字“化”就是“货”的省体，这是共识。但这不说明𪚩等同于𪚩，𪚩是象形字，指燕子，𪚩为会意字，当另有含义。

甲骨文的发现，金文的丰富，简帛文的整理，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在浩瀚的上古字库中，寻找到了𪚩的踪迹。西周京叔盘铭文有一个近似的字𪚩，会意字，从燕从女，已被专家确认为𪚩，上古八大姓嬴姓的嬴。部首的燕为嬴姓的父系图腾。那么𪚩从燕从贝，是否为嬴呢？嬴与𪚩上古是通用的，或者它们是春秋之时，不同国别的写法；而金文中确有部首相同，偏旁从女为𪚩和偏旁从贝为𪚩的现象，见𪚩《荣有司偶鼎》、𪚩《庚嬴卣》，部首为龙，为嬴姓母系的图腾，同类比对，𪚩为𪚩，𪚩应该为𪚩，它的本义是姓氏，上古互为假借。那么马伯昂将其读作燕错了没有？没错，燕、𪚩实为一声之转，双声互训，𪚩读为燕，燕就是𪚩。燕与𪚩是什么时候被规范使用的、分的家？始自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𪚩字是汉朝的写法，出自马王堆纵横家帛书。

至此，我们可以确定𪚩应该读为嬴。

问题又来了，嬴是一个什么概念？嬴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属于东夷少昊部落。少昊部族得姓始于尧、舜时期。《史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玄鸟即燕子，颛顼孙女女修嫁于少昊后裔，误吞燕子卵受孕，生子大业，大业生大费，颛顼是其外祖之先。大费本名伯益，一作伯翳、柏益，费乃地名，古人多以大修地名，大费是代称，不是名字。伯益协助大禹治水有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舜赐姓嬴氏”。伯益由此得姓，从上传说可以看出，嬴人部族是一个以燕子为图腾的部族，“嬴”字的部首为燕也就好理解了。伯益得姓之后，又被称为伯嬴。这就是《说文解字》中“应劭曰：𪚩，伯益也”的来历。颜师古则望文生义了。

嬴姓部落坐标何处？赐姓是统治者对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认可，是有封地的。传说舜在古老的东方给嬴姓圈了一块地皮，那就是今天的沂蒙山区，嬴姓为游牧民族，活动范围在海之滨，岱之南，大致在今天的临沂市及莒县、新泰一带。伯益在沂蒙山区活动的遗迹，有两种说法：一是《竹书纪年》记载：“帝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这个国应当是费，即今天费县；二是《孟子·万章上》记载：“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箕山在哪里？《山海经·南山经》中有：“箕尾之山，其尾跋于东海，多沙石。沔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涪(yù)，其中多白玉。”这也与今天山东费县的沔河、箕山地形地貌相吻合。《孟子·公孙丑》有：“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焦循注解：“嬴，齐南邑。”这段话的意思说孟子从齐国到鲁国安葬母亲后返回齐国，住在嬴地。鲁在曲阜，齐在临淄，孟子出行坐的是马车，要走两天的路程，中间站为嬴。走青州，过穆陵关奔沂水，经临沂到曲阜，中间位置的嬴应该在沂南县砖埠一带。



赢四化

齐国铸币，有冠以地名的规律，如齐、安阳、即墨、莒等。所以铸造圜钱把赢放置幕首也属正常。丁福保曾发现了这个规矩，他把圜钱释读为益化，断言是汉武帝时在益都所造，是因为绕不开这个坎。而那种把齐圜钱讹误为臚化的说法，既不符合语法，也不符合逻辑。臚如果是名词，本意是什么？如果是量词，化本身也是量词，单纯的量词与量词无法成句。

赢人在沂蒙山区经营得红红火火，一件大事的发生改变了他们部落人生的轨迹。西周初年，武王灭商后，采取周公“以殷治殷”的意见，分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统治殷商遗民。同时武王派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在殷都附近建立邶（bèi）、鄘（yōng）、卫三国借以监视武庚，史称三监。武王去世后，其子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大权独揽。造成了管叔、蔡叔的离心离德，武庚窥测时机，拉拢管叔、蔡叔等“三监”，联合殷商旧地东夷诸方国，发动叛乱，赢人部落积极参与其中。史称“三监之乱”。

2008年7月发现的清华简《系年》清晰地记载了赢人背井离乡，走出沂蒙的原因和过程。《系年》载：“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zhì），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录子耿。成王践伐商邑，杀录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圉（yǔ），以御奴虐（cuó）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卫。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

“录子耿”即武庚。“飞廉”过去史书称之为蜚廉，是伯益的后世子孙，赢人的头人。“商盖”地名，之前史书称之为商奄（yǎn），今山东省曲阜旧城东。“邾圉”地名，今甘肃省甘谷南。

周成王在周公的辅佐下，对武庚叛乱进行了坚决的镇压，不仅诛杀了武庚、蜚廉等人，并采取了斩草除根，分而治之的办法，将赢氏部落强行迁出本土，安置到西戎之地垦边戍边。

伯益十七世孙非子居住在邾圉南面的西犬丘（又名西垂，今甘肃礼县东部），善于养马。周孝王得知，“召使主马于汧（qiān）渭之间，马大蕃息。”为褒奖非子的功劳，孝王分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今甘肃清水一带），使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自此赢人改称秦人。

赢人的祖居地有什么变化？《左传》记载，鲁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62年）“秋，筑台于秦”。秦地在西戎，鲁庄公在鲁国内筑台，此秦应该是赢地的代称，《后汉书》有：“赢末纷乱，燕人违难”之说，秦赢可以互借，筑台之时赢地尚在鲁国境内。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左传记载：“公孙宿以其兵甲入于赢。”杜预注：“赢，齐邑。”这时，赢地的归属已经发生了变化，属齐。

公元前378年，秦国献公主政，“初行为市”。在新都栎阳开始设立市场，发行货币。

公元前324年，秦惠文王“初行钱”，圆形方孔铜钱“半两”面世。流行华夏2000余年的制钱模式滥觞于此。

云梦秦简《二年律令·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釜，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意思是：官府赋税收入钱币，以一千钱装为一包，收讫用其县令、县丞的印信打上封泥。钱数不满一千的，也应封缄。钱质好的和不好的，应装在一起。动用钱币时，要经过县令，县丞验视，然后启用。百姓在交易时使用钱币，质量好坏一起通用，不准拣选。从中可以看出半两开始由称量货币向虚值货币转变。

公元前288年，秦国与齐国各自称帝，秦王称西帝，齐王称东帝。齐王称帝两天后去帝号，此时的齐国国势达到了顶峰。

乐极生悲。公元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合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军攻齐，攻入临淄，连下70余城。齐愍王出逃至莒，被楚将淖（nào）齿杀死。王孙贾与莒人杀淖齿，立愍王子法章为齐襄王。燕引兵东围即墨，城中推举田单为将。双方相持达五年。公元前279年，田单组织反攻，用“火牛阵”大败燕军，收复失地。齐虽复国，但元气大伤，国力衰弱，从此不复昔日盛况，无力再与秦国争衡。

《战国策·齐六》记载：“襄王卒（公元前265年），子建立，为齐王。君王后事秦谨，与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余年不受兵。”

公元前265年，齐襄王法章去世，田建被立为共王，母君王后摄政。面对国力凋敝，百废待兴，君王后适时调整了内外政策，那就是“事秦谨，与诸侯信”。关键词在于“事秦谨”，视秦国马首是瞻。作为“事秦谨”的一项措施，齐国进行了货币改革。赢化三品的铸造、发行当于此时。君王后首先与秦接轨，采用秦半两的形制，改革本国货币，减量增值，作为权变措施，利大于弊。同时，铸造赢化，突出“赢”字，既有向秦示好之意，又以赢地领主自居，表现了齐人的智慧。

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是“齐土之民，风俗浅薄，虚论高谈，专在荣利。”（《洛阳伽蓝记·秦太上君寺》）同时，战国礼仪中也需用大量货币。货币成为齐国调节生产关系、发展外交须臾不可离的必需之品。二是“乐毅攻入临淄，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史记·乐毅列传》齐国国库空虚，铸造大刀，不堪重负，不得不与时俯仰，铸造减重超值的赢化。三是“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是齐国富国强兵之路。君王后希望通过运作赢化，“设智巧，仰机利”，发扬“不战而屈人之兵”传统，死而后生，重振山河。

当然，从历史的进程来看，纳入秦国圜钱币制结算体系，趋向货币制度的一致，对促进商品生产，扩大贸易发展，加快货币流通，化干戈为玉帛，有着积极的意义。

1962年冬，在陕西咸阳遗址长安张堡发现有“杜市”印的釜里装有1000枚古钱。除了有两亩钱1枚，益化钱2枚外，其余均为半两钱。1988年12月在甘肃长庆桥东郭村山头出土的铁罐内，发现了2万余枚秦半两钱及贝益化钱1枚，两亩钱2枚。考古发现说明秦人对于赢化的流通，还是乐意接受的。

“君王后死后，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玉，使宾客入秦，皆为变辞，劝王朝秦，不修攻战之备。”《战国策·齐六》公元前221年齐国被秦始皇灭掉。

苏轼在《六国论》中分析六国灭亡的原因时说：“六国破灭，弊在赂秦”，都是钱币惹的祸。

齐国灭亡之后，赢化亦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赢化

公鼐墓考证

孙昌盛

自20世纪50年代起，蒙阴县文史部门就找寻公鼐墓地。因无实物证据，故尔无法定论。可喜的是1999年在蒙阴镇曹庄村发现了公鼐墓志铭额，至此公鼐墓地到底在哪里的疑问有了确切的答案。据此将有关情况叙述如下：

一、地理位置与环境

该墓位于蒙阴镇曹庄村北约100米，地势平坦开阔，北依呈玉带形的凤凰山，南有汶河环护，西有来自凤凰山的水溪，地理环境优美。

二、历史记载

旧蒙阴县志载：公鼐（1558~1626年），字孝与，号周庭，公氏五世进士中的第五世进士。自幼聪明好学，童年能诗善文，读书过目不忘，20岁即闻名乡里。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太子的首席侍从官）授编修。天启初年（1621年）任礼部右侍郎。《中国名人大辞典》又载：公鼐，明蒙阴人，字孝与，万历进士，由编修累官至礼部侍郎，时群小植援乱政，鼐屡有论列，指陈切至，旋落职，卒谥文介。

公鼐是公氏五世进士的最后一位。他将公氏家族的道德文章、仕途功名发展到巅峰。《明史·公鼐传》载：公鼐考中进士后，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屡迁左谕德，为东宫讲官”。“东宫讲官”的职责就是给诸皇子当教师，后任左庶子（为太子首席侍从官）。明光宗时拜国子监祭酒（掌教育行政），熹宗时，加封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专管后宫及太子府的官员）。以上两位皇帝都曾是公鼐的学生，公鼐也被视为“两代帝师”。天启初年，公鼐任礼部右侍郎，生性刚直、疾恶如仇的他，受到明权臣魏忠贤党羽的极力排挤。公鼐自感势单力薄，愤而托病辞官，归乡赋闲，后逝于家乡，时年69岁。

公鼐还是一个文学家，著有《问次斋集》100卷，他写下了不少歌颂家乡山河的诗赋，如《东蒙山赋》等。在理学方面也造诣颇深，故光宗赐以“理学名臣”御匾。



公鼐庭院遗址中的古藤

公氏家族五世进士，且后两代进士同授翰林编修，一时名重朝野，在思宗（崇祯）即位后，追封公鼐为礼部尚书，谥文介，并给予“全谕祭”“崇祀先贤”的荣誉，以褒扬公氏家族功德。明末，在蒙阴县县署附近，修建了“全荣坊”和“五世进士、父子翰林”石坊，1961年因工程建设被毁。

三、发现文物

1999年11月20日，在巨山乡（2000年撤销，并入蒙阴镇）曹庄村（原村委院内）发现了“文革”期间在公家林出土的公鼐墓志铭额，当天下午由该村将其运往县文管所保存。经测量，石碑长1.03米，宽1.10米，厚0.23米，阴刻篆书竖写13行，计129字，略呈正方形，原文题额三行字是：明诰赐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赐谥文介公，公暨配彭淑人同墓，墓志铭。中间三行字是：赐同进士出身，奉政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前太子宾客，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掌翰林院事，经延日讲官，两朝宾祿副总裁，山阴钱象坤撰文。最后三行字是：赐同进士出身，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前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句容王祚远书丹篆额。

此次发现的是公鼐墓志铭额，真正的墓志即介绍公鼐生平事迹的志铭则更具史料价值。但据村民讲，此碑尚未出土。

根据这一发现，文史人员对公家墓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和了解，据原看墓人公丕生老人讲，原公家墓地规模大，规格高，古松遮天蔽日，南北长100米，东西宽70米，在公氏家族墓中公鼐墓南北长20米，东西宽20米，高5米，墓前依次对称排列着具有很高雕刻艺术水准的大型石碑、石人、石马、石丞相、石攀龙柱等石刻雕像。“文革”时期挖墓时发现银耳附、书籍、护身镜等文物，可惜现已散失。

根据墓志铭额记载和实地考察、群众回忆，明代文学家礼部尚书公鼐墓在蒙阴镇曹庄村北处是毋庸置疑的，这与县志记载“公鼐墓在曹庄”相吻合。这一重大发现为进一步研究公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公鼐是蒙阴人。公鼐墓的确立是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继续清理发掘公鼐墓，在掌握科学资料的前提下，恢复其原貌，发挥名人效应，使其成为蒙阴县历史名人古迹旅游点，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沂蒙山上好风光”之一——

锥子崮

本 编

锥子崮位于沂水县城西北29千米处夏蔚、泉庄两镇交界处的云头峪村北侧，海拔602米，面积1平方千米。因为山顶像一立锥而得名，又因崮顶高耸入云，人们称为云头崮、云头山，崮下有一村因此得名云头峪。1939年1月1日，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就创刊在这锥子崮下的云头峪村。

锥子崮附近自东至西三峰耸立，东边的是锥子崮，中间最小的名小崮子，西边的因崮顶倾斜而得名歪头崮。

锥子崮和歪头崮之间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故事。很久以前，在附近的村子里住着一个叫石头的小伙子，以放羊为生，因家境贫困，年龄很大了还没娶上媳妇，家中父母年事已高，已无力为他操劳，石头于是下定决心，靠自己的双



锥子崮，后两座分别为歪头崮和小歪头崮

手，挣钱娶媳妇，孝敬父母。

一天，石头下山放羊，看到河边有个小姑娘在洗衣服。天黑了，石头赶着羊群回到家中，这时还听到小姑娘洗衣服的棒槌声。第二天，石头一起床就听到棒槌声，吃完早饭，下山放羊时又看见那位小姑娘在洗衣服，如此一连三天，这位小姑娘都在这里洗衣服。第四天，他依然去放羊，小姑娘依然在洗衣服。他便赶着羊群到河边喝水，羊惊动了在河边洗衣服的小姑娘，石头就上前和她搭话：“你为什么天天在这里洗衣服？”小姑娘低头不语，过了好一会，才边哭边说：“我叫兰花，家里穷，交不上田租，父母都被地主逼死了，为了糊口，自己只能上地主家干杂活还债。”石头听了，很同情兰花，便对兰花许下诺言，说：“兰花，不用发愁，我石头挣钱帮你还债。”从此，石头拼命干活，起早贪黑地放羊，到了年底，他把所有的羊一狠心全部卖掉，帮兰花还清了地主的债务，把她赎了回来。兰花觉得石头憨厚能干，就嫁给了他。

从此石头和兰花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过起了幸福的农家生活。由于他们俩辛勤劳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成了当地很有名气的富户，兰花经过岁月的洗礼，变得人老珠黄，有了钱的石头，越看越不顺眼，开始对兰花经常打骂，兰花一气之下，搬出了家门，没过几天，石头又娶了一个媳妇，叫小姑。兰花很生气，但一想起当初相识时，又不忍心去折磨石头，于是天天站在家门口歪着头向东看，一天天过去了，最后兰花含恨死去，变成了一座歪头山，当地人叫歪头崮。一天，王母娘娘路过此地，听土地公公说了兰花的悲惨遭遇，决心要惩罚一下石头，就从头上拔下金钗，朝石头的头顶刺去，只听“啊”的一声，石头瞬间变成了一座山，头上的金钗变成了石锥，后来人们称这座山为“锥子崮”。小姑看到石头死了，自己也心灰意冷，一头撞在了石头身上，也变成了一座小山，紧紧偎依在石头身边，人们称这座小山为“小崮子”。



沂水夏蔚歪头崮

钱谦益《费县道中》赏析（一）

平凡



钱谦益

明末大诗人钱谦益写有《费县道中》七言律诗三首，其一为：

驱车入鲁吊遗黎，宗国相传事可悲。
歌凤有人供放逐，斗鸡无相系安危。
申丰锦去邻争美，阳虎弓还盗亦嗤。
唯有汶阳田下水，至今流恨绕龟龟。

钱谦益（1582—1664年），明末清初文学家。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常熟（今江苏省常熟市）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官至礼部侍郎，弘光时为礼部尚书。他作为东林党的领袖之一，在明末颇具影响。清兵南下，率先迫降，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国子祭酒。旋即辞职南归故里，潜心著述，暗地支持抗清斗争。

钱谦益是著名的学者、诗坛领袖，被誉为“江左三大家”之一。他力排前后七子的模拟因袭和钟、谭诗的纤仄诡僻，开一代之风气。诗学杜甫、元稹、白居易诸大家，古近体兼工，能为百韵以上的排律，参稽博综，具备雄伟、奇诡、温婉、秾丽各种风格，尤以典丽宏深见长。著作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

崇祯改元，明毅宗朱由检整治阉党，起用东林旧人，钱谦益受召赴阙，授礼部右侍郎（主管文化教育的副长官，正二品），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皇帝的讲官）。随后，他深受清正之士的拥戴，列入会推阁臣的名单，参与枚卜大典，有台辅之望。不料，阉党余孽温体仁等，以浙闹旧事进行攻击，钱谦益惨遭罢免，成了一名下野乡宦。

崇祯十年（1637年）春，因常熟人张汉儒诘告，宰辅温体仁支持，钱谦益和弟子瞿式耜陷入“丁丑狱案”，逮系京城。钱谦益被押解赴京途中经过山东时，在费县写下了《费县道中》七言律诗三首，此为第一首。

这是一首怀古诗，通篇皆用春秋时期鲁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第一、二句，说自己来到了鲁国属地费县，伤怀往事，发思古之幽情。

西周初年分封诸侯，周公旦被封为鲁公。鲁国是与周王室同姓的诸侯国，即所谓“宗国”。

鲁国本为西周强藩，震慑并管理东方，充分发挥了宗国的作用。但是，在经历了长幼之乱、隐公居摄、庆父之难、公卿争权等一系列变故之后日渐



衰微，传三十八世终为楚国所灭。触景生情，不由得悲从中来。

第三句“歌凤有人供放逐”，是说孔子周游列国之事。

孔子从55岁到68岁，带着他的若干亲近弟子，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在鲁国周边的卫、曹、宋、郑、陈、蔡、楚诸国游历。周游期间，历尽各种磨难。在楚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歌词大意是：“凤凰啊，凤凰啊，为什么道德这样衰落？以往的事情已无法挽回，未来的事还可以补救啊！完了，完了！当今从政的权贵们岌岌可危了！”这就是“歌凤”。歌中的“凤”，指的就是“人中之凤”孔子。

孔子52岁的时候担任鲁国大司寇，在齐、鲁“夹谷之会”上充分施展政治、外交才能，迫使齐国把郚、讙、龟阴之田归还给了鲁国。鲁定公对他非常倚重，又让他“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和鲁国执政季桓子也曾经有过三个月的“蜜月期”（《公羊传》：“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违。”），关系十分融洽。此时的孔子，雄心勃勃，怀着满腔热忱，一心要在鲁国恢复周礼，使鲁国大治。后因“堕三都”违怒“三桓”，失去了季桓子和鲁定公的信任。

以鲁国执政季桓子为首的“三桓”，意识到孔子强公室、抑私家的危险性，决定将孔子驱逐出政坛。孔子虽然仍居大司寇之职，却已经被排挤出鲁国的权力中心，实际上已经无政事可做。定公十三年，齐国挑选了80名美女、120匹骏马送给鲁国。季桓子接受了美女和骏马，并和鲁定公一起观舞听乐，三天不理朝政，故意冷落孔子。于是，子路就劝孔子离去。此时的孔子仍存幻想，打算再等一等看一看，认为鲁国即将举行郊祭，看季桓子是否按照礼制行事将致祭的祭肉分给他。可是，这年春祭，应该分给孔子的祭肉并没有送来。孔子终于明白，自己已经不会见用于季氏了，终于下决心退出鲁国政坛。孔子带领众弟子离开鲁国，鲁定公和季桓子并没有出面挽留，他其实就是被鲁国放逐了，或者叫作自我放逐。

第四句“斗鸡无相系安危”，是说鲁国的“斗鸡之变”。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九月，因季平子与郈昭伯的斗鸡事件，鲁国爆发了内乱。《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芥鸡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会伪谗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郈氏以难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台请曰：‘君以谗不察臣罪，诛之，请迁沂上。’弗许。请囚于郚，弗许。请以

五乘亡，弗许。子家驹曰：‘君其许之。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弗听。邠氏曰：‘必杀之。’叔孙氏之臣戾谓其众曰：‘无季氏与有，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戾曰：‘然，救季氏！’遂败公师。孟懿子闻叔孙氏胜，亦杀邠昭伯。邠昭伯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季氏与邠氏两家贵族斗鸡，季氏给鸡翅膀上涂了芥末，邠氏给鸡爪套上金属套。斗鸡结果，季氏鸡败。季平子发现了对方鸡爪上有弊，大怒，两方争斗起来，季平子一怒之下出兵占据了邠氏的封地。邠氏也愤恨季平子。臧昭伯之弟臧会，曾造伪诬陷臧氏，后藏在季氏家中，臧昭伯因此拘禁季氏家人。季平子大怒，把臧氏家臣囚禁。臧氏与邠氏一起向昭公告难。昭公九月戊戌日攻伐季氏，进入其家。季平子登台请求说：“您因听信谗言而不能细察我之过错大小，就来诛伐我，请允许我迁居到沂水以北。”昭公不答应。季平子又请求把自己囚禁于鄆邑，昭公仍不答应。季平子又请求带五乘车流亡国外，昭公还不答应。子家驹说：“您答应了吧。季氏掌握政权时间甚久，徒党极多，他们将合谋对付您。”昭公不听。邠氏说：“一定要杀死季平子。”叔孙氏家臣戾对其徒众说：“季氏被灭亡或仍存在，哪样对我们有利？”大家都回答：“没有了季氏，叔孙氏也不能存在。”戾说：“对，马上救援季氏。”于是他们出兵击败昭公军队。孟懿子听到叔孙氏战胜，也杀死邠昭伯。邠昭伯正作为昭公使节派往孟氏，所以孟氏抓住了他。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共同讨伐昭公，昭公于是逃亡。己亥日，昭公至齐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斗鸡之变”。

当时的齐国，有国氏、陈氏、高氏三大家族，也是执掌政柄的贵族，极力想要扩大私家的势力，与鲁国的“三桓”没有什么区别。齐景公多亏有贤相晏婴的鼎力辅佐，才苦苦支撑着齐国的危局。鲁国就没有这么幸运，缺少一个晏婴这样的贤相来辖制“三桓”（当时的鲁国由季氏执政，没有“相”）。

第五句“申丰锦去邻争羨”，是说鲁昭公客死他乡之事。

申丰，是鲁国大夫，季氏家臣。《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夏，齐侯将纳公，命无受鲁货。申丰从女贾，以币锦二两，缚一如，适齐师，谓子犹之人高齮：‘能货子犹，为高氏后，粟五千庾。’高齮以锦示子犹，子犹欲之。齮曰：‘鲁人买之，百两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币财。’子犹受之。”



这段文字的背景是：鲁昭公因“斗鸡之变”被权臣季氏驱逐出鲁国。鲁昭公二十六年，齐侯攻占鲁国的郛地，准备安置昭公，并命令大臣不得接受季氏的贿赂，阻挠这件事。但是季氏还是派家臣女贾和申丰，手持“百两一布”的币锦来行贿齐国大臣子犹。子犹接受了币锦，就去齐侯那里说鲁公的坏话，终于让行动停止下来。从此鲁昭公在外流浪八年，至死也没能返回鲁国。

文中的“百两一布”，历来存有争议。有人将“布”理解为布匹，“一布”就是一匹布。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布”是货币，“一布”就是一枚铲形币。这两种说法都难以成立。晋代杜预注曰“布陈之”，将“布”理解为布列、摆放，认为“百两一布”是每一百匹锦摆成一堆。从事件本身的内在逻辑来说，这种解释也讲不通。东汉初年经学家郑众认为，“百两一布”的“布”，是市场交易税，鲁国人买这批币锦，交一次税就用一百匹布。由此可见这一大宗币锦的高昂价格，也是为什么子犹一见币锦就想拥有的原因。有这样一大宗值钱的财物，自然会引得邻人争相羡慕了。

第六句“阳虎弓还盗亦嗤”，是说鲁国的“阳虎之乱”。

阳虎是鲁国执政季氏的家臣。他是一个十分有才干的政治人才，逐步把持季氏的家政，进而掌握了鲁国的国政（即《公羊传》所谓“阳虎专季氏，季氏专鲁国”），开“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之先河。鲁定公八年，阳虎劫持鲁定公和叔孙州仇，发兵攻打孟孙氏，先胜后败。其间，阳虎跑入鲁国宫室，窃取了鲁国的镇国之器宝玉和大弓，然后退守阳关（今山东泰安东）和讙（今山东宁阳县北），继续顽抗。次年，阳虎主动归还宝玉和大弓，希望和解，但是没有用，重新执政的“三桓”发兵进攻阳关。阳虎自知不敌，烧毁城门，趁乱逃出，投靠了齐景公。

宝玉、大弓是鲁国的镇国之宝。西周初年分封天下，周公旦被封为鲁公，因为需要他留相天子，“乃封其长子伯禽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宝玉、大弓，而俾侯于鲁，以辅周室”。足见宝玉、大弓之重要地位，实乃“国之重器”。阳虎的本意，并没有打算将宝玉、大弓据为己有，只是想为自己贴上一道护身符，关键时刻可以作为与“三桓”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已。事后证明也是这样，宝玉和大弓是阳虎主动还给鲁国的。尽管如此，孔子编《春秋》时写道：“盗窃宝玉大弓。”此处的“盗”是名词，指的是阳虎，因为阳虎是季氏家臣，身份低贱，连名字都不许出现，而是以“盗”代之。

正如《庄子·胠篋》所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难怪盗贼们发出冷冷的嗤笑了。

第七、八句，是对鲁国离乱历史的感叹。

关于“汶阳田”的最早记载，见于《左传·僖公元年》：“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因为季友对鲁国有大功劳（《史记·鲁周公世家》：“季友有大功于鲁，受鄆为上卿”），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冬天，鲁僖公把汶水以北的土地和费邑一起赐给了季友。

鳧龟：指鳧山、龟山。《诗经·鲁颂·閟宫》称“泰山岩岩”“奄有龟蒙”“保有鳧峰”，将鳧山、龟山与泰山、蒙山、峯山并称为鲁国五大名山。据近人高亨《诗经今注》说：“鳧，山名，在今山东邹县西南五十里。”“龟，山名，在今山东新泰县西南四十里。”

水还是那条水，山还是那座山。抚今追昔，感慨无限。多少刀光剑影，多少情仇恩怨。历史已成过去……

鲁东南枣强袁

袁兆勇

明初人口大迁徙对整个中国人口繁衍、迁徙、分布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留下许多传奇故事和未知之谜。数百年来，在我国广大地区到处都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就源于明初大迁徙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就山东袁氏而言，迁徙地具有多源性，主要来自山西、河北、江苏等周边地区，其中鲁东南袁氏就来自河北枣强县向义村，并繁衍成为庞大的袁氏分支。

一、始祖之疑

袁氏三兄弟并非迁鲁始祖。汪崖袁氏族谱记载：“我袁氏乃直隶省冀州枣强县向义村人也，自大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始祖兄弟三人徙居山东，长支居青州府日照县傅家疃（今五莲县高泽镇汪崖村），二支居青州府沂水县袁家庄，三支居青州府莒县九里坡（今莒县龙山镇东楼村）。”目前看来，由河北枣强迁鲁东南袁氏主要有这三支。由于原族谱失于“壬午之



乱”，各支谱对先祖的迁徙地和迁徙时间记载基本一致，但对迁鲁始祖、迁徙路线及迁徙繁衍情况记载不详。其疑点主要有五点：

1.表正公任职明朝锦衣卫指挥使。傅家疃袁氏碑志载：始祖讳表正，锦衣卫指挥使，原籍直隶省正定府枣强县向义村。史料记载：1382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初设锦衣卫，它原是护卫皇宫的亲军，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其最高长官为指挥使，常由功臣、外戚充任。袁氏先祖迁居日照13年之后明朝始设锦衣卫，因此，表正公不可能任职锦衣卫指挥使一职。

2.碑文所记。族谱所载碑文：“始祖表正开辟自食迄今三百余年，世受二代皇恩，兹非幸欵，想仓猝之际，未谋堪輿，葬于疃后，世远年湮，格惧失迷，遍告族人同建一石以志之。”世受皇恩本是光宗耀祖的好事，为何死后没选择坟地而匆忙下葬？

3.繁衍速度过缓。1379年，袁氏先祖迁居日照，表正公官居锦衣卫指挥使应50岁左右，约生于1330年前后，至九世格公（1702年）共八代人382年，平均42.4年，这显然不符合30年左右一代人的繁衍规律。

4.五莲长兰袁氏和汪崖袁氏同先祖。汪崖与长兰南北相距不过15公里，长兰始祖表章公与汪崖始祖表正公用一个行辈，汪崖二世、三世失讳，四世至八世五代人有四代行辈与长兰相同，长兰六世斯成公曾由汪崖五世辅臣公抚养并列汪崖族谱世系表，辅臣公与斯成公定属叔侄关系，表正公与表章公属迁鲁先祖一脉之后，也就有了五莲表正表章、沂水自当、莒县维正三支四始祖之说。

5.日照、寿光袁氏同属枣强移民。同时同地迁往同一地区，说明600年前在枣强时就很有渊源。格（九世）公在《联谱慎重》提到：“伯兄枢曾联寿光张娄庄讳锡字纯嘏一宗弟，至周家疃辛酉科袁栋庠生矜式乃吾侄。”经查，寿光周疃确有栋（十二世）公其人，与日照袁氏十世同辈，寿光周疃十一世、台东十世和南袁十世为同谱同辈，同用一个京字。所以，沂水族谱记载是准确的：“袁氏之先，冀州枣强人也，明初迁沂，生讳卒葬俱无可考，至讳自当祖始有可记，奉为始祖。”由此可知，表正公前应缺失几代，并非迁鲁始祖，表正、表章为同祖兄弟或堂兄弟是讲得通的，表正以及各支谱所载始祖应是后世另奉的。

莒县袁氏始祖维正公。1939年4月21日，日寇火烧九里坡，莒县三支袁氏族谱和所存资料无一幸免。1908年邢家沟会亭、1936年夏店仲一、1951年东楼（九里坡）揆一、1990年黑涧岭肇禄分别续修了支谱，但对始祖情况却无记载。2000年，锡平从五莲潘村袁氏族谱中查到莒县袁氏始祖名讳。族谱记载：“启，字承悟，行三，莒州九里坡维正公之八世孙。”从而知晓莒县袁氏始祖维正公。

二、迁徙、分布

明初人口大迁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人口繁衍、分布大整合。明史记载，元朝末年，朝廷对外连年用兵，对内残酷压迫，引发了持续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同时，藩王之间争夺地域之战也时有发生，济南、德州、真定（河北省正定县）、沧州等地都发生过许多惨烈的战役，加上黄淮流域水灾、旱灾、蝗灾等疫情不断，山东、河南等地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蓬莱县志》记载：“元末明初，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此时，山西却是人丁兴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加上难民涌入，很快成为人口稠密地区，为大迁徙创造了前提条件。为巩固新政，朱元璋实行移民屯田战略，从山西等地强行迁徙大批百姓以充实山东、河南等18个省份。河北枣强是大迁徙的集散地和输出地，外迁人口不计其数。在今天的山

东滨州、齐河等地多数村庄自称元末明初枣强移民，阳信、沾化几乎是枣强移民的天下。鲁东南袁氏先祖们正是随迁徙大潮由河北枣强移居鲁东南地区，并在此繁衍生息的。

1369年，袁氏先祖迁日照后聚居傅家疃，后分迁莒县厉家疃（袁家疃）和沂水袁家庄。夏殿族谱：“考吾先祖自明之初由河北枣强县迁居海曲，明中叶由袁家疃分居西乡袁家庄和东乡九里坡。”傅家疃族谱记载：“我袁氏乃直隶省冀州枣强县向义村人也，自大明洪武二年始祖兄弟三人徙居山东，长支居青州府日照县傅家疃，二支居青州府沂水县袁家庄，三支居青州府莒邑九里坡。”沂水族谱：“袁氏之先，直隶枣强人也，明初迁沂，生讳卒葬俱无可考，至讳自当祖始有可记，奉为始祖。”

傅家疃最早迁出的有莒县东莞袁家庄、五莲县长兰和日照袁家庄、后固子等。1960年汪崖、潘村、程戈庄等村成为墙夼水库库区，部分族人移民内蒙前郭旗。1966年汪崖、潘村、程戈庄部分族人再次移民，迁至诸城尚沟河、雷家岭、胡家楼、涝洼、大埠屯、大辛庄子、九台后庄、丁家庄。1949年，战乱时期后固子有一支迁居台湾高雄。目前，日照两城镇孙家官庄、西屯，河山镇邱家官庄和岚山碑廓镇袁家庄均有袁氏族人，但在历次续谱中均未见踪迹，本次续修均单列谱上，与南门里袁氏一样并列族谱传世。实际上，族谱还记载一些线索。“六世祖斯偁，明崇祯丙子岁廩贡，明清换代避兵乱而隐居琅琊（今山东胶南），世代在此繁衍生息，其后世有一支迁居诸城苗家庄。斯偁之侄，信，字介石，阵亡后，其子携一佚女戴氏避居东武（山东诸城），其后世有居胶东者，有居辽阳者。斯琛公一支有逃出出境者二人，一支居江南宿迁县，一支居东海两城集，留草以俟后人查考。”

从谱中还可以看出，鲁东南袁氏在历史上曾联过谱，且十分慎重。傅家疃格公曾与兰山县（今临沂市兰山区）炎、佑等论过兄弟，并写下《联谱慎重》警文。“袁氏分姓散处寰宇皆属宗人，若要联谱，必问宗兄几辈人，宗兄在何辈数，自上而下方好称呼，庶不紊乱。格平生淡泊，曾联兰山县大冶庄炎、佑，穆家疃一宗兄延祚，其余未有也。伯兄枢曾联寿光张娄庄（青州市南张楼村）讳锡字纯嘏一宗弟，至周家疃辛酉科袁栋庠生矜式乃吾侄。行辈数定明后，日问宗派无可疑者尔，后人若欲联谱，不可念富贵而混称，以遗先人羞，慎之，重之。”

沂水谱序云：“明初迁沂，生、讳、卒、葬俱无可考，至讳自当祖，始有可记，奉为始祖，居沂水南门外教诸子从师读，五世祖文芳，字汝芬，号兰轩，别字抱一子，庠生，晚年厌城市喧嚣，徙居苗家村，即今袁家庄也。”十四世炼公与其长子仙洲公分别考取嘉庆辛未（1811年）和道光己丑（1829年）进士，俗称父子进士。炼，字冶池，考中三甲第30名进士，勅授文林郎，国子监助教，诰封奉政大夫，奉天府新民厅抚民同知。振瀛，字星峤，号仙洲，幼颖异好学，十七入泮，道光辛巳领乡荐，考中了三甲第17名进士，筮仕直隶，授广昌令调繁暑奉天府承德县，升任新民厅委暑奉天府治中锦州府知府事。莒县袁氏无论是族谱记载还是口传均为九里坡（莒县龙山镇东楼村），实际上是先居袁家疃，后迁东乡九里坡、西乡袁家庄。《重修莒志》记载：二区厉家疃袁氏“原籍河北省枣强县，始祖某于洪武十二年迁此，明之中业，疃中被水灾，始向四方转徙，居东乡者，以九里坡为最早，又分居上下官庄、王家庄子、田家村、城口、大宋家村、刘家村与日照属之邢家沟、宅科、潘村、蓬庄、沈疃等处。居西乡者以袁家庄为最早，而下（夏）店、李家庄、茶臼坡、沙河崖、寨西、前岔河、马庄、路家庄、大苏家庄等次之。居北乡者有徐家官庄、古路官庄、西全寨、苑家庄、王家庄、董家坡、沙沟、黑涧岭，明初至今传二十世。”袁家疃水灾后分九里坡和夏殿两支，实际上还有一支迁至上、下袁家官庄。

另有一支袁氏并入日照族谱，1765年（乾隆三十年），日照南门里袁氏从浙江宁

波慈溪县迁来，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并入日照族谱，并有记载：“吾高祖一桂公居住或由直隶而去，或由日照而去，或即世居慈溪，殊难稽考。自吾曾祖父泰公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由浙江迁照迨九十余年。化堂修谱吾祖汝连公始将祖父身、子、孙五世入修照邑袁氏族谱，各别为世。虽各别为谱，七世已同矣。”

据了解，同属明初枣强迁鲁的袁氏还有寿光田柳镇南袁村：“始祖好学，原籍直隶枣强县西南三里许泡庄，明洪武二年奉命由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迁至山东省寿光县城北弥河西岸立村，以姓氏命名袁家庄。”乾隆二十六年冬南袁十世祖大壮在《南袁家谱》序言“履历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原居中汝南后迁居河北枣强县，洪武二年又迁移于寿邑……。”并说“兹因族谱之修，首叙履历一记。”寿光台东村：“始祖安邦原籍系直隶省正定府冀州枣强县，明初迁至青州寿光北洛庄，由北洛庄移居南皮台”。章丘市宁家埠袁氏祖籍河北冀州府枣强袁家楼，洪武年间奉旨迁往济南府。东营市史口镇袁家村：“明永乐五年（1407）袁登仙、袁伟二人从直隶省枣强县迁此立村，故名袁家。”由此看出，明初枣强迁鲁袁氏不在少数，有详细始迁地的就有向义村、许泡庄、袁家楼，同姓、同地、同时迁往同一地区，说明在枣强就很有渊源。2002年1月，五莲袁锡平等族人去河北枣强县寻根问祖，由于世远年湮，朝代变迁，没有找到向义村。

三、世系、行辈

鲁东南枣强袁氏按金、水、木、火、土五行相生排列行辈。明、清曾使用一辈单字、一辈双字的起名方法。傅家疃从9世始为：木字旁单名、土字居首双名、金字旁单名、学字居首双名、水字旁单名、延字居首双名、火字旁单名、高字落底双名、土字旁单名。

日照（长支）和莒县（三支）自17世始为：正肇安从启、兴立永隆昌。1951年东楼又拟10字，自27世始为：善同经宣孝、守维继世明。主要分布日照、五莲、莒县、诸城等地。1908年日照第三次续修增加10字：“鸿裕世崇广、克锡懋祚祥”与“正肇安从启、兴立永隆昌”一并使用，不分先后、正负。1934年日照第四次续修另排20字，自17世始：敦伦孝友大、茂得诗书备、继叙前明光，燕贻慎素位。小董家村，从27世始为：仲三千坤美、文风忠恕信、重九日月明、武德侠仁平。

沂水（二支）从14世始为：锡泰树烈封、锤浚懋耿垂、钦汝荣熙在、钜泽果然生。2006年又拟十字：金溥林烨均、铭清东耀坤。主分布在沂水、沂南、临沭等地。

四、族谱创修、续修

明史记载：“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史称壬午之乱），清皇太极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率军攻陷山东兖州、登州、莱州、莒州（莒县）、沂州（沂水）、海州，共计攻下88城，降服六城，掳男女36万，掠黄金一万两千两、白银二百万两，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由墙子岭出关还师。”莒州、沂州正是枣强袁氏居住的密集区，这次战乱给鲁东南袁氏和当地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傅家疃《袁氏族谱》也随之佚失。

近年来，各地找到一些珍贵的资料，为第五次续修奠定了基础。在这些资料中，只有清乾隆后编纂的一、二、三、四版本，而“壬午之乱”丢失的袁氏族谱却未见踪影。夏殿族谱：“疃中长老至今尚云，吾祖莹祭田三十六亩，所有文约地契并存汪崖。”按惯例祖莹祭田文约、地契世存长支，也应保存过那在战乱中佚失的族谱。

1753年，傅家瞳格公（1702—1773年）遵伯父和父亲遗命创修族谱，此时距“壬午之乱”已过去110年。格，字君式，号崑麓，道号遗圃，乾隆丙寅（1746年）岁贡生，候选训导（从八品）。其父可立，字公权，太学生，候选直隶同知（正五品），例授儒林郎，按30年一代人计算，约生于1672年。其祖父佐，字扶宇，号佑民，又号梅里，寿73岁，乡谥恪靖，寄籍莒州庠生，赠儒林郎，直隶州同知（正五品），约生于1642年。其曾祖父斯纪，字乾安，号遁翁，清顺治丙申（1656年）拔贡，生于1612年前后。所以，格公年少时，距“壬午之乱”不过60多年，应经常听说那可怕的战乱和佚失的族谱，也就有了格公谨遵伯父、父亲遗命创修族谱之说。实际上，格公还考证到一些情况。“格今叙谱，凡我始祖嫡派一支不遗。细索各支，内有不记祖父名字者甚难混填，即如袁自修系可祥侄孙，自杰系袁彬胞侄，袁永和系袁朴堂叔，袁德系袁朝瑞从堂祖，缘皆名次失亡，格何敢任意模写，分为四支各叙，勿使后人错乱。”由此看出，格公修谱十分谨慎。1873年（同治十二年），袁化堂“负一编走四方”，把日照袁氏修为一谱，名次不清以村为记。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会亭公、化南公等进行了第三次续修，并对同治版族谱进行了核对整理。1923年汪崖大俊公、1934年城南门里敦祺公等分别作了第四次续修，并集资购得日照城北门里大宅一处，准备设立日照袁氏总祠，新谱印刷完成未分发抗日战争爆发了，新谱随之佚失。2000年，锡平对傅家瞳《袁氏族谱》（斯纪族）进行了续修。

沂水袁氏族谱也曾四次续修。沂水族谱序言：“我《袁氏族谱》失于‘壬午之乱’，至乾隆十年（1745年）扈山前袁濂始有抄本，上东门士义公第二次续修为石谱，立碑于邵宅南老林。道光二十年（1840年）袁家城子玉基公、袁鍊父子作第三次续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团山庄袁钿与诸葛村清臣公第四次续修。”2006年，沂水封瑞等按“新者添入、远略近详、传其可信、不传其可疑”等要求进行了第五次续修。

1936年，由会亭公、仲一公发起续修莒县《袁氏族谱》，九里坡与西乡夏殿分别进行。1937年11月，夏殿先行印刷。族谱记载：“吾族谱牒之修也，原发起于九里坡，迨吾创修完毕，而九里坡犹未成功，且终止焉，当兹大乱之世，不特不先行印刷，以备不虞，是以不及待九里坡之修纂成功也。”1990年，黑涧岭肇禄等根据残稿续修族谱。族谱记载：1932年，袁文光等族侄、孙数人携族谱去九里坡寻根祭祖，查七世祖的坟莹、墓碑尚存九里坡西老林，便将族谱存于九里坡同族家中以续修族谱。1939年4月21日，日寇火烧九里坡，烧毁房屋200余间，族谱原件和新谱均未幸免。1953年，庆三、庆年等以所存支谱残稿为据重修族谱。1967年春，又在“文革”中被焚之，幸存一残稿，为第五次续修提供了依据。

2005年10月，鲁东南袁氏联谊会成立，并在沂水县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达成四点共识：一、确立鲁东南袁氏同根、同源；二、修鲁东南袁氏族谱；三、成立鲁东南袁氏联谊会，建立通讯录；四、为袁氏家族发展作贡献。

华东局组织部、军政治部关于 抽调南下干部的通知

(1948.9.10)

目前由于我军的外线歼敌战略反攻，我华中、中原解放区已逐渐收复与扩大，为迅速开展该地区工作，兹依照华东工委关于抽调南下干部之决定特通知如下：

一、现在渤海地区之各机关学校，凡系鄂豫皖、苏皖浙、苏鲁边干部尽量抽调，其原则如下：

1.鲁中、鲁南后方外来干部全部抽调，渤海外来干部抽调三分之一，遗职由鲁中、鲁南本地干部补充。

2.凡未分配工作者全调；在职而有正副各一者，抽调一人；如在新开辟地区作用更大者，亦应调出另行补充。

3.华东局及军直所属各机关、学校，除卫生部、兵站部作个别调整外，其他一律厉行精简，尽可能抽调；党校的东纵干部随两广纵队南下，军大党校学员中外来干部（包括华中、皖中、皖南、中原军区来的干部）全调，教职员斟酌抽调一部。

4.凡体弱、疾病、残废及家属小孩暂不抽调。

二、以上各地区抽调人数之分配：1.鲁中三百；2.鲁南二百；3.渤海三百，另财经干部四百（共七百）；4.机关学校五百至七百；5.国区部已集



南下干部行进中

中约七百，共约计二千六百人左右。

三、全体干部于十月二十五日前调集完毕，十月二十五日前将干部名册送华东局组织部，以便计划分批起程（第一批国区部的，第二批鲁中、鲁南的，第三批渤海的，第四批机关学校的）。

四、胶东，滨海、鲁中、鲁南地区及省直属后方外来干部，由华东局在胶东另行抽调送走。

五、分区与地委级以上干部由华东局、军区按名册指定抽调。

六、抽调中应注意之点：

1. 抽调干部应从说明形势特点，我军战略方针及南下任务之思想动员着手，说服被调干部服从整个战争需要，抛弃个人打算，打破一切顾虑，勇敢向前。

2. 被调干部离原工作岗位前，应将过去工作仔细总结、交待，防止草率行事影响工作，本人亦应尽量争取作鉴定，或提供意见材料随身带华东工委，干部集中后由华东工委统一介绍陈、粟处分配。

3. 南下环境开始可能动荡，为减少个人及整个负担，行装携带务必轻便，所留家属小孩由原来各部门统一负责照顾，待形势稳定后护送南下。

附：《关于南下干部临时组织与生活规定》

一、为保证沿途行军安全，南下干部应一律按军事编制，统一指挥。干部集中后应就地按大队、中队、分队、班编制，大队设大队长、政委，中队设中队长、指导员，分队设分队长，班设班长（干部人选由集中干部商讨提出名单给华东工委批准）。

二、为保证沿途遵守行军纪律、群众纪律，各组织应建立党的组织，大队成立总支，中队成立分支，班建立小组，大队政委兼总支书（有必要时可设副总支书），吸收各分支书为委员，中队指导员兼分支书，分支委可由支部大会选举（三人至五人），小组长由小组选。

三、关于生活问题的几项规定：

1. 关于给养问题在出发前由大队统一筹划，向华东工委支领并介绍大队沿途统一向兵站或当地党委机关接洽，其菜金按实物发给，津贴、保健照旧。

2. 以中队或大队为伙食单位，伙夫由各队杂务人员中自行筹划。

3. 行军中预备费，由大队按人数和行军时间每人按五十元一天预算领取（游击队另定，该款应作为整个大队统一开支）。到达目的地后向该地负责机关报销，剩余交公，不得浪费乱支。

4. 在出发前领取秋季日用品（按此地供给标准），未领者补发。

5. 防止沿途疾病发生，由大队统一领取一部急救药品，以备应用。

四、人员、马匹及行军中民夫车辆应用的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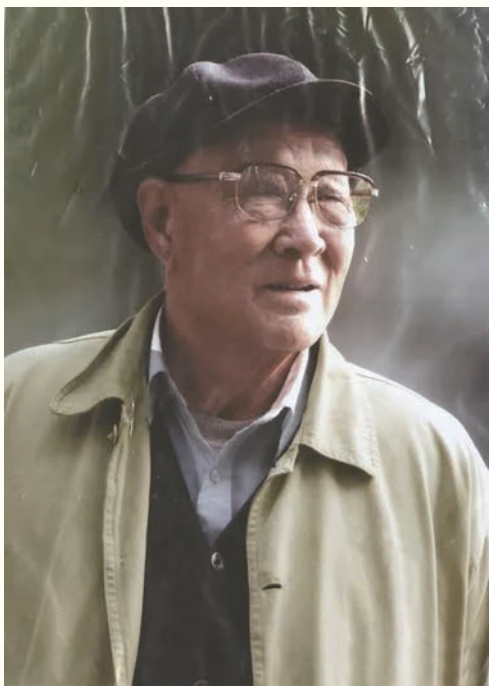
1. 各级干部的人员马匹，一律按去年华东局精简决定，不得自行增添，预算中要注明，否则粮草不得报销，多余人员马匹一律交华东局或军政治部。

2. 无马匹的干部行李由大队统一筹划民夫车辆携带，战士、班长不得超过八斤，干部排连级不得超过十斤，营级不得超过十五斤，地方县级不得超过二十斤，有马匹干部一律不准另用民夫。（此件来源于山东省档案馆）

南下云南边陲 (二)

——记李勤奉

郑潇洒



李勤奉（1924—2013年），山东沂南县大庄镇前交良村人。童年时期，家境殷实。十岁在本村私塾读完《三字经》《百家姓》等，其余时间多为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牧驴便是他的任务，也是他喜欢从事并津津乐道、至老年仍梦萦魂牵，久久难以忘怀的一段美好记忆。

李勤奉一直到15岁在本村的小学（当时叫“洋学”）断断续续地上了一年。这其中经历了家庭的巨变，好端端的家庭叫地主逼得四分五裂、人死财空。又经历了日本法西斯对家乡的蹂躏。国恨家仇，迫使他在不到17岁时就扛起枪投入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之中。

1941年冬，李勤奉参加了村里的抗日游击队，并担任了临费沂边联县土山

区（今沂南县大庄镇）民兵联防大队交良分队队长。17岁的他带领着交良庄的抗日健儿，在沂河两岸配合八路军展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肩负着保护群众、保护老百姓庄稼地、深入敌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敌后斗争，带领、掩护、护送上级领导及不熟悉路径的革命同志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奔赴其他抗日前线的任务。

1943年冬，19岁的李勤奉在任土山区青救会副会长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为了民族的解放，离开了生养他的年迈父母，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离开了汶河岸边那片热土，踏上了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征程。

1944年冬天，李勤奉被选派到山东鲁中公学学习。1945年初，他在鲁中公学学习时，党组织临时派他到韩旺区领导、帮助完成扩军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原估计要按时完成任务有一定困难，可经过先党内后党外的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无限高涨，结果比原预计的时间提前十天超额完成任务。

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此时，21岁的李勤奉已由鲁中公学毕业分配到益都（今青州）车站镇任镇长，参与接管、建政和遣返日本战俘的工作。

李勤奉领导的山东益都日本战俘遣返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上百个遣返站中的一个。他严格执行《波茨坦公告》有关战俘遣返的条款和共产党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在益都共遣返日军战俘及家属2500余名。不论是当地俘获、缴械的或是外地经益都转运的战俘及家属，只要到了益都都按规定给予人道主义的优待，除了给吃、给穿、给喝、给医外，还给每人发放一定的生活费、路费。如此的宽大优待，给那些曾在战场上挥舞着屠刀、疯狂杀戮中国人民的狂人以极大的震撼。他们有的长跪不起，有的嚎啕大哭追悔莫及，更有甚者愿以死来谢恩。

在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日期，而到了潍坊国统区（国民党占领区）遣返站，日本战俘的境况就不同了。据说凡经八路军益都战俘遣返站遣返至国统区的日本战俘及家属，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虐待，共产党八路军发放的路费、生活费及衣物一律被其收缴或哄抢得精光，有的战俘家属较为年轻的，竟遭国民党遣返官员侮辱，更甚者被强抢为妻妾而不能顺利回国……

这样以来，遣返的战俘知道了情况，一到益都或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遣返站，再要往潍坊或是其他国民党占领区的遣返站转运，就有抵触情绪，哭着、闹着、乞求着不愿离开益都，不愿离开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遣返站。50多年后，有些当年被遣返的受到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益都遣返站优待的日本老兵，通过中日友好协会致函深表谢意；还有的老兵及后裔专程到中国向益都这样的遣返站寻觅谢恩……李勤奉当年领导的益都日本战俘遣返站，曾受到国际的好评和上级的表扬。

在此期间，李勤奉还先后担任了敌后山东益都弥河区副区长、益都情报站站长等职，其主要任务是：领导组织敌后武工队，就地坚持对敌斗争；监视敌人，收集情报；偷袭和打击小股敌人；镇压依附国民党仗势欺压人民为非作歹的还乡团首恶分子和坏保甲长、坏分子；深入敌区宣传群众、破坏道路、埋设地雷、伏击敌散兵。用一切有效手段打击敌人。

1948年2月，李勤奉被派往华东建设大学学习。至7月淮海战役的前夜，他从华东建设大学直接调到华东支前委员会伤员转运总站一分站任站长，接受了淮海战役中我军伤员抢运转运及担架队与作战部队的协调指挥任务。他直接带领担架队配合我军某部三团参加了首歼黄百韬兵团、攻打碾庄东南角的伤亡人员抢运、转运工作。

渡江战役后，为适应全国解放接收新解放区的需要，李勤奉被调任西南服务团川东支队开县中队副队长，准备随第二野战军挺进大西南。在组建、整顿、学习的大半年时间里，他和战友们就住在南京昔日蒋介石的总统府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西南服务团正式誓师开拔，挺进大西南。

历时近三个月的长途跋涉，跨过千条江河，越过万丛高山，饱览无限风光，历尽千辛万苦，于1949年底到达四川省开县。

1950年1月，经长途跋涉到达目的地——四川省开县地区。李勤奉由组织分配到开县敦好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建政、土改、清匪反霸、征粮。他作为党派到敦好区的第一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带领同志们深入村镇，发动贫雇农，组织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进行土地改革，组建、培训征粮队（他的妻子即是那时由县委调到敦好区征粮队工作，认识了李勤奉，才有了以后的姻缘）。由于当时没有也来不及建立自己的村镇政权，只有依靠发动广大贫雇农，利用旧政权留下的乡保甲制；鼓励开明绅士带头纳粮纳税，参加土地改革；争取中产阶级观望户，投身到征粮土改中来；打击地主、恶霸、土匪武装及抗粮主。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建立了各村镇的基层组织，废除了旧时的保甲制度，仓满粮足，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开展起来了。

人民政权的建立，土地改革的蓬勃开展给千百年受压迫受剥削的刚翻身的劳苦大众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光明。可被推翻的阶级及其代理人决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的舞台。敦好区的大地主、大恶霸、大土匪太子肖红就是其中之一。盘据在紫水山以肖红为首的匪徒，集聚山林，昼伏夜出，大肆袭击我各村镇新生的红色政权，残酷屠杀县区机关干部及土改积极分子，袭击人民政府组织的征粮队，杀人放火，抢劫绑架，无恶不作。李勤奉在县委的领导下，带领区委、区政府人员、基干民兵、征粮队及配属保卫土改建政的部队武装与肖匪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狠狠地打击了肖匪的嚣张气焰。全区民众被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充分发动起来了，龟缩于紫水山的肖匪，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情报立马就会传到区乡各级政府及各级剿匪部队那里。

肖匪被困紫水山，人困马乏，寸步难行，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匪徒中除部分地主、恶霸、地痞、流氓、国民党散兵外，大多数是受蒙蔽被胁迫而上山的穷苦百姓。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开展，共产党、人民政府政策的不断深入人心，以及家属亲友的规劝，一部分受蒙蔽被胁迫的从匪纷纷下山向人民政府投诚。肖匪内外交困，但不甘心就此灭亡的命运，还要做垂死挣扎。一天，肖匪让人从山上带信给李勤奉，信大意是：“鉴于您及人民政府、解放大军的威严，肖某愿重新做人，改恶从善，带领匪众向您及人民政府、解放大军投降，以求宽大处理。定于八月初八在敦好区东山投降，请求您届时带队前往受降。”根据肖匪阴险狡诈无恶不作的品行以及打入匪徒内部人员提供的情报，表明肖匪的所谓投降是一个暗藏杀机的诈降，妄图把敦好区政府的注意力及武装力量调到东山，来个调虎离山，再在西山集结，一举攻占敦好区，踏平区政府。

将计就计。李勤奉经请示上级领导作出了消灭肖匪的作战方案：一、答应肖匪东山投降的请求；二、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形成政府行将在东山受降的热烈气氛及热闹场面；三、届时除秘密留下足够力量保卫区政府及敦好乡人民安全外，由李勤奉带领全体政府人员、武装力量和部分群众积极分子，组成受降队伍轰轰烈烈上东山“受降”；四、从开县派剿匪部队于八月初八土匪集结前秘密设伏包围土匪集结地，一举歼灭肖红匪帮。周密作战计划的实施，取得了剿匪战役的圆满胜利。人民政府、解放大军彻底消灭了骑在敦好区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罪恶势力，镇压了匪首肖红及其首恶分子，敦好区人民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敦好区剿匪胜利后，大约在1951年2月，李勤奉被调重庆川东党校任班主任，为我党接管全川政权培养党的基层干部。与之相识相恋的女朋友也因与李勤奉的关系，



由组织部门调到重庆川东行政干校工作。他们于1952年春节在山城重庆结为伉俪。那年李勤奉28岁，妻子25岁。他们互敬互爱，风雨同舟，相携相伴走过了50年相亲相爱、风风雨雨的人生路。不幸的是老伴于2001年7月去世，享年74岁。

1952年9月，随着建设新中国的时代脚步，李勤奉夫妇接受组织派遣，千里迢迢来到了他们为之献出了青春、贡献了一生的第二故乡——祖国的西南边陲云南省思茅地区。他们在这里播种，在这里耕耘，在这里收获，把一身汗水，满腔热血，甚至于百年之后的一缕忠魂也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异乡的土地上。

他先后任普洱县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普洱县委常委，思茅地区供销合作社副主任，思茅地区造纸厂、机械厂厂长，“文革”后任思茅地区乡镇企业局第一副局长、党组第一副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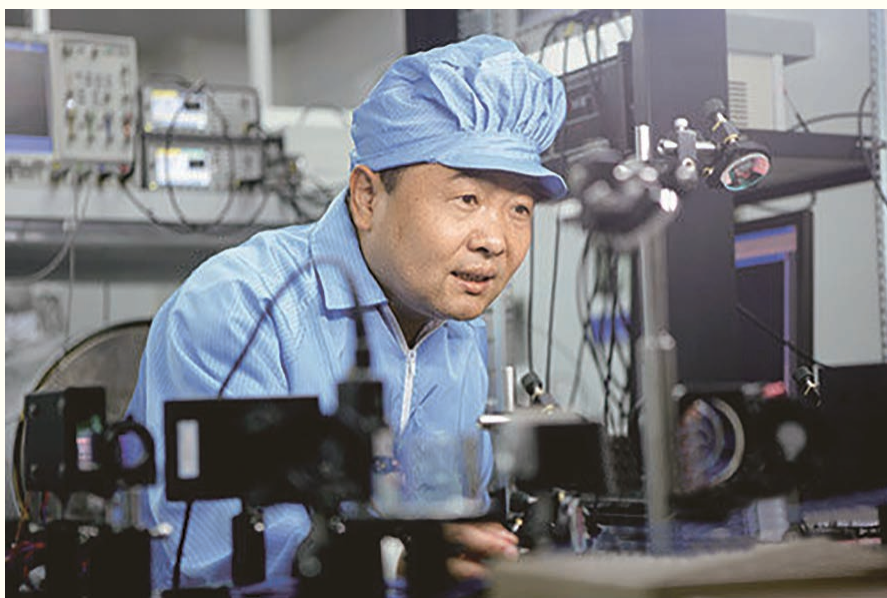
1985年9月15日，经组织批准，李勤奉在他参加革命43个年头之际，光荣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

李勤奉一生无憾事，只遗憾忠孝不能两全。自1943年参加革命离开家乡，离别父母，告别兄弟姐妹、父老乡亲，至今60余年，仅回过老家两次，一次是去北京开会匆匆路过，一次是“文革”期间无所事事，携妻儿回乡省亲一次。

李勤奉从1952年9月入滇至1985年9月离休，在各方面条件相对落后的边陲工作了33个春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历尽坎坷，赤胆忠心，不论风云多变幻，始终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满腔的革命热情，大无畏的奋斗精神迎来一个个春天，战胜一个个严冬。

房建成：空天报国敢为人先

荣庆春



中科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房建成志存高远、心系祖国，始终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祖国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他坚持不懈，打破国际封锁，为我国研制出一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科技成果；他言传身教，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带出了一支敢打敢拼、持之以恒的研究团队；他勇于创新，引领我国量子传感领域研究，带领团队勇攀国防科技高峰；他谦和质朴，甘于奉献，始终以“永不停转”的陀螺精神实践着对党、对国家和对科学事业的坚持，以及对人生的崇高追求。

永恒的“陀螺精神”和三代北航人的“陀螺梦”

房建成，1965年出生于被誉为“两战圣地、红色沂蒙”的沂蒙山区，在沂蒙地区，自古名人辈出，灿若群星。在这片红色的沃土上，房建成从小就继承了沂蒙人吃苦耐劳、勇往直前、永不服输、无私奉献、敢于胜利的精神。

1988年，房建成从西安交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获得硕士学位以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工作。1999年，房建成博士后出站以后经解放军总政治部特批，作为国防科技工业急需人才转业跨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是从那时起，房建成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走上了一条探索地球空间，研制磁悬浮飞轮的道路。

“陀螺”古已有之，最初只是一种玩具。我们周围的世界中，到处可以看到陀螺。小到原子，大到地球，到处都是旋转的“陀螺”。帮助中国卫星和空间站在太空保持稳定姿态的“磁悬浮飞轮”与“磁悬浮控制力矩陀螺”则是房建成他们对我国新一代卫星和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贡献。

量子陀螺仪——国际最前沿的量子测量技术。是一种设计结构复杂、具有极高精度的惯性导航定位系统。它可以自主测定物体的位置、速度、姿态、方向等数据，就像给移动中的物体装上了眼睛。无论洲际导弹，还是战略核潜艇，都需要高精度的陀螺仪。正因为陀螺仪在国防科技领域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国外对任何国家都是严密封锁和禁运的，必须靠我们自己来研究和攻克。

上世纪50年代，由于“两弹一星”工程的重要需求，在钱学森的提议下，1952年，中国惯性技术奠基人之一的林士谔先生在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陀螺惯导专业，并于1956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陀螺惯性导航实验室。从那时起，国家的重大需求就始终是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是北航陀螺人的责任和使命。房建成教授作为北航第三代陀螺技术带头人，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实践中，始终坚持围绕国家重大需求、重大工程等科学问题，瞄准关键技术瓶颈，持之以恒，不懈努力。

“护驾”中国高分辨率卫星，研制成功星载磁悬浮飞轮

房建成教授和他的团队面对的第一个挑战，是“护驾”中国的高分辨率卫星在太空中飞得更久、更高、更稳定。怀着空天报国的热忱，十年磨一剑的努力，团队研制出了两类用于卫星和空间站姿态控制的惯性执行机构——磁悬浮飞轮和磁悬浮控制力矩陀螺。

飞轮是卫星在太空实现姿态稳定的关键控制部件，卫星的飞行轨道很高，姿态稍有不稳，就无法实现对地面的高精度观测。这就好比我们用相机拍照片，手一抖，照片就模糊了，更何况要在十万八千里外让照片不模糊。上世纪末，我国虽然掌握了基于机械轴承的飞轮技术，但机械轴承飞轮有接触摩擦、精度低，成为严重制约我国卫星姿态精度进一步提高的瓶颈，也是卫星寿命从几年向几十年跨越的关键技术问题之一。西方国家为解决卫星的高精度和长寿命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展了卫星用磁悬浮飞轮技术的研究，但作为高新技术，对我国一直实行严密封锁。

为了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和解决高精度长寿命航天器姿态控制的“卡脖子”问题，房建成自1998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就开始了磁悬浮惯性执行机构技术的研究。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有资料、没有经费、技术基础薄弱、风险更

是无从计量，但房建成硬是凭着一股倔劲，凭着“永不停转”的陀螺精神，带领一支最初仅有5人的团队，向这一目标发起了冲击。

“尖端技术国外严密封锁，引不进、买不来，只能靠自主创新解决。当时国内大多数专家认为他们想搞的磁悬浮控制力矩陀螺和磁悬浮飞轮技术太先进了，国内没有基础，担心研制不成。怎么办？只有靠自己干，不能怕！我们必须得做出来，没有别的选择！”房建成坚定地说。他和团队成员在实验室度过了不知多少个四时不分、昼夜不觉的日子，加班连轴转成为日常，陪家人和孩子却似乎成为一种奢侈。有时，他一周工作时间长达100多个小时，可是仍嫌自己做得太少了，太慢了，肩上扛着沉甸甸的责任和期望，是的，不论付什么样的代价，都必须把它干出来！

2002年，磁悬浮陀螺技术攻关进入了关键时期，但当时陀螺失稳的问题还没有攻克。由于陀螺旋转的速度非常高，一旦失稳，会有很大的危险。有一次，转速提升到每分钟两万转的磁悬浮陀螺突然失稳，掉了下来，摩擦高温瞬间就把保护装置都烧焦了，整个实验室弥漫着呛人的焦味。研究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沉默了。博士生们回忆说：“那次事故，房老师一句话都没说，加强保护接着干！他认准的事不管多难，一定要成功，从来就没见他泄气过。”房建成带领团队顶住压力，不断加强防护装置：在陀螺的边上加上防护栏，加装强度更高的不锈钢罩……一遍遍测试、一组一组地搜索参数。他常常是带上所有老师和学生一起试验到深夜，交流讨论核心技术。

2003年的“非典”时期，团队的项目研发进入攻坚阶段，由于疫情的原因，商场关门、学校放假，以往热闹非凡的公共场所都萧条下来。学校、家人、朋友都非常担心他们的健康和平安，劝他们先暂缓研究，等疫情平稳之后再说，但房建成教授和团队成员却不为所动，没有一个人请假或退出，继续夜以继日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进行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鏖战。

房建成说，那时候经常工作到晚上12点，发现一个问题，必须再重复一次实验，一做实验就天亮了。但当时我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当时我想这个东西它太关键了，咱们国家早晚必须把它干出来，10年不行，20年，必须把它干出来！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自主创新，他们硬是研制出了国内首台新型磁悬浮姿控/储能两用飞轮。不仅干出来了，而且干得比国外还好，方案更新，性能更先进。靠着自主创新研制的磁悬浮惯性飞轮可使我国卫星寿命和姿态稳定控制精度有显著提高，对实现我国卫星高精度长寿命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07年，房建成教授主持完成的“卫星新型姿控储能两用飞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2008年，房建成教授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主持完成的“航天器姿态控制新型惯性执行机构技术”项目被评选为2008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2009年获第一届国防科技工业杰出人才奖。

此后，他带领科研团队先后研制成功我国首台五自由度主动控制磁悬浮飞轮、我国首台大型、首台中型单框架磁悬浮控制力矩陀螺和小型双框架磁悬浮控制力矩陀螺，使我国在该技术领域跨入国际先进行列。其中，五自由度主动控制磁悬浮飞轮2012年在实践九号卫星搭载升空，至今顺利在轨运行，试验圆满成功。

“国之重器” 高精度位置姿态测量系统横空出世

十年磨剑终成锋，一朝出鞘风云动。都说“十年磨一剑”，房建成教授带领团队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地付出，用十年的时间，磨出两把宝剑，支撑国之重器。这第二剑，就是和磁悬浮飞轮几乎同时期研制成功的高精度位置姿态测量系统。

为了打破国外技术封锁，解决制约我国高分辨率航空遥感的瓶颈问题，上世纪90

年代末，房建成教授带领科研团队自主创新，在国内率先开展高精度位置和姿态测量系统研究，他始终奋战在科研第一线，亲历科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常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应该注意从国家重大需求、重大工程中凝练科学问题，发现关键技术瓶颈。在他的指导和带领下，团队经过近十年的刻苦攻关，逐一解决了制约机载高精度POS性能的关键技术问题，主持研制成功高性能捷联惯性测量装置。在此基础上，他带领团队系统地开展了捷联惯性/卫星组合测量技术研究，主持研制成功了“机载高分辨率SAR运动补偿用捷联惯性/DGPS组合导航系统”，填补了机载POS国内空白。

房建成教授秉持着“国外有的技术我们国家要有，国外没有的我们要敢于创新”的理念，机载POS研究没有终止符，始终在路上。“十一五”以来，他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了国家“973”计划等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带领团队攻克了平台运动误差高精度实时估计等基础理论难题，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机载高精度光纤陀螺POS和激光陀螺POS，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最高精度水平。

他研究机载POS的目的不仅是要做出样机，更重要的是还要服务实际工程应用，满足国家重大亟需。十余年来，他带领的科研团队历经北京、海南、广州、安徽、山东、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甘肃等多省市，与航空遥感载荷科研及工业部门合作完成200余架次机载POS与航空遥感载荷联合飞行验证试验及应用任务，成功应用于中科院电子所研制的机载合成孔径雷达系统，为我国机载SAR成像分辨率从3米提高到0.5米发挥了关键作用。该项成果使我国在机载SAR高分辨率成像方面居于国际先进水平。研究成果获200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通过和技术前沿和产业高端的产学研合作创新，其成果已经成功应用于导航、遥感及资源开发等领域，名副其实地攀登当代科学技术高峰，为我国高分辨率航空遥感技术做出突出贡献。

开创引领我国量子精密测量领域技术发展

精密测量技术作为信息获取的源头，是赢得现代信息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高灵敏度的精密测量技术已成为人类获取准确信息，探索未知领域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量子光学、原子物理、激光技术、低温技术等现代物理学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以及自1997年以来的四次量子领域的诺贝尔奖研究成果，使得精密测量技术已经进入量子时代。量子精密测量作为未来信息技术和整个信息产业革命性变革的核心推动力，将对整个信息产业产生重大的影响，未来将会在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2008年，43岁的房建成教授带领科研团队，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勇于探索和创新，开始了全新的、国内空白的量子精密测量技术的研究攻关；2012年作为基金委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基于原子自旋效应的超高灵敏磁场与惯性测量实验研究装置”首席科学家和项目负责人，瞄准量子态精密闭环操控这一科学难题，带领团队攻克了系列关键技术，研制成功国内首套基于原子自旋效应的超高灵敏磁场和惯性测量实验研究装置，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的测量灵敏度。在此基础上，他带领团队又研制成功国内首台原子自旋陀螺仪原理样机，实现了同国际公开报道指标相当的漂移指标，在国内开辟了超高灵敏原子自旋磁场和惯性测量技术的新方向。

原子自旋陀螺作为国际学术前沿技术，没有国外成功的案例可循，只能靠勇于探索、大胆尝试、自主创新来实现。他带领着年轻老师和学生顶着压力常常一起熬到凌晨，有时为了想明白一个数据曲线通宵达旦工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通过反复交流讨论梳理，逐项开展验证，在大量的测量数据分析中，他们发现并解决了

问题，最终完成了样机研制的任务指标要求，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这个实验是在大棚完成的，房建成教授说，这是他们团队“永不停转的陀螺精神”的延续，一种新的精神：“大棚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他们攻克了接下来的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引领了国内量子精密测量技术的发展。

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

2015年12月，房建成教授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如何把学院学科建设和科技创新的成功经验和模式带到学校来，带领北航所有学科和科研团队蓬勃发展，这是“房院长”变成“房校长”后思考最多的问题。他勇于担当、全身心投入、不惧压力和挑战，承担学校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校地合作拓展等多项重要工作。

房建成是地地道道的“国产”教授，他没有国外求学的经历，从本科到博士后都是在国内高校中完成的。作为一名教师，房建成平均每学年都要承担一门本科生专业课、三门硕士生专业基础课和一门博士生专业综合课。房建成主讲的“惯性器件原理”被评为2008年北京市精品课程，2009年荣获北京市教学成果奖。2009年荣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先进惯性仪表与导航技术创新团队属于北航精密仪器及机械国家重点学科，该学科是北航最早的五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其前身为我国第一个航空陀螺与惯性导航专业，经过近50年的发展，该学科已发展成为我国惯性技术的发源地和自主创新的摇篮，而房建成对这个专业的贡献则功不可没。

房建成说：“一个大学是否优秀，并不单单要看这个大学有多少辉煌的科研成果，更重要的要看她能够培养出多少对社会、对民族、对人类有用的人才。”如今，已经有50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先后从房建成的门下毕业。功夫不负有心人，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累累硕果。到目前为止，房建成已培养出多名创新能力强的优秀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培养的博士研究生7人获国家级科技奖励，其中4人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1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0人次获省部级科技奖励。而由房建成所领导的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更是在短短6年时间里，成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时间最短、取得突出成绩的学院。

在科学研究方面，他身体力行地传承和发扬“北航精神”，坚持北航“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大成果”的“四大”科技创新模式，多梯次、分阶段、可持续地开展高端成果培育计划，对长期积累形成的科研成果进行挖掘、凝练和升华。2016年，北航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奖6项，全国高校排名第四；2017年，学校再创新高，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奖7项，位列全国高校第二。他还组织实施了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开展基础前沿研究，使得北航的青年高端人才增速位居全国高校前列。他深化新时代北航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组建前沿科学技术创新研究院，建立专职科研队伍。他带领全校师生大力开展医工交叉，组建“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获批多个北京市高精尖中心，与首都多家顶级医院和企业协同创新，打造中国“医工硅谷”。

在军民融合的大背景下，如何把北航的科技成果应用于民用领域，带动先进制造业发展，服务于国民经济增长，一直是房建成副校长时刻思索的问题。两年来，他主动作为，年均出差50余次，带头走出学院路（北航校区所在地）、走出北京城。在浙江台州，北航投产的“天鹰外贸出口型无人机”首架飞机已经于2017年11月13日成功下线，通航产业园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在山东东营，国产ARJ-21客机搭载北航和商飞联合研制的北斗导航机载设备的飞行试验于2017年10月14日首飞成功。在四川



成都，北航航空发动机高温结构材料与涂层技术落地，与5719厂、624厂、东方汽轮机厂直接开展产学研合作，已经产生经济效益，这也是成都首个国家科技奖励一等奖产业化项目。在云南昆明，北航落地新型临近空间飞艇项目，这一世界领先技术将直接服务于云南省“智慧边境”网络信息系统建设。在浙江杭州，北航建设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杭州分院，积极与之江实验室和信息技术企业开展战略合作。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祖国西部、在边境线上、在长三角地区、在珠三角地区，都有他带领北航研发团队积极推进校地合作的身影。他在用实际行动，践行习总书记“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号召。

时至今日，怀抱着“服务国家，敢为人先，持之以恒，团队协作”的初心，房建成教授依然忙碌在实验室中，忙碌在北航的各项发展事业里。作为学术带头人、科学院院士，他不懈努力，希望能带领团队率先研制成功世界首台量子陀螺仪，实现我国陀螺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向领跑的跨越。作为副校长，他更是兢兢业业、废寝忘食，把北航建设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

市委党史研究院赴青岛采访临沂市委原书记张少军。为编写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市委书记口述史，9月1日，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专人到青岛市，采访临沂市委原书记张少军同志。张少军围绕“沂蒙党性教育基地建设和提升”这一选题，全面介绍了沂蒙党性教育基地建设的历史背景、主要场馆建设提升以及开发利用成效等情况。张少军同志作为沂蒙党性教育基地建设的决策者和推动者，以其亲身经历全面回顾总结了沂蒙党性教育基地建设历程和取得的显著成效，为我们编写改革开放以来临沂历任市委书记口述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9月5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市委党史研究院开展“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道德讲堂活动。

临沂市公布第一批红色堡垒镇、村。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进一步推动乡村红色文化旅游、红色文化研学，更好地发挥红色堡垒镇、村在乡村振兴、传承弘扬沂蒙精神中的作用，近日，市委党史研究院、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布了临沂市第一批红色堡垒镇(乡)、村。

市委党史研究院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9月15日上午，市委党史研究院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市委党史研究院院长李洪彦就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做了具体工作部署，市直巡回指导二组组长王培栋对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市委党史研究院开展志愿服务“主题党日”活动。9月25日，市委

党史研究院全体在职党员到兰山区通达社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助推社区发展”为主题的双报到“主题党日”活动。与兰山街道、通达社区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社区党建工作情况，深入探讨了党建联动、“双报到”结对共建等工作，帮助社区清理路面2000余平方米，垃圾100余处；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党史史志工作宣传，以发放宣传资料、现场互动、解难答疑等方式进行政策宣传，接受群众咨询80余人次。

市委党史研究院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班。9月25日至27日，市委党史研究院举办全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班。市直巡回指导二组徐勤伟同志跟班学习。此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领读领学、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原原本本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市委党史研究院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廉政警示教育专题会议。10月17日，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召开专题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陈希同志在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进会上的讲话》，并通报了临沂市纪委关于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会议要求，全院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进一步增强防腐拒变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按照主题教育“清正廉洁做表率”的目标要求，进一步加强院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纵深，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取得

实效。

市委党史研究院召开院领导班子调研成果交流会。按照市委部署要求和院主题教育工作具体安排，10月28日上午，市委党史研究院召开院领导班子调研成果交流会。市直巡回指导二组徐勤伟同志到会指导，院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院领导班子成员结合自己的调研成果先后作了《挖掘全市革命遗址资源助推乡村振兴》《机构改革后党史史志工作的融合发展》等主题发言，谈了调研的收获、发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and 措施。

市委党史研究院院长李洪彦为党员作主题教育专题党课。10月31日，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院长李洪彦围绕“弘扬沂蒙精神，践行初心使命”这一主题，为党员上了一堂生动形象、理论丰富、贴切实际的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沂水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开展志书交换活动。为充实、丰富方志馆的收藏，宣传党史知识，传承史志文化，方便群众查阅党史史志资料，沂水县委党史研究中心进行了山东省内志书交换活动。通过电话沟通、发函约请、上门拜访等方式，沂水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与全省各地市县(市、区)党史史志部门取得了联系，共交换志书、年鉴近200部，覆盖全省16个市的所有县(市、区)，交换率达100%。

沂水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到莒南县交流学习。10月29日，沂水县委党史研究中心《红色沂水》编写组一行到莒南县学习党史著作编研及红色场馆建设等工作。